李明滨 著

中国读本

中国文化在俄罗斯

中国与俄国的文化交流，已有悠久的历史。17世纪初两国有人员开始往来，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俄国兴起的「中国热」，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开端。从那时起，俄国宫廷和上流社会热衷于搜集中国文物，知识界也开始了解和注意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以至俄国旧都遍布中国景物。而今，在俄罗斯「中国热」仍方兴未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在俄罗斯 / 李明滨著. —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150-4

Ⅰ.①中… Ⅱ.①李… Ⅲ.①中俄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 Ⅳ.①K203 ②K5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0874号

中国文化在俄罗斯

著　　者	李明滨
责任编辑	何宗思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2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150-4/G·1301
定　　价	30.00元

目　录

概　　说

中俄的文字之交，已有悠久的历史。17 世纪初有人员开始来往，17 世纪末、18 世纪初在俄国兴起的“中国热”，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开端。宫廷和上流社会热衷于中国文物，俄国人同西欧人士一样搜集瓷器、漆器和丝绸织物，按中国风格装饰皇宫住宅，仿建中国的园林。知识界也开始注意了解中国的文化、思想。

18 世纪初，俄国开始向北京派出东正教使团，从 1714 年起，每 10 年派遣一次，至 1949 年共派过 20 次。早期的东正教使团，为俄国汉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此后，使团便成了汉学人才的培养处所之一。到 19 世纪上半叶，俄国国内在高等学校开始设立东方系科，系统讲授汉学课程，并培养出全面的汉学人才，促使俄国汉学最终形成，使得译介中国文化资料、典籍的工作有了保障。

俄国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不但历时长久，而且持续不断，从 18 世纪下半叶，由汉满文直接翻译中国哲学、文学典籍算起，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再加上 18 世纪上半叶由法文等西欧文字转译中国文学作品，则时间更早。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译介和研究工作一直持续不断。其间曾出现过三次热潮。一次在 19 世纪下半叶，把中国的儒、释、道学初步系统地介绍过去，译出若干主要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并且写出了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丰硕的成果使

得俄国汉学从形成时期起就引起世界瞩目。另一次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中国文化、文学作品的潮流已经发展成为洪流，自古迄今的重要著作、作品都被译成俄文，有的还转译成苏联时期的其他民族文字出版，鲁迅的作品就曾译成苏联的二十多种民族文字。反映中国新风新貌的电影广泛放映，不但经常出现在首都莫斯科，而且遍及苏联的穷乡僻壤。第三次是20世纪的80年代，中国文化以更大的规模在俄罗斯大地传播，这个热潮目前仍方兴未艾。不仅有精神文化，而且有物质文化——后者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冲向当今的“独联体”各国。

传入俄罗斯的中国文化，不仅范围广泛，而且种类繁多。文化典籍和经典著作，举凡哲学、宗教、法律、历史、民族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中国论著的俄译，应有尽有。珍奇古董和艺术文物，从高雅的宫廷摆设，到通俗的民间剪纸、年画，从现代的绘画雕刻到业已失传的考古珍品、稀世文物，从武术气功到中医以及养生术都在俄罗斯人的收藏和研究之列，某些种类还时常加以展览或介绍推广。

翻译文化经典和文学作品的工作尤为突出，译介的对象从古代、近代一直扩展到现代，从大师巨匠扩展到中小作家，从书面文学扩展到口头文学，译介文学作品也从零星分散走向集中和系统化，大型的包罗古今名著的“中国文学系列丛书”（40种）正在陆续问世。研究和论述的工作也在逐步配套，既有全面的综合性论著，也有专论某个

种类或某个文化名人的专著。

俄国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也已形成自己的传统和方法。由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院士开创的重视研究的风气，经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继承和发展，汉学界那种注重全面搜集和占有资料、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的做法已蔚为风气，加上十月革命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使得俄苏汉学独具特色，在世界汉学中显得与众不同。

其特色之一是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学派，有的汉学家称之为“阿列克谢耶夫学派”。学派的主要成员系由阿列克谢耶夫院士20世纪上半叶在列宁格勒工作的40年期间培养和指导出来的学生及助手，都是研究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

在当代，全国有统一的规划，设在莫斯科的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以及圣彼得堡的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等几个汉学研究中心，经常地筹划和推动俄国（苏联）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直至对整个中国国情的研究进一步走向系统化和分科化，各分支学科合理布局，研究对象相对比较集中和明确，分工具体，在各个领域都有人从事翻译和研究，因而能推出一批成果和知名学者。

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时间上虽然比西欧起步晚，但从成果和人才的数量上看却是后来居上。它的成果和研究方法有许多方面值得借鉴。

第一章

诸子百家在俄罗斯（上）

一 普希金的“中国热”

俄国作家中有不少人向往中国，想到中国来看看。普希金就是一个。他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他为此所进行的活动，却成了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普希金对于中国的了解起初是比较模糊的，主要依据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文字材料和本国文学前辈的著述。据统计，普希金拥有的藏书中，有关中国的藏书 82 种。[①] 18 世纪从法国兴起并传遍欧洲的“中国热”，对俄国有很大的影响。伏尔泰赞叹中国完美道德的文章、宣扬孔子教义的著作以及他取材于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而编成的剧作《中国孤儿》，曾经影响了俄国文坛的风尚。连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侈谈中国的古老文化，表示要效法中国皇帝，实行“开明”政治，并且按照中国的格调来装饰皇宫。突出的例子是在郊外行宫奥拉宁堡建立了“中国宫”，在皇村设立小桥、亭台、宫殿等仿中国式建筑。在皇村的屋宇和花园中学习及生活的普希金，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他在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写到巫师的花园时就使用了这样的诗句：

---

① 戈宝权《谈中俄文字之交》，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 551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在那迷人的田野里，

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

密树枝叶微微颤动，

中国夜莺婉转歌唱。

同时，也不能忽视俄国文化界宣传中国古代文明的作用。如果说作家拉吉舍夫在西伯利亚写的《有关中国市场的信札》、诗人康杰米尔提到的“奇异的中国智慧”、诗人杰尔查文写到中国的诗句还只是偶尔涉及中国文化的话，那么，一些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和中国著作的俄译本长期广为流传的，就应视为中俄文化交流的明证。例如1788年涅恰耶夫用诗体翻译的伏尔泰剧作《中国孤儿》，比它更早的剧作家苏马罗科夫从德文翻译的《中国悲剧“孤儿”独白》。由著名导演夏尔勒·狄德罗取材于中国故事而编的大型芭蕾舞剧《韩姬与陶》（又名《美女与妖怪》）。1819年在彼得堡上演时，普希金甚至去看过，以至他后来在写《叶甫盖尼·奥涅金》时，还能通过诗中主人公的眼光，再现该剧演出的情景：“舞台上，魔鬼、恶龙、爱神，还在跳跳蹦蹦，吵吵嚷嚷。”① 此外，剧作家冯维辛从德文翻译了孔子的《大学》。作家诺维科夫主编的两家杂志相继刊登宣扬中国理想皇帝的文章，一篇是1770年2月《雄蜂》杂志登载的《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一篇是1770年7月《爱说闲话的人》杂志刊登的《雍正帝传子遗诏》。两篇

---

① 转引自米·阿列克谢耶夫《普希金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87年第3期。

文章都是汉学家列昂季耶夫从中文翻译的，后来又收入译者的译文集《中国思想》（1772）一书中，进一步流传。也许正是普希金通过这些文学前辈的大著，才使他能够设想中国古时候的情形，造成他有如此美好的印象："彬彬有礼的中国人。"①

后来，大约过了10年，普希金对中国的印象又进了一步，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里写出如下的诗句：

［孔夫子］中国的圣贤
教导我们尊重青年②

这些句子仅见于草稿，经中国学者戈宝权考证而发现，③它对于追踪作者的思想很有用处。因为长诗发表时已删掉，所以未能受到人们的注意。

然而，普希金向往中国的热度是日益上升的，1828年结识了汉学家比丘林之后，这种激情发展到新的高度。

比丘林（1777～1853），原名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斯基，1799年毕业于喀山神学院，当修道士后取法号雅金夫，曾任喀山某修道院院长和修士大司祭等职，后来任东正教使团团长。他在中国住了14年（1807～1821），学会汉、满、蒙、藏语。在当年的俄国是一个难得的"中国通"。他从中国回去之后，19世纪20年代起便在《莫斯科电讯》、《莫斯科导报》等杂志上撰文介绍中国，流传很

① 普希金《致娜塔丽娅》，1813年。
② 《普希金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219页。
③ 戈宝权《普希金和中国》，载《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

广，颇有声望。他引起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等的兴趣，继而同他们建立了友谊。

比丘林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的著作，如《四书》、《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西藏青海史》、《北京志》、《大清一统志》等，而且赠送普希金的书不止一本。在普希金的藏书中有一本比丘林的译作，书名为《今日西藏纪行》，并附成都至拉萨路线图，译自中文。书的扉页上有比丘林的亲笔题词："赠予善良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君　译者谨表诚挚的敬意。1828 年 4 月 26 日。"通过比丘林的书籍，尤其是在他们的相互交往中，普希金对中国的了解越多，他对中国的兴趣就越浓。在 1829 年 12 月 30 日写的《致友人》一诗中已经流露出他要来中国的心声：

出发吧，我已准备好，朋友们，
不论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将紧紧跟随，
跟着你们，……
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脚下。

（戈宝权　译）

这里的"朋友们"系指希林格和比丘林。因为在写完这首诗的八天之后，普希金向沙皇政府提出的申请已点明他要跟随的是"前往中国的使团"。原来希林格是外交部官员兼东方学家，同比丘林是至交。他奉命组团于 1830 年 2 月到中国西北部边境考察贸易情况，比丘林也是考察团的成员，而这两个人恰巧都同普希金来往密切。正是在他们行动的启发下，普希金才产生这样急切的想法，并于 1830 年 1 月

7 日写信给沙皇政府第三厅厅长宪兵头子本肯多夫，正式提出申请：

我现时还没结婚，也没担任官职，我想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如若不能获准，我想申请允许我随同前往中国的使团访问中国。

那个宪兵头子当然不会同意。他在 1 月 17 日批复了普希金，说：

陛下不能满足您关于允许您到异邦旅行的申请，认为这会使您耗费许多钱，还会使您脱离正业。您想随同我国使团赴中国的愿望也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使团的全部组成人员均已确定；况且，如未事先通知北京宫廷，也就不得由别人替换。

这对于普希金的“中国热”无疑是个打击。然而，他的热情并未减低，仍然继续关心中国，注意搜集阅读有关中国的图书资料。据档案资料证实，他在 1830 年 5 月，即希林格、比丘林的考察团走了三个月之后，仍在借阅《中华帝国概览》第一卷和第二卷等书。此外，由于 1825 年 12 月起义的失败，大批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其中一些人，包括普希金的皇村学校同学、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丘赫尔别克、别斯图热夫都到过俄国同中国接壤的地方。他们寄回去的信件也吸引了普希金的注意。更有意思的是，1830 年普希金在编辑《文学报》时，有好几期刊登希林格、比丘林考察中国的情况报道，或摘登他们的信札，起到了介绍中国新情况的作用。这就是说普希金以他对中国的热

忱，反过来也增强和促进了俄国社会的“中国热”。

从另一个角度看，普希金申请赴中国被拒绝的事，发生在他的自由受到政府限制的时候，每当人们在批判沙皇政府迫害诗人的罪行时，总要提到普希金向往中国的热切愿望，从而也意外地扩大了中国在俄国的社会影响。

二 普希金与《三字经》[1]

在普希金的藏书中，有一本俄文译者比丘林用铅笔题词赠送的《三字经》。封面印有：《三字经》，附石印中文本，亚金夫神父译自中文，题词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惠存　译者赠”。该书于1829年（清道光九年）由彼得堡根茨出版社印行。由于它可以说明普希金与中俄文字之交有关系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谈到《三字经》的西传，过去总以为是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于1835年出版的英译本为最早，“其实，在此之前约一百年，俄国人就已经与《三字经》订下汉学姻缘了”。[2] 1887年（光绪十三年）奉派赴俄考察的户部主事缪佑孙，曾在《俄游汇编》（卷八）提到中国古书在俄国的译介，说：“其译成俄文的中国书，则有

① 参阅李明滨《普希金与〈三字经〉》，载《苏联文学》1992年第6期。

② 蔡鸿生《〈三字经〉在俄国》，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期。

古文尚书、孝经、三字经、杂小曲。”这也说明《三字经》在俄国的流传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最早接触《三字经》的俄国人，是随同“东正教使团”来华的一批学员。据1727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俄国可以派员随教士团来华，人设于北京国子监的俄罗斯馆习满汉文。该馆使用《三字经》为识字课本。《三字经》本来是中国广为流传的启蒙读本，仅1 134字，三字一句，共378句，两句押韵，易读易记，对于外国人来说也很有用，既可以用于学汉字，又可作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尚的入门。第一次将它译成俄文的是1729年随第二届使团来华的学员伊拉里昂·罗索欣（1717或1707～1761），其译稿未出版，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但罗索欣在1741～1751年在彼得堡办华文馆时，以《三字经》为教材，其译稿曾作为解说中文原本的材料使用过。罗索欣作为俄国知名的早期汉学家，还翻译过《千字文》、《二十四孝》等十余种中国读物。

第二次的译者是1742年随第三届使团来华的学员阿列克赛·列昂季耶夫（1716～1786）。他后来成为俄国有名的早期汉学家，有大量的译著，所译中国古籍已出版的有二十余种，其中不少古书在欧洲还是第一次的译本，如《大学》（1780）、《中庸》（1784）等。他所译《三字经》于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收入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出版的《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一书中。这是《三字经》在俄国和欧洲第一次公开出版的译本，当时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竭力装成"开明君主"，译本的出现立即受到官方的重视，《彼得堡通报》很快于次年发表评论，宣扬其内容，说它是"诗体箴言"。

影响最大的要算第三次的译本，这同它的译者比丘林的名声有关，同时也得力于普希金所作的评论以及其他几家杂志的介绍。比丘林的翻译不但有《三字经》，而且有《四书》、《通鉴纲目》等许多典籍，被称为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他的《三字经》译本也很有特色，不但有序言，而且有详细的注释，出版后立即受到俄国报界的欢迎，从 1829 年底至 1830 年初就有四家报刊载文加以评介。

彼得堡的《北方蜜蜂报》于 1829 年 12 月 21 日发表书评加以推荐，特为引用下列诗句："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①，表示推崇。莫斯科的文学评论及社会政治刊物《莫斯科电讯》于 1829 年第 24 期发表书评，就《三字经》的思想内容评述道："东方哲学在欧洲人心目中固然古色古香，但其雄深素朴却令人惊叹不已"②。评论转录了下列诗句："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而《雅典娜》杂志则于 1830 年第一期发表书评，指出从《三字经》可以见到"中国人的德性和智能"③。

对宣传《三字经》作用最大的要算是《文学报》的书

---

① 蔡鸿生《〈三字经〉在俄国》一文。
② 蔡鸿生《〈三字经〉在俄国》一文。
③ 蔡鸿生《〈三字经〉在俄国》一文。

评。《文学报》是当时俄国有相当影响的报纸之一，它于1830年1月1日至1831年6月30日在彼得堡出版，每五天一期。其编辑出版人在1830年11月以前为杰尔维格，以后是索莫夫，而普希金则从一开始就直接参加编辑出版工作，这就使人注意到这篇书评同普希金的关系。该报在1830年第一期（元旦专刊）载文对《三字经》给予好评。在这篇未署名的评论中写道："《三字经》的本意是'三字圣书'，因为它每一行都由三个汉字组成。它成书于十三世纪。前言中谈及这本书时提到：'三字经是简明的儿童百科全书，由宋朝末年王伯侯（按：应为王应麟）编写。它从阴阳五行、天运四季讲起，接着讲人行为中的三纲五常……它言语简练但内容充实，用语朴素但含义深刻'。"同时，该评论肯定了比丘林翻译《三字经》的学术意义和贡献，尤其强调其在学术上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亚金夫神父翻译出版这本书，旨在让它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因为书中阐述了中国人的一切思辨，并附有欧洲人感到陌生的，会妨碍他们阅读其他中国书籍的概念和词语的解释。"评论的作者特别强调俄译本在印刷排版上的特色及其意义，由此并对比丘林充满敬意："我们的学者、东方学家、亚金夫神父比丘林找到了回答外国批评家的最好方法，他刊印了自己改写的三字经（'中国儿童百科全书'），并附有该书的中文原文。这样，所有真懂和假懂中文的人皆可将译本与原文核对比较，说话不再是猜测，而是根据事物的实质，根据明显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即凭手中的两种

文本。”经过评论作者这番论述，公众无疑更能理解该俄译本的价值。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三字经》，评论文作者援引了书中的若干诗句，并介绍比丘林所作的解释。所引诗句有《三字经》开头的三个四行诗节；在排版上也使之鲜明突出如下：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苟不教，
性乃迁。
教之道，
贵以专。

昔孟母，
择邻处。
子不学，
断机杼……

最后四行所包含的典故如不作解释，俄文读者是会感到难懂的。因而，评论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摘录比丘林的详细注释，其中说到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及其母亲的教子之道恰应了一句俗话“择友而处，择邻而居”等。

《文学报》这篇评论的作者是谁？历来不断有人推测是普希金。远的如普列奥勃拉仁斯基的文章《普希金在萨马拉边疆区》，载《萨马拉大学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种学学会通讯》1925年第3期；近的如勃林诺娃编的《杰尔维格和普希金的〈文学报〉1830～1831·内容索引》莫斯科，1966年出版。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者也抱有同样的看法。后经苏联学者米·巴·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896～1981）研究，认为“这种猜测无疑是有理由的”。阿氏作了退一步的设想：即便普希金不是该评论文的作者，至少也在公开发表前就看过这段文字，因为据阿氏查证，“《文学报》第一期是普希金编辑并校阅的，而其正式的编辑发行人查尔维格并未参加。”[①]

另外，这篇评论那种热情洋溢的语调同普希金与比丘林之间互相敬重的关系也是相符的。种种迹象表明，普希金曾经对《三字经》在俄国的流传起了促进作用。

三　托尔斯泰与《论语》、《孟子》

在俄国作家当中，对中国文化、历史、哲学作过深刻研究的，当推托尔斯泰。[②] 1891年11月，彼得堡一位出版

① 阿列克谢耶夫《普希金与中国》，《国外文学》1987年第3期。

② 参阅戈宝权《托尔斯泰和中国》，《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家写信询问托尔斯泰，世界上哪些作家和思想家对他影响最大，他回答说中国的孔子和孟子“很大”，老子则是“巨大”。[①] 1884 年 3 月 27 日他也在日记中提到：“我认为我的道德状况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他的一生中确实曾对孔老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深受影响。

托尔斯泰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接触孔孟著作。1882 年 6 月他曾致信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感谢后者给他寄去有关孔子的书。不久便着手研读。1884 年 2 月末他写信给好友切尔特科夫说道：“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严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②] 这一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他研读了孔子，并曾表示“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富”（3 月 30 日日记）。接着，在这一年里他写出了《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等文。在《论孔子的著作》一文中，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③] 由此可见，孔子的著作给了他对中国多么好的印象。

托尔斯泰还从英国汉学家理雅各所译英文本《中国经

---

① 《托尔斯泰全集》，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以下所引托尔斯泰文均简称《全集》）。
② 《全集》第 85 卷，第 30 页。
③ 《全集》第 25 卷，第 532 页。

典》转译了孔子的《大学》。詹姆斯·理雅各（又名莱格，1814～1897）原为伦敦布道会派往马六甲的英华书院院长（1839）。他在1843～1873年长驻香港，返英后在牛津大学开汉文讲座。其所译《中国经典》包括“四书”、“五经”，分28卷于1861～1886年间出版，流行于西方。此时恰好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贤哲的思想发生兴趣，便及时加以利用和转译。其实，在托尔斯泰之前近一个世纪，《大学》早就有俄国汉学家列昂季耶夫译出，于1780年在彼得堡出版了。不过，当时俄国的汉学尚未形成，对中国了解的人不多，更说不上研究，因而列昂季耶夫此项开拓性的译作并未传开，影响极小，不如19世纪那样引人注意。

1904年“媒介”出版社出版了布朗热所著《孔子·生平及其学说》一书。此书由托尔斯泰编辑，书中附有《中国学说述评》一文，据云从文章的内容看，证明此文是作者以托尔斯泰的文章草稿为基础写成的。[①]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也研读孟子。据我们所知，孟子著作的俄译本直到1904年才由波波夫选译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孟子》（译并注，附孟子传略），而托尔斯泰早在1884年4月9日的日记已有记载：“开始研究孟子。非常重要，非常好。”[②] 看来，他所读的当是理雅各的英译本。

---

① 参阅任子峰《托尔斯泰与孔老学说》，《国外文学》1990年第1期。

② 《全集》第49卷，第80页。

在1893年11月5日托尔斯泰致切尔特科夫的信中，他又提到中国古代另一位贤哲墨子，说："开始读墨子"，又说"我重新阅读了老子，现在开始阅读理雅各的书中包括墨翟的一卷，我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智慧的书，特别是关于人性善和人性恶问题的讨论……"。[①] 托尔斯泰非常欣赏墨子"兼爱"的思想，后来在1910年出版了他编选而由布朗热编著的《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学说》。

托尔斯泰编写过不少中国古代哲学的文著或资料，"在1884年到1910年将近20年当中，共写过和编辑过将近十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在他编选的《每日贤人语录》和《阅读园地》中，还引用了大量中国的格言、谚语，以及老子、孔子等人的箴言。他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和编辑的工作，直至最后逝世时为止。"[②]

四　托尔斯泰与《道德经》

托尔斯泰在研读孔子之前，已经接触到老子的著作。1878年1月20日，当时在彼得堡公共图书馆任职并充当托尔斯泰寻检书籍助手的斯特拉霍夫写信向前者介绍斯塔尼斯拉斯·于连[③]的法译本《道德经》，信中说："我

---

① 《全集》第87卷，第236页。
② 戈宝权《托尔斯泰和中国》。
③ 斯塔尼斯拉斯·于连（1797～1873），法国著名汉学家，曾执教于法兰西研究院。

从斯·于连的《老子所著〈道德经〉》一书中援引了老子。根据某些词句我觉得这本书是很深刻的，但是我还没有很好研究。”① 托尔斯泰阅读了这个译本，圈定了拟翻译的章节，某些章节还写了批语：“玄学极妙”、“非常好”、“好”等。

1884 年是托尔斯泰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发现”的一年，从文献资料看，他在这年里研究的不但有老子，而且有孔孟等“中国的智慧”②。1884 年 3 月他开始翻译《道德经》。他在 3 月 6 日和 9 日的日记分别记载：“翻译老子，没有达到我想象的那种结果”，“……读老子，可以翻译，但无法全部翻译。”

应该说，从 1884 年起托尔斯泰是把老子和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优秀思想的整体来接受的，他在谈到这类话题时往往二者并提。例如二月他给切尔特科夫的信中说：“我在读孔子著作，这已是第二天了。真难想象，它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精神高度。”③ 三月，再次给后者写信说：“我正沉湎于中国的智慧之中。极想告诉您和大家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裨益。”④ 3 月 15 日，又一次在给后者的信中说：“我认为我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由于阅读了孔子和老子著作的缘故。”同时，在信中首次提出为了读者的道德修养急需划定专门的“读书范围”，其中应包括福音书、佛教典籍、

---

① 转引自《全集》第 25 卷，第 833 页。
② 参阅李谢维奇《列夫·托尔斯泰与老子》，《国外文学》1991 年第 4 期。
③《全集》第 85 卷，第 30 页。
④《全集》第 85 卷，第 30 页。

罗马人马可·奥勒留和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著作，还有老子的著作。4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读了孔子著作，它们更深刻、更优秀。没有孔子和老子，福音书便是不完全的，而没有福音书，孔子学说也就没有意义。"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如此推崇孔老著作，直至视其与福音书相互补充的地位，可见他醉心于"中国智慧"的程度。

然而，托尔斯泰接受孔老学说的出发点毕竟还是基督教，所以他说："老子学说的实质与基督教是相通的。"[①] 他认为"两者的实质都是以禁欲方式显示出来的构成人类生活基础的神圣的精神因素。因此，为使人类不成为苦难而能成为一种福祉，人就应当学会不为物欲而为精神而生活。这也正是老聃所教导的。"[②] 依照托尔斯泰的理解，"道"这个字既是上帝的标志，又是通向上帝的道路。那么，与基督教义相通的地方便是"上帝就是爱"，而爱别人正是通向理解上帝之路。[③]

自然，这种理解未必正确，当代汉学家李谢维奇就表示怀疑："我为托尔斯泰对老子的解释感到担心，明显的理由之一是：人们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同时他又肯定其精神："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托尔斯泰从比较的角度去处理的是他全然陌生的文化材料，这种对属于极为相异的信仰传统之神圣文本所作的文化比较，能使作家如此成功地克服

① 《全集》第40卷，第350页。
② 《全集》第40卷，第350页。
③ 《全集》第25卷，第351页。

语言障碍，从而深入到文本的实质中去，对此我们唯有表示惊叹。”①

其实，托尔斯泰第一次试译《道德经》的工作并不顺利。直到1886年7月他还因为材料不足而急切地写信问切尔特科夫：“除了我手头已有的，还有没有其他关于老子的书籍。”② 他曾告诉后者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我不仅忙于研究佛教，还有婆罗门教、孔子和老子。”③ 到1888年他已经以懊丧的心情给鲁萨诺夫写信说：“我早就具备了翻译和出版它们的可能性，但我却什么也没有去做。我可以举出：孔子、老子……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名字，但这些书的俄译本却一本也没有。”④

事情延缓到1893年终于有了转机，他和年轻的助手波波夫一起来翻译。只见他9月21日给妻子描述的：“怀着喜悦而紧张的心情”反复校订译文的工作：“波波夫在替我抄写手稿。我和他在重读和修改深刻的思想家老子作品的译文，我每一次都怀着巨大的喜悦、聚精会神地去理解和用心地翻译，我是参照着法文译本和更加出色的德文译本工作的。”信中并且摘引《老子》的语句，并加以赞叹：“这不是太美了么！”⑤ 此项工作持续到1894年5月。他的译作一直到1910年才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列·

---

① 李谢维奇《列夫·托尔斯泰与老子》。
② 《全集》第85卷，第370页。
③ 《全集》第85卷，第356页。
④ 《全集》第62卷，第152页。
⑤ 《全集》第84卷，第197页。

尼·托尔斯泰编选，中国圣人老子语录》，主要部分是老子言论摘选（共选入64段语录），附有两篇论文，一篇是托尔斯泰写的前言：《论老子学说的本质》，一篇是伊·戈尔布诺夫——波萨多夫写的短文《关于圣人老子》。

托尔斯泰去世以后，1913年又出版过别人整理的一个译本，书名为《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列·尼·托尔斯泰编，京教大学教授丹·彼·科尼西译自中文，谢·尼·杜雷林增补注释。

这里顺便说说，老子在俄国是“诸子百家”中最受重视的一个。其《道德经》早在19世纪上半叶即由喀山大学教授丹尼尔·西维洛夫译出，但未发表。后于1915年由扎莫塔依洛以《丹尼尔（西维洛夫）档案资料中未公布的〈道德经〉译文》为题予以发表[①]。由此看来，《道德经》在俄国的传播，早期主要得力于托尔斯泰的编译本。

五　儒学道学对托尔斯泰的影响

作为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的思想既深刻又复杂，那是在他毕生追求“人生的真谛”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广泛涉猎书籍，研究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教义，思考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从总

① 《敖德萨图书志学会通报》，1915年第4卷，5~6册。

体上看，他的思想广泛吸收了包容东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很难划定哪些思想是受到哪方面来的影响。不过，从托尔斯泰主义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多少有着孔老学说的影子。或者说二者多少有点关系，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狭义上的托尔斯泰主义，是指“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博爱”等项主张，而孔老学说中恰恰就有“仁”、自我“省身”、“道”和“无为”等思想极受托尔斯泰的注意和推崇，被他视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粹，自然也可以说他已接受其影响。

进一步看，其中某些影响可以从托尔斯泰本人的论述得到印证。即以其所撰《论老子学说的本质》一文为例，他就提到：“‘道’的获得要通过节制一切个人的、肉的东西”，“老子学说与基督学说，其实质是相同的。二者的实质在于通过节制一切肉的东西而显示构成人的生活之基础的灵和神的本质。”[①] 这也就是说，托尔斯泰和老子一样，或者说他接受了老子的主张，“都强调了道德修养中必须节制和克服肉的、物质方面的贪欲，才能攀登灵的、精神的崇高境界”。[②]

又如，老子《道德经》第八章关于“上善若水”的观点，托尔斯泰就加以发挥：“就应该这样。如老子所说，应

---

① 《全集》第40卷，第351页。

② 任子峰《托尔斯泰与孔老学说》。

该像水那样。没有阻碍，它就流，一遇堤坝，它就停止。堤坝被冲垮，它又流，遇到方形容器，它是方的；遇到圆形容器，它就是圆的。正因为如此，它比所有的东西都更重要，更有力量。”①

再如，托尔斯泰1893年以《无为》为题写的文章，更可以看出老子的直接影响。他说：“根据老子的学说，人们的一切灾难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而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因此，假如人们奉行无为，那么他们就能摆脱个人的，尤其是社会的一切灾难。”从这里出发，“无为”必然与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相通了。

① 《全集》第49卷，第65页。

第二章

诸子百家在俄罗斯

（下）

一　儒学的实质之争

（一）俄罗斯的《论语》研究

俄罗斯汉学界研究《论语》已有很长的历史，早期的汉学家几乎都从研读《论语》、熟悉儒家学说开始，借以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国情，有的人并已写出了专著。

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的主要著译中有一部《四书》的翻译手稿，一本《书生的宗教记叙》，在后一本书中，比丘林把儒家学说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读书人信奉的宗教。他认为，在这种学说里，神与人、天与地的概念已经合而为一。他强调指出儒家的伦理观具有世界的、宇宙的性质，它已使道德伦理法则与大自然的法则融合在一起。

俄国另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院士（1818～1900）的代表作品之一——《东方宗教：儒、释、道》也把儒学看作是一种宗教。它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儒学。有趣的是他把儒家的礼节同宗教作了类比，认为儒家穿丧服戴孝实质上就是“暂时的僧侣”。瓦西里耶夫也翻译了《论语》。

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都曾在其所著的其他书籍中涉及儒学，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把儒学看做一种宗教，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有特色，即既注意寻找中国古代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共性，又注意考察它固有的

特性。

另一位翻译过《论语》的汉学家是波波夫（1842～1913），正式出版的书名为《孔夫子及其弟子们的格言》（1910），书中附有注释和简短的题解。它对于孔子学说在俄国的流传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在传播儒家学说上起的作用更早的还是瓦西里耶夫，他在喀山大学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期间主持制定的教学大纲，1863～1865年的课程计划中就列有讲授《四书》的课目，这在俄罗斯是最早把儒家学说引入大学课堂的。

波波夫的翻译著作中还有《孟子》，系翻译并注释，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孟子》（彼得堡，1904）。

（二）苏联的《论语》研究

在苏联时期，研究儒家学说的汉学家之中，以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翻译了《论语》的头三章，加了详细的注释和题解，并附有朱熹对《论语》注解的全译文以及宋代新儒学派其他学者的注解。该书俄译本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但到1978年才首次正式出版。不过，阿列克谢耶夫对于儒学的研究功力较深，已经提出了若干新颖而独特的观点。例如，他认为儒家学说总的看来是“无神论的和唯理论的”，尽管在孔夫子自身对祖先的崇拜观中也存在着“赤裸裸的宗教性质”，同时也有一些别的特点会使人把它与宗教等同起来。此外，阿列克谢耶夫对某些观点也有独到的解释，例如他认为孔夫子所说的“礼”

这个概念就具有多义性：既指宗教的仪式，又是行为的规范，还包括一般的礼节。他的阐释对于俄文读者既通俗又深入，容易被人接受。

总之，苏联时期对儒学的研究不如旧俄时代，部分的原因是儒家学说被当做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想，从而遭到冷落。近几十年来苏联学者注意的重心是儒家学说的道德问题方面，强调它的人道主义倾向和全人类道德的因素。

不过，在某些方面所开展的争论要比以前深入，特别是如何判断儒家思想的实质。最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儒学在秦朝以前是一种哲学的学说，从汉代以后则变成了宗教。另一种观点以莫斯科大学教授波兹涅耶娃（1908～1974）为代表，认为儒学从一开始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宗教的性质。在汉代以后不过是加强这种性质并且获得更加明确的形式而已。第三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科学院院士康拉德（1891～1970），他与前两派的看法不同，把整个儒家学说都看做是上流社会的哲学思想。当然，也有人的看法和康拉德针锋相对，这就是苏联时期的汉学家列·瓦西里耶夫（1930～　）所持的第四种观点。他不但以为儒学就是“宗教”，甚至认为儒家学派中就有独特的教会组织。同时，他又把孔子的学说看作全然是尘世的学说、纯理性的学说，只是在中国起的是宗教的作用而已。瓦西里耶夫博士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对中国的宗教和儒学问题都有所探索，并有成果问世。如《古

代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1967）、《中国的迷信·宗教和传统》（1970）、《东方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1976）等书和《孔子的戒律·中国的仪式和司仪》（1971）等论文。

苏联时期对《论语》的翻译和解释也不如以往，未曾出版新的全译本，也不注意阐释该著作的艺术特点和伦理学特点。只有在康拉德和波兹涅耶娃分别编辑的文选中选译了《论语》的某些段落，并且仅仅作为文学作品的文献加以介绍。

二 《论语》专论与《孔子传》

（一）《论语》专论

第一部出版的研究《论语》专著，作者是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谢缅年科（中文名西门诺科，1947～ ），此书1987年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伊凡·伊凡诺维奇·西门诺科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名叶卡捷琳堡）的一个工程师家庭，196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现名亚非学院），1970年毕业，继续在该校读研究生，后留校任教。1973年以论文《嵇康——三世纪的中国作家》获副博士学位。现为亚非学院中国语文教研室教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和古汉语，曾于1991～1992年来北京大学进修一年。已发表论嵇康、

先秦文学、魏晋文学的文章三十多篇。《论语》研究专著是他的一部力作。

这部《论语》研究专著的俄文书名为《孔子的箴言》，书后附有作者所译《论语》的部分译文（约占原文的一半）。据作者意见，迄今为止人们对《论语》的理解往往缺乏对全书从整体上进行考察，不大注意书中内在的含义，尤其不注意古代作品所特有的那种思维的模糊性，他决心从《论语》本文的“内在”含义出发，揭示出它内在的逻辑。因此，作者不再沿用以往的研究方法把孔子分解成：人、政治家、伦理学家、学问家、教育家、哲学家；同时也不再把孔子的学说肢解成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等各种思想。作者指出，这种现代的分类法只会把古代的孔子学说弄成现代的东西，显得支离破碎。

专著除引言外，共分成七章，分别就七个方面作了论述：（1）孔子对语言和言语的态度；（2）孔子学说与中国古代神话及礼仪的关系；（3）时间的范畴；（4）塑造形象的特点；（5）对人的本质以及同这个本质相关的道德之理解；（6）社会性的抗议、逗乐的文化与怪异的形象性诸种成分；（7）治国和求学的观点。总之，专著论述的角度与众不同，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另一个特点，是它力图从中国古代神话和礼仪的广阔背景上，来解释孔子的学说。从这个角度对《论语》作系统阐释的，在世界的汉学研究中还是第一次。西门诺科从孔子学说中分析出若干宇宙起源说的古代神话情节和模式。

这个模式在《论语》里已经增加了社会政治内容和伦理道德的内容，它们是被一层稍后沉积起来的各种不同的意识成分掩盖着的，要除去这个沉积层以发现底下原始神话的内核，确实并非易事。

专著特别重视古代礼仪情节对于孔子学说的影响。在《论语》里，这种情节有：求雨的仪式、丧葬的仪式等一类的“过渡性礼仪”。无论从孔子整个学说，还是从他的行动来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礼仪的若干本质的特点。西门诺科提出的这种看法在国外儒学研究中尚属首次。

据作者的意思，恰恰是对古代礼仪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来阐释为什么孔子会把“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理想的境界。他说，这个概念在《论语》里绝不仅指温和适中，它的含义要深刻得多，而且同孔子性格中的特点有关——有许多研究者把这些特点视同于矛盾性和不彻底性。《论语》里的孔子形象真的是很矛盾的：他一会儿相信天，一会儿只信自身的力量；有时候极端自信，有时候则相反，即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既把社会分成上等人和下等人的规矩奉为金科玉律，同时却极为尊重自由与平等。所有这一切的矛盾现象并不是由于错误而导致的结果，而是体现了一定的原则性——孔子自认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奉行“中庸之道”。第一是在天与人之间，第二是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充当中间人，从而把人与天、这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联合起来。他以自身作为这种错综复杂的联系，把万物联合成一个整体的体现者，

因此他身上才显出各种矛盾的现象和矛盾的原则。作者把孔子学说的这种特点称为两种性，而且指出两种性恰好是孔子学说的一个主要特点，所以孔子的学说具有宗教的和世俗的两种性质。

西门诺科使用这种方法来系统地考察《论语》中的时间范畴、逗乐的文化以及怪异的形象性等问题。

此外，专著所附的《论语》俄译文（部分选择）也与以往的译本不同，不再是逐字逐句直译，而是不仅力图传达出原作的思想，并且赋予它以相应的艺术表现形式，即用押韵的散文体翻译，使俄译本也具有原文特有的诗意风格。

（二）《孔子传》

《孔子传》是评价孔子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系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马良文教授（1950～　）所著，1992 年出版。这是高尔基创办的《名人传记》丛书中的一种。该丛书选择国内外杰出人物入传，每人一卷，负有向广大青年宣传成就卓著的人士，用以进行人生理想和思想道德品质教育的使命。它有严格的选择标准，自 1933 年创始以来，中国名人唯有杜甫第一个入选，于 1987 年出了《杜甫传》。如今问世的第二本——《孔子传》，当是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两国都面临的新形势有关，尤其是新儒学热方兴未艾。

马良文 1972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留校任教，主要研

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于1977年和1988年先后获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曾来华进修，1991年转入远东所。所著《孔子传》遵循丛书预定的风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以序言“回归孔夫子”开始，下分四章：“导师的少年时代”、“克己之路”、“官衔与财富”、“在不朽的门槛上”。结语为“孔子：千万新人的导师”。全书篇幅分量适中，约20余万字，但印数巨大，共15万册。

作者叙写孔子的生平遭际、宦海浮沉；生活道路充满曲折，但一直追求人生理想，孜孜不倦执着于教育工作，坚持到底，矢志不移。作者在书里集中地提出一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圣人?”（第176页）他说，我们在了解孔夫子的生活方式和他那一学派的规矩之后，不由得会给自己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孔夫子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伟大导师?”按理孔子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什么社会背景，更没有巨大的财富，那么在这位人物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如此吸引着广大的青年人，甚至远不止是青年人呢？面对这些充满着对幸福的憧憬，却没有什么生活经验，而且对政治也绝少兴趣的青少年，孔子却认真地从事对他们的教育，他到底抱有什么目的？总之一句话，是什么东西能够把这位导师和他的门生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马良文自我解答曰：最主要的一点是他具有内省精神，不但“吾日三省吾身”，而且一生都在“克己复礼”，不断完善自己，追求成为完美的人。因此孔夫子衡量自己平生

的成就时，不是以地位和财富为标准，而是以自己的人格、人性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为标准。因此孔子很满足于自己向善的状况，即：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这个标准（即人格完善的标准），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只要他愿意终身奉行的话。

因此，马良文认为孔子的“克己”是自我完善的精神武器，而“复礼”则是追求人格完美、个性全面发展之意，是人向往的和谐发展的境界，这才使得青年可以向他学习。而且也可以用这个标准向旁人、周围的人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本传记的作者指出，孔子具有仁爱的胸怀，关心人人要成为完善的人，而且身体力行去教育别人，这也使得学生们很受感动，愿意师从他。即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对人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己要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而人之为人，心欲向善，关键在于立志，矢志不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马良文向青年读者提示，孔夫子身上可以学习的优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道德自我完善。”顺便说明，俄国汉学家们对此点也有同感。例如佩列洛莫夫教授说过：“从普希金时代到20世纪末的改革开始，以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为代表的精神精英们，关注的是儒学中对完美个性的教育问题，即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引自《四书》俄译本跋）。

三　俄国新儒学的代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博士佩列洛莫夫教授的新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1993，404 页）一出版，使他实际上成了俄国新儒学的代表。

全书设五章和一篇结束语。它的一个重点在于讲清孔子的生平和学说，并阐明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共占了近 2/3 的篇幅），是俄国同类书籍中迄今最为详尽的，它对于在俄国宣传和普及儒学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专著的另一个重点在于阐明儒学对当代的作用，即孔子学说的现实意义。作者用商鞅和孔子作对比，说明两人各自代表中国古代对国家的政治文化之形成和发展起作用最大的两派，即法家和儒家。他们相辅相成，犹如阴阳两极的关系；同时又阐明孔子对于中国发展所起的作用比商鞅要大得多，他在民族生活、尤其精神生活上的影响更为广泛和多方面。作者认为，孔子学说不但多方面地决定了中国人思维和民族性格的形成，而且也影响着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的思维和民族性格，今后在东方当代社会发展中还会继续起作用。

由此作者提出，儒学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在部分为俄罗斯前途担忧的人士当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他认为，既然俄国具有欧亚的双重国情，那么就应该借

鉴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验："在孔子的大量论述中，至少有两个方面对当前的俄国有现实意义，即'为人'和'为政'"。

（1）关于"为人"，要注意孔子有关三类国家的标准：有道、无道和乱邦，以规范人的行为，做个有德行、对人民福利负责的人。他说："在有道，即管理得很好的国家中，不出仕显名，仍为贫贱，就是耻辱；在无道，即治理得不好的国家中，还出仕显名，富贵显赫，那也是耻辱；在动乱危急的国家中，人们不要去居住停留。"（按，原文为：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2）至于"为政之道"，他认为，人们更加熟知孔子的思想和言论：子贡问为政之道，孔子答曰："统治者（领导国家的人）要备足粮食，充实军备和取得民众的信任。"子贡问："不得已时，在粮食、军备和民信这三条原则中先去掉哪一条？"孔子答："去掉军备。"子贡问："万不得已时，在剩下的两条中先去掉哪一条？"孔子答："去掉粮食。自古以来，谁都难免于死亡，没有粮食只是饿死，而民众如果不信任统治者（领导人），那么国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按，原文为：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此外，专著开列了俄国汉学家里老、中、青三代的儒学研究者和翻译家近30人的名单，证明其阵容相当壮大。

佩列洛莫夫有中文名，曰稽辽拉，是华裔，其父稽直早年参加苏俄革命，备享尊荣。母为俄国人。他自认出生于如此荣耀的家庭，理应做对中俄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有益的事。他认定，最好的办法是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自从1951年大学毕业后便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于1954年和1970年依次获得副博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的著译有《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1981）、《孔子的〈论语〉》（1992，翻译和研究）、《孔子：生平、学说、命运》和《商君书》（1992，翻译）。1995年被推选为俄国孔子基金会会长。

四 《史记》新论与专著《历史学家司马迁》

（一）《史记》的翻译与研究

司马迁的《史记》一向受到俄国的重视，早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就在《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分两卷，于1950年公开出版）中选译了《史记》中的《匈奴列传》和《朝鲜列传》两篇。苏联时期选译《史记》的有关篇章收入历史、哲学、文学等各种文集出版的有11种47篇次。其中，选译篇数最多的是阿列克谢

耶夫院士编选并翻译的选本《中国古典散文》，计选译自《史记》14 篇：

《报任少卿书》、《太史公自序》、《滑稽列传》、《酷吏列传序》、《屈原列传》、《伯夷列传》、《外戚世家》、《孔子世家赞》、《五帝本纪赞》、《项羽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高祖功臣侯年表》、《管晏列传》、《游侠列传》等。

《史记》俄译文以单行本出版的有两种，一是帕纳秀克（1924～ ）译的《史记选》，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 年；另一种为维亚特金和塔斯金合译《史记》，科学出版社，分三卷分别于 1972、1975 和 1982 年出版，系首次的俄文全译本。

评论司马迁的文章至 1980 年统计共发表 21 篇，论者有比丘林、阿列克谢耶夫、杜曼、康拉德、克留科夫、李谢维奇、波梅兰采娃等，以克罗尔（八篇）为最多。论题广泛涉及司马迁的生平与活动、《史记》的史料、风格、笔法以及各具体篇章的分析，也有从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等不同角度对《史记》做分析的文章。

（二）克罗尔的专著《历史学家司马迁》

尤里·利沃维奇·克罗尔（中文名科洛利，1931～ ）出生于圣彼得堡职员家庭，1954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1957 年起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工作，现为该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两汉的古籍《史记》和《盐铁论》。1963 年以《司马迁——秦亡后的历史

学家》一文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70年出版专著《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史记》及其作者做了全面系统的评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为“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正名，于是流行起什克洛夫斯基、托马舍夫斯基等创立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和巴赫金创立的“复调小说”理论。

克罗尔在其专著中运用什克洛夫斯基和托马舍夫斯基的方法，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分析《史记》。在“《史记》的文艺学分析”和“司马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①] 章节中，阐明了《史记》是一部“无情节”的作品。他认为司马迁写史传的方法是“题材上的串联”，即把史料汇集起来，按照某些题材分门别类，并依据某一题材把有关的史料串联在一起，或以它为中心布局谋篇，当然其中也含有一定的原则，如时间的原则、官阶等级的原则、逻辑和主题连贯性原则和两极对比原则。

同时，克罗尔依据巴赫金的文学批评理论，发现《史记》也有类似“复调小说”的特点。巴赫金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说过：“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而是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

① 克罗尔《历史学家司马迁》，第40~75页。

统一的事件中，而互相不发生融合。”① 克罗尔认为，这段话也适用于说明《史记》。它里面就有“作者的声音”和“书中人物的声音”，司马迁就用了两种不同的、独立的声调对读者说，“太史公”的音调充满激情，而“据传说”的声调则平淡中和。此外，书中各种人物的声调是依据其各自的身份，甚至依照所摘引史料出处的叙事者之声调。

克罗尔又从文化概念的角度来考察《史记》，他力图弄清司马迁在作品中所袭用的文化范畴，并具体地研究了对司马迁作品有影响的两个文化概念：“意”和“类”，即公羊家们所特有的“意，志”范畴和“类”以及“同类相招”范畴。克罗尔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公羊学派所提出的“意”是司马迁写史时所奉行的重要原则，这位史家选择史料都是为了表现这个传主或那个传主的意志和愿望，因而对传主的评价也是首先依据该传主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其意志和愿望；从作传者方面来看，司马迁的文学理论也足以说明，他写史是出于一种传诸后代的愿望，让后代了解他有什么样的意志，并寄希望于后代给他以死后的哀荣。克罗尔从《史记》中的许多传记判断：司马迁构思作品时遵循古代中国人固有的文化概念“类”和“同类相招”——史家作传时既注重表现同一“意”如体现在人物的言论与行动中，更注意表现同一“类”人的意志，而不是仅仅表现孤立的个人，这样他就把个人放在“类”别中，

---

①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第 29 页。

并依照“同类相招”的原则来为某一类人选择史料，串实题材直至构思作品的结构。

克罗尔还从史家的情趣出发来研究《史记》，认为司马迁的世界观中有一种“追求奇异”的因素，或曰“爱奇”、“猎奇”。这是非儒家的观点，而更接近于道家。然而，这种观点却直接影响到司马迁对一系列“世家”和“列传”的传主人物之选择。

克罗尔对于《史记》的翻译本也作了一番考察，他对比了俄文和英文两种译本，并提出若干改进的意见。除了专著，他还有其他文章论及《史记》，如《论司马迁〈史记〉中利用文献资料方法的若干特点》(1961)、《论联想思维对〈史记〉一书的影响》(1974)、《论汉代文学中对待史料的两种传统态度》(1975)、《司马迁关于“六家”的考证》(1977)等。

此外，克罗尔还写过《桓宽〈盐铁论〉中争论的空间概念》(1978)、《北京歇后语分析和转写经验》(1964)等，其研究的领域是比较广阔的。

五　古代文化典籍的俄译

(一) 已有俄文全译本的典籍

俄苏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相当重视，已有一批

作品的全译本出版，如《中国古代神话》，袁珂著，鲁波一列斯尼琴柯和普济斯基合译，科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山海经》，杨希娜译注，科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诗经》，什图金译，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管子》，施泰因译并注，东方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孙子兵法》，康拉德译并注，科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战国策》，金·瓦西里耶夫译，科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商君书》，佩列洛莫夫译，科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此外，还有以单行本出版的波兹涅耶娃1967年编译的《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列子、杨朱、庄子)》。

最新出版的全译本是佩列洛莫夫主编的《四书》（东方文学出版社，2003年)，内含：（1）《大学》，科勃节夫译。（2）《中庸》，卢基扬诺夫译。（3）《论语》，佩列洛莫夫译。（4）《孟子》，波波夫译，马伊约罗夫整理。

（二）已有节译或选译的典籍

所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均有俄文节译或片断选译，被收入各种文集或教学资料集中，它们依次为：

（1）先秦诸子的著作：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易经》、《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孙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礼记》、《列子》、《管子》、《书经》（《尚书》)、《大学》、《中庸》、《孝经》、《吴子》等。主要的译者有波兹涅耶娃、康拉德、费奥克吉斯

托夫、斯节普金娜、杨兴顺等人。

（2）先秦诗歌及秦汉文籍：先秦诗歌除《诗经》外，楚辞也有选译。两汉乐府和汉赋里司马相如、贾谊作品均有选译。秦汉散文《史记》、《汉书》、《淮南子》、《盐铁论》以及王充的《论衡》等理论文章有节译。主要译者为阿列克谢耶夫、艾德林、费德林、吉托维奇、瓦赫金、波兹涅耶娃、波梅兰采娃、施泰因等人。

（3）魏晋文学作品：建安七子的诗文已有多种选译本，曹植和陶渊明的诗俄译选本出过单行本，陆机的《文赋》有全译。主要译者有切尔卡斯基、茹拉甫列娃、艾德林、阿列克谢耶夫等人。

（三）有关古代典籍的论著

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汉学家已写成论著的，除前述西门诺科著《孔子的箴言》和克罗尔著《历史学家司马迁》外，还有费德林著《〈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1958）、杨兴顺著《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1950）、李谢维奇著《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1969）及《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1970）、艾德林著《陶渊明及其诗》（1967）、李福清著《万里长城的传说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1961）、切尔卡斯基《曹植的诗》（1963）等，以及佩列洛莫夫的近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1993）和《中国政治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1981）。

第三章

第一部中国文化典籍史

一　作者瓦西里耶夫其人

俄国汉学的成就之一在于造就了瓦西里耶夫等一批汉学家，而瓦西里耶夫的突出贡献则在于写出了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化典籍史——《中国文学史纲要》。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1900）出生于俄国下新城（诺夫戈罗德），1834年入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东语科学习，1837年毕业留校。他学的是蒙语，但毕业时正值喀山大学校长、著名非欧几何学的创始人之一洛巴切夫斯基（1792～1856）倡议建立汉学教研室之际，瓦西里耶夫便接受任务加修汉语。应该说，洛巴切夫斯基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校长，在他的任期（1827～1846）内喀山大学陆续开设了蒙语、汉语、满语、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及梵文等科目，给喀山大学带来了国际声誉。洛巴切夫斯基还提出设立藏语和犹太语教研室，在1843年甚至作出决定，在喀山大学内建立东方语言学院。可惜后来因政府决定把喀山大学东方语言各科并入圣彼得堡大学而未能实现。不过，瓦西里耶夫在这种东方学热烈的学术气氛影响下，努力学通了汉、满、蒙、藏、梵文，甚至掌握了朝、日文，从而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喀山大学和整个俄国东方学的发展。

瓦西里耶夫为了学习汉语，于1839年被派随东正教使团第十二届团前往中国，1840年到达北京，作为学员开始

学汉、满语。1850 年底回到阔别十年的喀山。1851 年即被聘为喀山大学教授和汉满语教研室主任，除了讲授汉语、满语还教中国史地与中国文学等课。1855 年随着系科合并转入彼得堡大学，为该校东方系汉语教授及教研室主任。任教 50 年内为俄国培养了大批汉学和东方学人才。

瓦西里耶夫一生著述甚丰，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宗教、地理、文学。主要著作除《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外，还有《佛教教义、历史、文献》（1857～1869）、《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与古迹》（1857）和《东方宗教：儒、释、道》（1873）等。他于 1866 年当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 年升为院士。他在研究中国文学的俄国汉学家中是第一个获得如此殊荣的人。

瓦西里耶夫为从事汉学研究曾作了长期的准备，早在北京留学时就竭尽全力搜罗各种图书资料，每购到一种书籍，必先仔细阅读，至回国时共带去汉、满、藏、蒙文书籍 849 种共 2 737 册。他曾得意地说，凡是当时北京市上能见到的满文书籍，他都已尽数购到了。这样，他一回国便能立刻开设讲述中国国情的课程，并成了欧洲最早系统讲授中国文学史的人。据调查，欧洲在 1893 年以前还没有别的高等学校开设此课。他在 1850 年 12 月 10 日对学生讲课的序论是："论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意义"，他痛切地指出，在俄国，甚至知识界都不太了解中国，"看不到站在我们身边的巨人……难道不应该为此感到惭愧吗！"正是出于这种远见，瓦西里耶夫极力主张"把汉学研究引进教育领域"。

从后来他在彼得堡大学讲授的课程来看，瓦西里耶夫是身体力行，把主张付诸实践的人。在该校任教的头20年里，他一直是汉满语科四个年级唯一的教员，除了教语言，还讲述中国和满洲的历史、地理及文学，包括讲解《四书》、中国报纸、中国史书和中国文学名著选译等课程，其艰苦开拓的精神令人钦佩。后来，苏联汉学的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肯定了瓦西里耶夫的巨大贡献，说“他白手起家建立了教学”，“这个学派有90%的内容是由他创立的”。

但是，把一生献给汉学的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却不大为人所知，甚至在俄国也未能充分发表其科学成果。在十月革命以前，他的许多著译无法发表，例如他费尽心血译出的玄奘《大唐西域记》，因为无人问津，只完成初稿就停手了。印刷厂也因为没有汉字，而不能承印。它连同许多书稿放在箱子里存着。有一天，他突然发现，箱子里已空空如也。原来是为他做饭的老婆子都拿去生火烧炉子了。俄国老一代汉学家的科学命运于此可见一斑。

二 《中国文学史纲要》简述

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原是作者应约为柯尔什和李克尔主编的《世界文学史》而写的，它和古埃及、印度文学史合成世界文学史的第一卷。但它后来也单独印行过。全书约十万字上下。由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在圣彼得堡出版。

《纲要》一书依照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前面一部分属“引言”的性质，用“几句开场白”、“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古代汉语和文献问题”三节叙写中国书籍文献产生的背景和条件，说明作者著书的意图。

中间一部分是重点，以儒学的发展为线索，分为“儒学的第一个时期”和“儒学的第二个时期”。实际上，详细评述了中国的儒、释、道学。第一个时期之内，极为详细地介绍了儒家学说，有“孔夫子及其贡献”、“儒家的宗教和政治”、“三部古书：《诗经》、《春秋》、《论语》”、“儒家的伦理道德基础《孝经》”、“体现儒家精神的治国理想的《书经》”和“《孟子》”等书。在“儒学的第二个时期”之内，立即用“同儒学不相容的道教哲学家”和“佛教学说”这两节分别介绍了道学和佛学。这样，论述儒释道占的篇幅颇大，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一强。

后面一部分谈论科技和美文学，有“中国人的科学发展”，“语言学、批评、古籍”，“中国人的农书、自然科学、兵书”、“中国人的诗文”和“民间文学：戏曲、小说、章回小说”等节。这部分是该书的另一重点。

此书内容作这样的安排，曾引起后代苏联汉学家的议论。李福清在赞扬之余指出：“它有一些明显的不足，瓦西里耶夫不是一个文学理论家”，所以把文学看作“是一切文章典籍的总合”。费德林认为作者是受时代的局限，“对中国文学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儒家世界观和思想立场出发，而不是从文学创作的语言艺术角度出发”。

依我们看，作者之所以这样写，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一是受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的影响。在我国历史上早期系文史哲不分家，即向来是文学与某些其他古代书籍不分的，《论语》、《孟子》当然都是文学。瓦西里耶夫长期接触中国古籍，自然也会接受这种看法。另一是有他自己的考虑。在“几句开场白”里他解释说，既然定名为文学史，人们必定会要求作者多多介绍像古希腊、印度人写的那种长诗，或者小说和戏曲。对此，他断然表示不能同意，因为“不能把那些在一种文学中是主要而在另一种文学中却是附属的著作摆到首位。”那么，在中国文学中什么著作是主要的，什么著作是附属的呢？在瓦西里耶夫看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学。“全部中国文明、整个广博而多样的中国文学书籍的基础是儒学”。而属于“美文学”的民间文学（包括戏曲和章回小说），由于种种原因而长期被忽视，不能登上高雅的文学殿堂，因而倒可能是附属的了。这种想法使得这本《纲要》从总体上看更像是一部中国文化史，或者是中国文化典籍史。

三 儒、释、道学评论

《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对象是未曾接触中国古代思想的俄文读者，自然要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反映中国古代思想的典籍，它首次向俄国人讲述《春秋》、《左传》、《书经》(《尚书》)、《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

《韩非子》、《吕不韦》（《吕氏春秋》）、《礼记》、《易经》，甚至《孝经》等中国古代经籍。重点是阐述与儒学有关的著作。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1）简要叙述各有关著作的成书过程，兼考证其真伪，既引证历代注家的解释，也表示自己的看法。如说《春秋》的成书早于汉朝，本是一部记史的著作，后来学者们加以仿效，演发出《公羊传》、《谷梁传》、《左传》。

作者详细解释：《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或其再传弟子所记的“孔夫子言行录”，有时也不是记言行，而是记思想，或仅仅是假定出现什么情况孔子会怎么想和怎么做；有时则记载孔子的弟子们相互之间讨论问题的意见。到了最后一章（《尧曰》）甚至出现尧、舜、禹、汤王和武王等人的话。据此，瓦西里耶夫认为，《论语》的内容驳杂。同时，由于其弟子们观点各异，或因分散到列国，其解释便各取所需，因而出现观点互相矛盾，也发生歧义。子路、曾子和颜回的理解就大不一样。是故，《论语》也是“学派内部斗争所产生的”。

经过对比和分析各种典籍及注家的考证，瓦西里耶夫得出结论：“我们不承认《书经》出自孔夫子的手笔……唯有《春秋》和《诗经》是孔子及孔门弟子推出的两本书”，“而《论语》则可以溯源，追到最接近于孔子的年代。但我们当今所拿到的《论语》，也已不是当年的那本《论语》了。这本《论语》，如同《诗经》和《春秋》一样，是在汉代形成的”，来自“汉初的三种释本”。他断定：“我们可以说，儒学最初阶段的

活动仅限于三本书（《诗经》、《春秋》和《论语》）。”

（2）讲解各部古籍的内容和基本思想。有的结合成书过程夹叙夹议，解释其要义，有的大量引述原著的片断，通过译成的俄文阐述其含义（包括直译和释译）。摘引最多的有《论语》、《礼记》和《孟子》三部。

作者援引《论语》的“尧曰”等章，虽然指出儒学内部的观点不够一致，但从整体上仍然肯定《论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必须充分认识其意义和价值，说：“《论语》对于我们来说，是了解古代儒家学说的命运、这一派学说的发展及其过程之最宝贵的书籍。”

对于《孟子》也有极高的评价。他说：甚至到了近代，像《孟子》那样具有吸引人的巨大魅力的精彩文献也是不多见的。“尤为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依我们看来是如此保守、如此专横的中国那样的国度里，这本书怎么会被允许存在呢。然而，在中国的确是在最初级的民众学校里都以它作为教材的”。瓦西里耶夫从此出发，认为该书具有无上的价值。他大量摘引《孟子》中的“梁惠王”、“公孙丑”、“离娄”、“万章”、“告子”等各篇，对许多章节作了翻译、摘译和解释。

（3）根据古代典籍的内容推断儒家学派同其他学派的关系以及它的政治主张、行为准则和儒家道德的特点。作者指出《礼记》中的“礼运篇”有“下列精彩的地方”，并加以翻译引用：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弃旁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以为礼，城郭汤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男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据此，瓦西里耶夫作出自己的推断，“如此看来，儒家为了达到别人也在追求的那种目标，即为高人一头、荣华富贵和掌握国家政权，就准备放弃他们自己心爱的宠儿——礼仪!”他旁征博引，说在《诗经》中已出现了心甘情愿为国君效劳的那种官吏。孔子自己也说过，只要使他有权便可在两三年，甚至一个月之内治理好国家。儒家学派从一开始就是追求这个目标，而《礼记》的“儒行篇”恰好突出地反映了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瓦西里耶夫进一步摘引了“儒学篇”中很长的一段话来证明他的观点：儒家善于适应环境的具体情况来改变对策，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

作者在系统分析各种典籍的基础上，认为儒学发展早期（第一时期），只能包括《春秋》、《诗经》、《论语》、《礼记》、《书经》、《孟子》，而《易经》则属于儒学发展的第二时期的作品。他援引朱子、程子等众家的解释、八卦图说，直至《皇清经解》、《经义考》等书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同时也阐明《易经》的成书和演变，并肯定其价值。

和儒学相比，作者用来解释道家学说的文字就少得多。但他仍然比较深入地介绍了老子的《道德经》以及与道家有关的一些著作。他认为：“中国的哲学家们，除了讲物质的儒家之外，都力求探索新的因素，感到心中有一种同精神世界相联系的要求——创立关于精神世界的独特的观点，但距离创立某种类似西方或印度的那种宗教，则还相当遥远。我们已经（在《东方的宗教》一书中）阐明，道家本身也采用了刚刚从佛教学来的办法建立了宗教的形式。”

关于佛教，作者说明他已在《东方的宗教》书中介绍了佛教的喇嘛教，那里已经谈到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历史以及在中国独特的佛教教派。不过，在本书中作者还是介绍了《高僧传》、《四十二章经》等佛教经籍。

此外，有关历史书籍还介绍了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也涉及《南史》、《北史》，直至《通志》、《通鉴》、《文献通考》等。其他如有关地理的书籍《大唐西域记》、《大清一统志》等，有关法律的如《通鉴》、《唐会要》，有关语言文字的书籍如《说文解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书画谱》，有关农业的书籍如《农书》、《齐民要术》以及《广群花谱》等都曾简要地写到。

四　古典文学评述

当然，《纲要》介绍美文学的部分也很值得重视，它占

的篇幅虽然不是很长（占全书的一半弱），却对中国文学作了全面系统的评介，而且历史脉络清楚，有不少精辟的论断。

该书首先对文学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做了高度和深刻的概括："中国人对美文学的尊崇也许要远胜于我们。他们从美文学中看到了人的至善至美，认为它不仅是人的智力的体现，而且是人的整个道德方面的体现。"

接着，书中分类评述了诗文、戏曲和小说。

介绍《诗经》占了突出的地位，大量译介《风》、《雅》、《颂》，引作例子以阐释这三类诗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并提出毛承、欧阳修、孔颖达、朱熹等人的注解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他指出，《诗经》是一部民间诗歌集："如果有人对中国今日的民歌也加以注意，那将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各地区，必定存在着富有地方色彩的歌谣。"

《纲要》对诗文分类逐一作了介绍，从《昭明文选》、《文苑英华》、格律诗、赋（《两都赋》、《盛京赋》等），直至"诗体小说"（弹词《锦上花》、《再生缘》、《来生福》）以及"小型百科全书"《三字经》、《千字文》等。瓦西里耶夫充分肯定中国古典诗歌的繁荣，说："倘若我们（按：指俄国人）知道并且高度评价普希金、莱蒙托夫、科里佐夫的一些短诗，那么中国人在绵绵两千年出现的诗人，像普希金他们写的那种短诗就有成千上万……这里只需列举司马相如、杜甫、李太白、苏东坡等"就够了。

《纲要》首次向俄国读者简略地讲述了中国戏剧，并指出中国人对戏剧怀有异乎寻常的爱好，说："中国人……酷

爱戏剧，几乎每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村庄，至少一年一度都要请个戏班子来唱戏。目前，北京总共有十三座戏馆，戏班子则多达一百五十余个。它们全靠流动演出来维持生计。”作者对中国戏曲剧场和戏曲创作产生的历史也有相当的研究。他说：“可以设想，有科白和唱词而可以称之为戏曲的作品从隋代起就流传于民间。官方得知民间的创造，总是为时较晚的。”

中国的戏曲作品浩如烟海，瓦西里耶夫却能选择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典型，写成故事梗概加以介绍，并且给予高度的评价，足见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功力。他指出，《西厢记》所以被中国学者重视，主要因为语言优美。然而，剧本的价值不仅在于语言，也在于关目、曲词和主题。他说：“如果撇开语言不谈，单拿情节和剧情的发展来同我国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再加上台词和曲词……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出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作者并不局限于介绍和评论，而是进一步探索中国戏曲的历史起源。他提出：“戏剧是从印度传来的”看法，同时指出“小说由传说到中篇、由中篇到长篇的发展，其源头可能也是外来的”。但是，瓦西里耶夫从研究历史而得出结论：“无论在戏剧还是小说领域里，中国人都不是单纯的模仿者。这是一个一贯保持着独立自主精神的民族，对一切异邦和外来的东西，她都以自己的眼光加以检验，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改造。因此，戏剧和小说总是显露出中国精神，表达着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

《纲要》分类论述中国小说。它涉及中篇小说如《列仙传》、《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等；章回小说《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直至《品花宝鉴》和《好逑传》等，历史演义如《开辟演义》、《列国》、《七国演义》、《战国》、《三国志》等，论述的内容相当丰富。

作者特别重视《红楼梦》和《金瓶梅》，专为这两部小说编写了故事梗概，收入书中作为介绍。他还说明"只有(《红楼梦》和《金瓶梅》）这类长篇小说……才能使我们充分了解当时的生活，戏剧则不能做到这一步，因为戏剧不能提供同样的细节"，另外，像"《好逑传》这类小说则很难反映中国现实生活"。

通观全书，尽管在内容的安排上不够平衡，而且作者也声明，他谈得比较充分的是儒、释、道学，而对于文学（书中称美文学）则谈得肤浅，其原因是中国的"美文学还是欧洲人很少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难度较大，但我们发现，该书无论从宏观上概括中国文学的历史，还是具体分析诗文、戏剧和小说，都是很有特色的，仍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文学史，而且它论述文学部分的框架，也是近代按体裁分类写的文学史所依据的体例，因而可以说它具有开拓的意义。

16 世纪以来，世界急于了解东方，尤其中国。1585 年西班牙人门多萨写的《大中华帝国史》让欧洲读者首次全面地看到这个东方大国的形象。18 世纪欧洲掀起的"中国热"，进一步介绍了中国的科技、艺术和建筑等古代文明。

然而，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丰富的文学创作则远没有得到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因而，19 世纪下半叶，俄国人瓦西里耶夫的这部著作恰好填补了空白。其他国家学者撰写中国文学史则是在 20 世纪初才出现的，英文本在 1901 年，德文本在 1902 年。我们中国也是 20 世纪初才有人开始写作，到 20 年代才出现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著名的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它们，虽然比外国汉学家写的史书要丰富和深刻，但究竟晚了近半个世纪。

五　瓦氏的其他文化译作

瓦西里耶夫除有前述主要著作《佛教教义、历史、文献》、《东方宗教：儒、释、道》和《中国文学史纲要》外，还有大量文章、译作以及资料手稿等未及出版的著述。译作如《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迹》（附《契丹国志》和《蒙鞑备录》译文，1857），《大清初期对蒙古人的安抚》（译自《圣武记》，1868），《汉语文选》三卷（编、译并注释，1896、1884、1882），《中国文学史资料》等。

其中三卷本《汉语文选》和一卷本《中国文学史资料》选入许多作品的片断，如《论语》、《聊斋志异》等，都作了选译和注解。

第四章

古代文论西渐寻踪

中学西渐的途径之一，是经由西伯利亚到达俄罗斯中部平原和波罗的海边上。西传的不但有古典作品，而且有《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等古代文论著作。

一 《文心雕龙》的译名之争

《文心雕龙》由于内容庞博，理论概念艰深，文字也不易透彻理解，往往令外国汉学家们望而生畏。尤其要找到适当、对等的俄文词汇来翻译，更显得困难。这使得有志于翻译的人也感到手足无措，所以至今没有俄译本。但是，苏联汉学界对于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巨著，还是给予充分注意的。有一批汉语特别是古文造诣高的人对它做了研究，苏联汉学的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就相当重视，在论中国诗学的文著中，多次提到该著作。当代汉学家费德林、艾德林、索罗金等在评述中国古典文学成就时也加以列举。戈雷金娜写过《文艺的定义——中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文”》（1974）等论文，李福清等人在《世界文学史》第二卷（1956）中介绍“5～6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章里也有专谈刘勰的段落。通过这类评介文字，俄文读者可以了解到中国这部重要论著。其中，作用最大的，恐怕

是波兹涅耶娃为莫斯科大学写的教科书《中世纪东方文学》、李谢维奇的专著《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这两种著作，一是作为汉学专业的基本教材，影响大，利于宣传普及，在培养几代汉学人才的过程中起了作用；一是联系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来阐释，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而《文心雕龙》虽然没有俄译本，但经过汉学家们的研究和评介，已经在俄文读者中传播开来。

俄国学者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书名的翻译。莫斯科大学教授波兹涅耶娃指出刘勰的“文”是个模糊的概念。她生于彼得堡的汉学家家庭，1932 年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后，又成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先后受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曹靖华教授的培养训练，古文功底很好，又长期从事汉语语言文学的教学。先秦文学、诸子百家的思想是她研究的一个重点，对刘勰的理论也有比较深的了解，最早指出了“文”的模糊性与多义性。她在其主编的《中世纪东方文学》一书中，阐释刘勰的概念时，认为“文”既指自然界中龟甲虎皮上的花纹、鸟禽的脚趾痕迹、蝌蚪昆虫直至天体的形状，又指人的活动中从人体的文身、汉字的书法、文章文献、广义上的文字直至文艺作品等。因而，它既是大自然本身特点，也是作为自然一个组成部分的人特点的形象化，而创作则是“模仿”自然界的形象。

同时，她又解释：刘勰已经把“文”同道家的世界观（“文与天地并生”）联系在一起，并加进了色（“玄黄”）、形（“方圆”）、声（“泉石”），而人则是从“五行”产生的

最优秀者，具有性灵。人“很自然地”一出现了思想便产生言论，而有了言论便可成文。于是，刘勰把“言”和“文”从哲学领域引向美学。既然动植界万品无须画工锦匠的巧饰就具有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美华”，那么人也就能“自然地”产生“美好的言辞”。

按照波兹涅耶娃的解释，书名既指内容“文心”，也指表达内容的语言技巧“雕龙”，所以她把书名译为“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мыслъ И Ваяние Дракона”，意思是“文学的思想和龙的雕塑。”

随着引用者理解的不同，在俄文的评介文章中，对该书的译名也出现了多种译法。最为通行的是“Резной Дракон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мысли”，意为“文学的思想雕刻成的龙”。它与波氏译法的不同点是不把“文心”与雕龙并列，而是分出主次，一个修饰另一个。共同点在于都把“文心”理解为“文学思想”。

然而，李谢维奇（1932）对于这种译法也不以为然。他认为，“我们最流行的这种译法应当说是很勉强的，因为‘心’并不是思想，而‘文’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他还指出，有的英文本把书名译成“The Literary Mind and its Carving of Dragons”意为：文学的心智及其雕龙（纽约，1959年版），或“The Literary Mind：Elaborations”意为：文心：精雕细镂的作品[1]，都“带有诠释的性质，而且把书名

① 丁刘《中国的文学理论》，芝加哥—伦敦，1975年版，第21页。

肢解成两部分也不很合适”。

李谢维奇在其专著《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中进一步解释道：这里所说的“文”在中国人看来是由词语和文字组成的美丽的花纹，如同其他任何一种物品一样，这种花纹也具有它构成的中心，中央，“心脏”，即“文心”。而刘勰却不同于其他只能靠华丽辞藻雕些可怜“小虫”的人，他“呼吁把龙的图像置于这个‘中心’，其意在于吁请人们创作强劲的、有分量的作品”，因为龙就是宏伟的象征。“这样看来，俄文译名中的‘雕刻成的龙’就不能使用了，因为它顶多只指突出精雕细刻的思想和样式上的华丽。”

李谢维奇又说明了另一层意思：考虑到汉字的“文”使书名带有一般的形象性，而且会把作品同“蝌蚪文”相对比，他只好选择“文字”这层意义。因为，文字既是构成文学作品的符号，也是组成文字花纹的符号。因此，他提出了书名的新译法：“Дракон, изваянный в сердце пцсьмён”，意思是“在文字组成的心脏（中心）塑造起来的龙”。李谢维奇认为“这样的译法既没有脱离汉字的字面意义，又能够传达出刘勰的基本思想”。

李谢维奇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他自从1955年大学毕业之后，就专攻古文和古典文学，先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后来成为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发表过《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乐府）》、《中国文学体裁概念的产生（风、雅、颂）》、《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片段》等

著作和论文，其论著的特点是从现代文艺科学的观点出发来探讨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而刘勰只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有宽厚的汉学基础，又经过长期的研究，他自然能够形成独立的见解而为苏联汉学界所重视。他是苏联最为全面系统论析过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学者之一。

二　教科书和专著对《文心雕龙》的阐释

（一）简要而系统的论述

在教科书《古代东方文学》单辟的《中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专章中，波兹涅耶娃用了长达十页的篇幅讲述该时期的中国。“诗歌艺术理论”，主要的介绍对象是刘勰。波兹涅耶娃就《文心雕龙》对文艺创作的本质和发展历史、文艺创作的民间来源，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作品的分类、体裁形式与艺术手法、作家、评论家与读者等一系列问题所提出的理论，以及该著作对后世的影响等，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她多年研究中国古典文论成果的一个结晶。由于没有译本，俄文读者要了解《文心雕龙》，主要借助于它。

波氏认为，在中世纪初期（三世纪起），中国文学从文体混杂的状态中逐渐分出一个诗学分支，人们开始根据古代的典籍提出若干诗学原则或原理，这是重要的进展。其

中，“对于该时代的艺术实践做出最高概括的是刘勰的论著（《文心雕龙》五十篇）”。

她认为，刘勰把创作的发展同文字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有关龙龟的神话主人公的奇妙的现象起直到经籍所记的有关孔夫子的传说止，创作的发展史也同传统的“历史”学说本身相结合，凡是引用孔子言论的都是为了借其名义来“阐释”刘勰本人以道家观点为出发点而提出的理论概念。承认一切过程的“自然性”（客观性），把关注大自然放在首位，人对自然的模仿，以及相信人的智慧具有无穷的能力（“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等等论断，“都可以证明刘勰的美学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前提的”。

她指出刘勰的观点的实质，说从刘勰反儒学的论题就可以证明他是持道家观点的，例如认定孔子是老子的学生，又如尽管纬书已遭到批评和禁用，他仍然从文艺的角度来用纬书为经书作辩护。但在许多场合下，刘勰是把这两种敌对的学派结合起来的。刘勰理论的这种特点在他涉及的其他美学问题中随处可见。他也不反对文学有教化作用，而这种观点却是儒家所固有的。

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波氏指出，从书名把“雕龙”和“文心”并列就可以看出作者是主张二者相统一的。因为“文心”就是文学思想，也即内容，而“雕龙”则指用语言来表达内容的技巧。可见“刘勰从追求美的愿望导致承认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必须“巨大的思想和美好的形式”并

备。为此，刘勰引出了新的术语：风骨。她解释道，“风”指“思想”也指“空气”；“骨”指“正确的联词”。从刘勰用文学作品与鸟禽作比喻看，有文心而缺乏文采的作品，则如苍鹰高翔在天，也不能供人欣赏。“无论是鸣凤，还是文学作品，都应当达到‘藻跃而高翔’的地步。这个比喻也显示了刘勰美学概念中形式与内容应当结合的标准”。

接着，波氏解释了刘勰的作家、批评家和读者论，她认为，在谈到作家时，《神思篇》和《才略篇》几乎完全重述了陆机的思想，但已加以发展，不把创作活动看得那么神秘，而是清晰地叙述了认识的过程：“用听觉和视觉感知事物……逐渐积累知识……丰富才智……然后静思凝虑。便使创作幻想飞跃，思想涉及以往千年，眼光遍及周围万里。”同时能够把这种想象表现于文辞之中，使之更能被人理解，犹如车轮工匠或厨师的技巧，他们是有丰富经验为依据的。波兹涅耶娃发现，“刘勰在评价作家的才能上是师承曹丕而不赞成钟嵘的”，他的优点是“指出了作家对不同的体裁系各有所长”，如说“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此外，刘勰还把作家的才能分成“缓慢的”和“快捷的”即兴赋诗能手。

至于谈到批评家和读者，波氏分析了《知音篇》论批评家和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原理，说刘勰尖锐地批评了“贵古贱今”和反对新生事物的倾向。但“这种儒家的风气和曹丕所指出的‘文人相轻’的弊病却导致了刘勰的结论：知音千载难逢其一”。不过，刘勰要求批评家要提高修养：

开阔眼界、增广知识、要能抛弃偏见，对于正统的和非正统的作品都要善于理解，以便于对其作出正确的诗学评价，即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使评价既公允又独到。

她说，刘勰把读者接受作品的过程描绘成是与创作作品的过程正相反的认识活动。即“诗人是先产生情感，然后形诸于言词；而读者是先开卷阅读，然后才出现情感”。欣赏就要善于深入体会作者的构思，即追踪其思绪的波浪，使得隐藏的东西也能外露。这样善于欣赏的罕见的“知音”就有刘勰所举的钟子期听琴为例。此外，刘勰还论述欣赏能力系来自于现实的需求（衣食）、艺术（“音乐”）和思维（“思想”）等活动。

最后，波兹涅耶娃集中论述了《文心雕龙》对文学作品的分类和中国文学常用的艺术手法。她说刘勰把文体分成诗歌（有韵律的）和散文（无韵律的）是一大进步。刘勰和孔子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不同，是提出不能轻视谜语和谐辞隐言等民间创作，尽管他们比较粗俗，也应当接受历来被排斥在“高雅诗歌”等艺术殿堂之外的“小说”。接着，她详细解说了刘勰对具体的文学体裁和艺术手法的论断，如赋、比、兴、风、雅、颂，书记、事类、史传，等等，以及它们各自的来源。她还指出“刘勰看待经书，与其说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即当做‘古训’），不如说是从诗学的角度（即当做‘文艺作品的宝库’）”。

此外，波兹涅耶娃还列举了刘勰著作的积极影响。她说，在《文心雕龙》等一系列诗学论著的影响下，萧统和

萧纲开始按这些理论进行文学活动。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就做了把文学作品同民族学、哲学和史学的著作分离出来的实践。

波兹涅耶娃的分析和阐释是否全都准确和符合作品的原意，尽管还可以讨论，但对《文心雕龙》作如此详细和系统的论述的，在俄文书刊里还是第一次。这是她在介绍中国古典文论上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从独特的角度分析

针对《文心雕龙》等古典文论难度大的情况，李谢维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理解同本民族思维方法有重大差异的异族的文学和文化。他的专著《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便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展开的。

首先，李谢维奇列举中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显得怪异的事为例，说明问题的严重。他说，很久以前欧洲人就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感到陌生的中国精神文化及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特点表示惊讶。法国汉学家让·罗得谈到中国人思维的非逻辑性时，感到对许多事物他都无法解释，罗得是否认中国人的思维中有牢固的因果关系的，而这种看法在欧洲人当中绝不是个别的。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看了《易经》的译本之后，竟然这样说："我是为了好玩才来详细叙写这些道理的……我解说这些'八卦'的意思，是想说明它是多么肤浅。"他在简述了一通道家的道理之后，马上用"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什么教益呢？"一

句话表示对这部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不屑一顾。黑格尔对孔夫子也没有好印象。他读了孔子的《论语》之后干脆说道："为了他的名誉，最好不要把它翻译过来。"

不但哲学，就是古典文学也因为中国的表达模式不好理解令欧洲的读者感到"索然无味"，更谈不上加以接受了。民族学家沙尔里·列图尔诺在19世纪末出版的著作《各民族和种族的文学发展》竟然如此形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的散文作品弥漫着一层地道的沉闷气氛，那里面程度不同地集中了千篇一律、令人难受的粗野、迂腐和平庸的东西。这种文学作品比抒情诗更能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古老的，而且其智慧已经腐朽了的民族。"

如何看待这种论调呢？李谢维奇认为只要用鲁迅的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就够了，那就是"门外文谈"！这种情况倒可以说明一个非行家来评论其所不懂的艺术会走得多么远。

俄国人碰到最难解决的问题时，爱用"这好比中国的文书"来形容。但李谢维奇认为，这里面的难题要比"中国的文书"多得多。事实上，要让欧洲读者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还要克服更多的障碍，其中关键问题之一是找出历史上形成的中国思维模式，讲解那些有价值的重要的中国文学概念和范畴。

李谢维奇的论断具有普遍意义。它对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无疑是一服清凉剂。在研究中国文学时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态度几乎不带有任何别有用心的目的。它具有描述和非价值评估的性质。但它

确实是一种对于理解的障碍。它习惯于从欧洲的视角去看待中国文学，把西方的概念强加在中国资料身上，用欧洲的标准来套中国的文学现象，使中国文学适合欧洲人的口味。结果这套标准很难全面表现和代表中国文学。这种方法造成的结果就是掩盖、冲淡，至少是不能理解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掩盖了中国文学是独立的、自成一体的事实。

李谢维奇作为汉学造诣很高的专家，提出的警告是切中要害的。

接着，李谢维奇便从古典文论及文学作品中挑选出若干个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包括体裁模式、艺术手段的术语和美学范畴，分章逐个加以论述，从而阐明中国古代至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他广泛引述了古典名家如孔子、庄子、老子、刘勰、刘向、司马相如、司马迁、班固、曹丕、屈原、钟嵘、陆机、杨雄、董仲舒、王充、朱熹、郑玄等几十人的论著，集中说明以下十二个文学概念："道"、"德"、"文"、"气"、"风"、"风骨"、"赋"、"比"、"兴"、"颂"、"诗"、"小说"。

李谢维奇的专著论析的文学概念概括来说可分成四个方面。(1) 认为"道"、"德"、"文"是总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文艺观。他说"道"指宇宙之路，即大道，其具体表现为"德"，在文字上体现为"文"。(2)"气"、"风"、"风骨"把宇宙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他说"气"是一种以太在宇宙形成为"风"，"风"进入诗歌、创作范围便成了"风骨"。(3)"颂"、"诗"、"小说"等概念是属于文学体裁的，

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文学样式。(4)“赋”、“比”、“兴”则是谈艺术手法即描写手段的。

专著虽然不是论《文心雕龙》的，只是把它作为引证的重点著作之一，但因为引证的次数多，引文多达五十余处。而引文的翻译本身就起到了介绍和传播原作的作用。况且，李谢维奇在引证《文心雕龙》时所作的解释，也反映了他对刘勰的理解，总的看来，也可以说他是从独特的角度（即从文学思想）来分析《文心雕龙》。这里试以他引证最长的一段为例：

在专著的开头，李谢维奇根据《道德经》、《易经》、《说文解字》等书详细讲述了“道”、“德”、“文”各自的来源、含义以及在古籍中的使用情况之后，便引证了《文心雕龙》中《原道》篇一段很长的文字：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府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他认为，这段文字全面地描绘了道、德与文关系的全面图景，“除了引用刘勰原文是最好的说明外，任何的转述或诠释都会显得苍白，而且不如原文鲜明和生动”。同时，根据这段文字不难判断，刘勰是把文字看作某种“文学思想”的体现的，那种思想是宇宙所固有的，只是后来在其逐步

演化过程中才呈现出来。接着，李谢维奇又往下引用一段文字来证明这种思想：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他指出，“刘勰在这里明白揭示文的最初来源是现实生活之外的太极”，而道也是来自太极。李谢维奇作出结论：这种关于文、道起源的观点从所引文章已经看得再明白不过了。

李谢维奇在阐释古代传统的文学概念时，总是在适当的机会引用《文心雕龙》的论断为证。这里还可以举“风骨”为例。他依旧先根据《诗经》解说“风”的起源、演变以及它的几层意思，然后说明是刘勰加进了新的含义，增加了“骨”，创造了新概念“风骨”。同时，引用《风骨》篇的一段话（译成俄文），以讲解这个概念的含义：

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若能……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他以此说明，“风”已在《文心雕龙》中增加了新的意义，被看做作品内部的某种基因。缺乏这种基因，文采便毫无

用处。同时也看到“风”与“骨”的关系。

总之，李谢维奇在专著中使用《文心雕龙》为材料，只是作为例证，目的在于阐明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看法。专著最后的归结是“文学之时代”、“古代与现代”、“从伦理学标准到美学标准”等原则。俄文读者看了这部系统、充分地讲解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术语之后，不但可以了解中国文学思想，而且有助于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能读懂和接受更多的东西。同时，也可以增加对《文心雕龙》的了解和理解。

三　专著论《二十四诗品》

我国唐代诗人司空图（837～908）的著作《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见俄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诗论时经常关注的重点。

苏联科学院瓦·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早年潜心研究唐诗十年，完成著作《中国诗论·司空图〈诗品〉》，于1916年出版。这是一部熔评、译、注于一炉，有790页（16开本）之巨的专著。它不但在俄国是第一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诗论的巨著，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的。

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评论，设四篇十四章，其中第一篇有四章，分别论述《诗品》的历史、内容、艺术技巧和它在中国文学以及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重点是

系统阐释《诗品》的内容及其深刻含义。在分析诗品采用的语言手段和其他艺术手法时，也写得相当精彩。第二篇有五章，分别介绍《诗品》的版本、注家、仿作（即续《诗品》等）和它的英译本。文中贯穿着比较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第三篇评述司空图其人。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经历及传记材料、作为人和作为诗人的品格以及他的其他诗作，也分为五章。这里面涉及司空图同陶渊明、李白、韩愈等作家的相互关系或所受影响。第四篇从方法论上论述如何对待这部长诗。指出汉学家们，特别是英译本译者的缺点，往往是对原作没有弄懂，或者学得肤浅，因而闹笑话。他提出自己在本书里打算怎样处理译和注，怎样看待《佩文韵府》、各代注家和英译者等，也有四章。从中可以看到阿列克谢耶夫在方法论上所作的更新。

第二部分是翻译和注释，共分两篇。第一篇是《诗品》的译和注，按二十四品为序，每一品都有综合分析（题解）、直译（照字面逐字翻译）、意译（并参照俄语的音节和韵律修改润饰）和注释四部分。这里面的直译和意译固然要紧，往往能显示译者的功力，注释部分也值得注意，每个词、每一句、每一段以至从总体来说每一品都有注释，其篇幅往往比翻译部分大十几倍或几十倍。以第一品《雄浑》为例，题解、直译和意译共合为二页，注释部分则有22页。总之，注释不厌其详，都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有出处的引文和注文。第二篇是三部仿《诗品》之作，即《画品》（黄钺）、《书品》（杨景增）和《续诗品》（袁枚）

的译和注。当然，这三部都只摘选若干片段。

书的后一部分附入《诗品》原文和作者摘录的大量中文资料（用以注解本文的）。注解资料与本文（原作）之比为132页比14页，几乎近十倍。最后，还有人名书名和词语的索引（俄、中文各一份）。全书看来不仅有严密的体系，而且是认真的学术著作。

四 《诗品》和《文赋》同欧洲文论之比较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这部著作，其特色有二。一是把《诗品》与中国早期文学思想、前辈诗人的创作和司空图本人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考察，对《诗品》作出全面与科学的分析。作者具有文学史家的眼光，把司空图的《诗品》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长河中来研究，从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唐李嗣真的《画后品》到司空图以后的各种仿作，理出纵向的历史脉络，借以阐明司空图《诗品》的地位和价值。又从横向来对照花品、茶品、鱼品、书品、画品，以指明“诗品”这类作品的特点。由此得出结论：“不能把《诗品》和司空图的其他诗作等量齐观，而应看做是独特的专著。”他并引证苏东坡、王士祯、张之洞等人的评语，以论述《诗品》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这部长诗无论“从欧洲和从中国的观点来看，都堪称一部杰作”。这部专著第一次阐明文学活动与社会发展、与整个文

化的关系。

另一个特色，是从诗学的高度来评价《诗品》，并与欧洲的诗论作对比，开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先河。阿列克谢耶夫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待《诗品》，指出它既然是一部诗论，就不能像对待一般的诗歌那样去挖掘诗人的内心和分析形象，而应看做是一部理论著作。接着，便阐明《诗品》可以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公元前 65 ~ 前 8）的《诗艺》和法国诗人布瓦洛（1636 ~ 1711）的《诗的艺术》相媲美。阿列克谢耶夫赞扬《诗品》说："司空图的长诗在世界文学上应当占有一个极其荣耀的席位。"

此后，阿列克谢耶夫不断深化比较研究的观点。在 20 世纪 40 年代重译了这部司空图的《诗品》。

阿列克谢耶夫在 20 世纪 40 年代写出两篇比较文学研究的长文《罗马人贺拉斯和中国人陆机论诗艺》和《法国人布瓦洛和同时代中国人论诗艺》。作为第一篇文章的附录，全文翻译了陆机的《文赋》，一起发表在 1944 年的《苏联科学院学报》第三卷第四册上。这是《文赋》的第一次俄译本。

他在论文中把陆机和贺拉斯做了系统的对比，特别做了《文赋》内容的综合阐述，并指出："它一方面完全渊源于中国文学和哲学理论，特别是孔子和老子的理论，即中国文学史上两种长期对立的文学思想：孔子忠诚为人服务的'用世'思想和老子怀疑论的'遁世'思想，另一方面，《文赋》又决定了后来一切陆机式的中国诗人和诗评家的诗

歌创作。”

同时，阿列克谢耶夫着重肯定了陆机著作的特色和现实的诗学意义：“就是在今天，陆机的《文赋》恐怕还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出发点，而陆机的语言也能为每个懂得一般古汉语的人所理解。陆机的作品尽管有其种种中国特色，但与列入我们往昔的古典教育体系的贺拉斯作品相比，对我们恐怕更少异国风味。对于世界诗人的心理与精神因素来说，他所作的贡献并不比罗马诗人贺拉斯为少。贺拉斯在《诗艺》里所写的内容，‘为’诗人的比‘论’诗人的更多。在‘论’诗人这个题目上，陆机用的功夫比贺拉斯更大。”

阿列克谢耶夫关于陆机的论断至今在俄罗斯汉学家中，还是最深刻的一位。

五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前驱

阿列克谢耶夫长期研究中国古典文论，形成了系统的中西比较诗学的观点，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倡导开展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最早从理论上阐明这种比较的意义。他指出，比较研究不应该有任何限制，所谓“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任何时候也不能混淆”、“中国很特殊，比较研究往往不能见成效”等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如同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比较研究是一项重要工作”。他指出比较研究

的意义：从比较对象的相异处可以说明诗人们各自的特色，从比较对象的相同处可以理解整个世界、人类和文学。

（2）把司空图、陆机和贺拉斯、布瓦洛放在一起对比，尤其具体地对比了《文赋》和《诗艺》。一方面对比出不同点，从他们如何对待文学前辈，即从继承传统、文化交流、创作过程中的用词习惯、对诗剧的认识、对音韵的看法以及诗人的气质、文章的述说语气等方面，分析两位诗人的差异，从而说明这些差异正好构成他们各自的艺术特色。

另一方面注重寻找中西诗人的共性。他分析了陆机和贺拉斯的共同点，即①相同的理想：把古代理想化，以古诗人为楷模。②相同的诗学原则：主张诗要朴实、和谐、能打动读者心弦，诗应高尚、雅致、质朴、明快，色彩调配相宜，诗应有大胆的幻想、出奇的比喻，以形象感人，诗人应是一位超人，而不是平庸之辈，反对诗人以诗取宠于帝王。③相同的创作观点：重视继承优秀传统，诗人既要有天才，又要能刻苦实践，应放弃盲目模仿而崇尚独创，诗应以“美”取胜，并以“娱乐人和教益人”为原则。通过对比后他得出结论：“被全部历史条件所隔绝的两位诗人，用同一题材各自写下了非常相似而又无疑是互相补充的诗论”。“在中国诗学里，当我抹去了使东西方为之隔绝的异国色彩时，便看到了具有全人类性的手法。”

（3）尤为可贵的是，阿列克谢耶夫作为欧洲人，并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方诗学的原则来分析东方诗人，而是从中国诗歌的实际出发，切实地论述中国诗艺。他高度赞扬了

陆机这位中国诗人和诗论家，分析陆机那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灵感，超俗的眼光，说陆机“处于如痴如狂的艺术灵感之中”，“似乎置身于世界的中枢，从那里用特别的、非尘世的、永恒的、像宇宙一般混沌的眼光看事物。他的想象张开翅膀，在广阔的天空遨游，志趣高尚。这种艺术想象，片刻之间，可以纵观古今，也可历览四境”。又说陆机是一位超人，“他的文思不受疆域的限制，涉过亿万年的桥梁……它随天机而运动，来自激荡胸中的风暴，泉水似的涌现生活”。他甚至夸赞陆机是“宇宙的寓言家，能把宇宙的一切概括在形象之内，把美的事物表现在笔端”，也夸赞陆机作为诗人的高尚修养、情操和气质。

与此同时，阿列克谢耶夫指出司空图以及一大批中国后世的诗人及诗评家都和陆机同属一类，他们的“全部文学作品都充满了陆机的思想，乃至他的用语”。这样，阿列克谢耶夫的评论就具有概论中国诗艺的性质。

从阿列克谢耶夫精辟的论述和率先实行的比较研究工作看，他无疑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前驱。

阿列克谢耶夫 1902 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916 年出版论司空图《诗品》的专著后，即连续获得硕士（1916）、教授（1918）、博士（1919）学位，并先后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23）和院士（1929）。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对俄苏汉学有全面的开拓，但他对中西比较诗学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第五章
敦煌文献和黑城文物

一　俄藏敦煌黑城文物窥秘

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了互访，双方达成协议，合作影印出版藏于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的全部敦煌、吐鲁番和黑城文献，计划三五年内出齐。这在我国文化界引起颇大的反响，[①] 它将使我们有可能窥见俄国秘藏的中国文宝。

敦煌宝藏包括艺术品和遗书等方面，仅遗书总数就达五万余卷，大部分为中国古代上起十六国时代，下至元代，即从4世纪到12世纪800年间的巨大文化积累。湮没了近850年的敦煌石窟遗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发现。随后，英、法、日、俄、等国探险者接踵而至，劫走大批敦煌遗书，运出中国。目前，这些遗书分藏于伦敦、巴黎、东京、圣彼得堡等地。我国国内也有部分散失的遗书被搜集藏于北京等地。

遗书在俄罗斯的收藏处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所藏敦煌吐鲁番遗书共有12 000件，包括完整的卷子和残页，就卷数而论，约占全部现存敦煌文献的1/4，其中有许多是精品。

除敦煌吐鲁番文献外，在该所还藏有大批哈拉浩特文

---

① 参阅《联合时报》1990年7月13日，《文摘报》1990年8月2日报道。

献，系取自1909年发现的西夏古城遗址哈拉浩特——蒙语，意为“黑城”，即西夏的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故亦称黑城文献。该处现存的黑城文献有九千余件，有从宋朝、辽国、金国传到西夏的名贵刻本，有西夏刻的儒、佛、道家经典，有文牍、地契、版画、民间唱本、杂字、医书、药方、历书、算命、星相等珍本，还有元代纸币宝钞。其中，珍本如《礼记》、《论语》、《汉书》、《新唐书列传》、《广韵》、《南华真经》、《六十甲子歌》、《六壬秘课诀》、《出典土地文》等。这批独一无二的文献，对于揭开西夏历史上许多未被人知的事实，极有参考价值，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也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据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的我国学者考察，这批黑城文献中，就有一部我国原本失佚的民间文学珍品南宋（金）时期的《刘知远诸宫调》（已是残本），还有早期木刻年画《四美图》、木刻纸马《义勇武安王位》（关羽像）、《佛教三字经》以及星相书等，均是未被世人所知的中国古代民间文学艺术之珍本①。

二　敦煌黑城文献何以流失俄罗斯

19世纪中末叶，帝国主义者开始觊觎我国西北边陲地

① 参阅王树村《游苏所见中国民间艺术藏品》，《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1期。

区，同时利用有学术兴趣的学者对该地区的地理和历史开展考察和研究。1903 年成立的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就是这类组织之一，其任务是派遣探险队到有关地区考察历史古迹和风土人情，以探明情况，作民族学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并进行“科学上的抢救”——盗掘和劫掠由于气候特殊而得以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和摩尼文化等稀世珍品。俄国委员会所派探险队由政府外交部管辖，经费由财政部拨给款项。

俄国委员会从 1903 年起派出多批探险队前来中国。如 1903 年派彼得堡大学教师巴拉津前往西藏大昭寺，写有关于该寺的著作。1904 年派别列佐夫斯基去库车，著有《库车、吐鲁番考古队供应委员会的报告》。同时，俄国驻乌鲁木齐和喀什的外交官员也从事考古和搜罗中国文物的工作。驻喀什领事尼·彼得罗夫斯基就写了《喀什一带的佛教文物》、《喀什古迹考》等文，秘书多尔别热夫则写了《从喀什到罗布泊往返行程报告》。历次探险队的活动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有以下几次：

（1）1907 ~ 1909 年由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率领的蒙古—四川探险队在戈壁沙漠里发现哈拉浩特古城的废墟，发掘出许多珍贵文物，包括近两千册西夏文、汉文等写的书籍，以及古钱币和艺术品，运往俄国收藏于东方学研究所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科兹洛夫（原译名哥司罗夫），系陆军出身，此前已多次参加探险队到过我国新疆、西藏等地，1899 ~ 1901 年曾领导蒙古—西藏探险队从阿尔

泰山穿过中央戈壁、经塔里木盆地到达藏东北和藏东南。最后一次是 1923 ~ 1926 年率蒙古—西藏探险队来中国活动。著有《蒙古和喀木》(1905 ~ 1906)、《蒙古、阿姆多和哈拉浩特死城》(1923)、《1923 ~ 1926 年蒙古旅行记》(1949) 等。

(2) 1909 ~ 1910 年由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登堡(奥尔登堡，1863 ~ 1934) 率领，有摄影师杜金 (1863 ~ 1929)、测绘员斯米尔诺夫等参加的探险队，考察了喀什、吐鲁番、库车地区的古迹，挖掘大量文物和资料，后分藏于东方学研究所档案馆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考察结果曾于 1914 年在彼得堡出版:《鄂登堡关于 1909 ~ 1910 年俄国东土尔克斯坦的考察工作简报》，内附表 93 张、插图 73 张，平面图一幅。鄂登堡手稿中有吐鲁番石窟的详细记载。

(3) 1914 ~ 1915 年由鄂登堡率领，有杜金、斯米尔诺夫、画家宾肯贝格、民族学家罗姆贝格、十名助手和一名翻译 (中国人) 的大规模探险队，考察了敦煌石窟，劫掠千佛洞的大批文物珍藏，运往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东方学研究所收藏。鄂登堡著有《敦煌石窟概述》(手稿)，发表《俄国东土尔克斯坦的考古调查》(《喀山博物馆学报》1921 年第 1、2 期)、《千佛洞》(《东方》1922 年第 1 期)、《沙漠中的艺术》(《三十天》1925 年第 1 期) 等文。鄂登堡从 1900 年起为科学院院士，是俄国印度学学派的奠基人之一，

后来成为苏联著名的东方学家[1]。

三　敦煌文献的整理与佛教经卷的出版

鄂登堡率领的探险队在敦煌工作了六个月，1915 年回国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经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等历史阶段，他运走的大批敦煌写本、资料实际上只能搁置起来，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才发表几篇介绍性的文章，详细描述敦煌石窟的手稿也未发表。杜金拍摄的一千多张照片也未投入使用。

20 世纪 30 年代起，有一位东方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弗卢格（1893～1942）是从事中国图书版本研究的，写出中国印刷史方面的书，曾清理过这批敦煌资料，他所编成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中文古代佛教写本简明著录》[2] 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彻底的整理工作从 1957 年开始，当时的亚洲民族研究所（现名东方学研究所）组织一批青年汉学家着手清理，编纂《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写本综录》，分两册。第一册收录残卷 1 740 件，于 1963 年在莫斯科出版，第二册收录 1 211 件，于 1967 年出版。第二册书末附有由该所研究

① 据密丽班德《苏联东方学家辞典》，莫斯科；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上，第 119～121 页。

② 《东方书目》杂志 1936 年，第 8、9 期。

员孟列夫写的文章，对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藏敦煌写本整理工作做了总结，并论及敦煌写本的断代问题。

据清理结果，该所全部收藏品共 12 000 件，包括完整的卷子和残页。残页中，绝大多数（约五百号）是各类文件。全部文件的发表工作由丘古耶夫斯基负责。其所编《敦煌发现的中国文书》共出四册。第一册包括 400 件经济类文书、73 幅影印件及有关的研究文章，随后又出版其余三册。

该所研究员孟列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孟史科夫，1926～　）从 1957 年起始终致力于此项整理与研究工作，现已是俄苏有名的敦煌学专家。他从敦煌俗文学写本里发现了几种变文残卷和若干民歌体的韵文作品，经他整理出版的已有《维摩碎金（维摩诘经变文残卷）》和《十吉祥》（莫斯科，1963）、《双恩记变文》（1972）、《妙法莲华经变文》（1984）等。他出版的变文，每篇都是全文影印，以供对照原件的影印件进行勘考释读；同时附有孟列夫的俄译文和详细注释。

作为研究心得，孟列夫为每种出版的变文本都写了序文，分别提出与变文体裁有关的若干问题进行论述。为《维摩诘经变文》和《十吉祥》写的序是《论变文的种类及起源》，文中论述了变文韵文部分的韵律问题。为《双恩记变文》写的序《报恩变文》讨论了变文的思想内容（佛教与孝道）和结构诸问题。后来，他以此为基础写成学位论文《报恩经变文》，于 1976 年获得语文学博士学位。为

《妙法莲华经变文》写的序《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则论述了变文的讲唱方式和讲唱人，以及变文的词汇特点。孟列夫研究变文是多角度的：从版本学、古字体学、文学史等角度着眼。他对于古字体学的研究是如此深入，甚至写出《公元后一千年间的中国抄书业》这类文章。

孟列夫博士整理敦煌文献时，还编出《中国敦煌写本·佛教俗文学文献》（影印敦煌赞文附宣讲，1963）和唐代诗人《王梵志佚诗集》（1989），后者是从敦煌卷子里辑录的。他曾在《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69期（1965），著文《敦煌发现的已佚类书的残卷》，谈到这本卷子，并引起日本学者川口久雄教授对此书多次发表评论。目前，孟列夫所辑《王梵志佚诗集》和我国张锡厚编《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相比，多了从这本敦煌残卷里辑录的60首佚诗。他所作的俄译及注释也极有益于对王梵志的研究工作。

东方学所列宁格勒分所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工作的，还有女汉学家杰米多娃和古列维奇。前者在1974年以论文《作为四世纪末至九世纪初中国文化遗存的敦煌书籍》，获得副博士学位。她在文中把敦煌书籍的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1）4世纪末至6世纪70年代，即东晋末至南朝末；（2）6世纪80年代至8世纪70年代，即南朝末期至唐初；（3）8世纪80年代至9世纪40年代，即唐初至西夏初年。同时，她也考察了写本的各种装帧形式：卷子、散张、经折装、“旋风装”、册装。杰米多娃还写过《〈大乘入藏录〉

及其对研究佛教文献的意义》[1]、《六朝时期中国佛经写本的抄录地点与流布》[2] 两文，描述该所的敦煌藏品中一部历书残本和《佛名经》残本，根据刻工、字体等方面确定其刊刻的时间。

古列维奇写的文章《佛本生变文残卷》[3] 和《关于非佛教变文的体裁问题》[4] 两文，则根据她新发现的佛本生变文三件残文（做了翻译）进行考据，断定其中的一件文字与宣讲“善财童子”[5] 的经文比较接近，并作了论证。

有意思的是，汉学家克罗尔和热洛霍夫采夫（1933～ ）曾合写过一篇文章《论“变文”一词的来源和含义》,[6] 评述了郑振铎、程毅中、关德栋、孙楷弟、周绍良等各家对这一名词的解释，认为它并不是佛教界创造的，而是训诂家首先使用的。最早见于司马相如《上林赋》的郭璞注，意思不过是“变化的文词”。但在后来佛教的讲经活动中，这个名词获得了新的含义，表示“以新的体裁对原有主题进行艺术改编”。[7]

---

① 《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文集，莫斯科，1970 年，第 95～99 页。
② 《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文集，莫斯科，1974 年，第 76～84 页。
③ 《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 69 期。
④ 《远东》文集，莫斯科，1961 年，第 24～35 页。
⑤ 《华严经·八法界品》。
⑥ 《亚非人民》1976 年第 1 期。
⑦ 据李福清《敦煌文献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6～19 页。

四　黑城文献的整理与西夏学的形成

我国曾经有过许多古代文物外流，成为国外收藏的珍宝，而我们要进行学术研究时，反而需到外国去求索，西夏文物的流失即其一例。它在我国文物馆所存可谓寥寥无几，而当年由科兹洛夫带去的哈拉浩特（黑城）文物资料，经过孟列夫博士坚持不懈地悉心整理、著录，按佛经、古籍、小说、杂文、官方文件、药方、历书等分类并译释成内容提要，共有375品目。已编成《哈拉浩特中国文献综录》出版，它首次介绍这批文物中11至14世纪的全部汉文文献，共计400件以上。并有孟列夫写的序文《西夏国汉文文献》，论及汉文文献在西夏国的巨大作用。这批书籍中有不少稀世孤本，如12世纪上半叶的佛教经籍《智理》、《夹颂心经》，今佚的宋代谐文集《新雕文酒清话》刻本（存五至九卷），每页15行，每行27至29字，内容提到陈大卿、白行简、安鸿渐等人的作品。[①]

这些西夏文物早在辛亥革命前夕（1910）就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京都大学曾派狩野直喜博士来华了解情况，后转赴欧洲去考察中国丢失的文物。1913年日本《艺术》杂志4卷1号发表他1912年10月20日由彼得堡发回的信，

① 转引自李福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第20页。

信中说：他在俄京察访到科兹洛夫在甘肃一带发掘的文物中，有西夏语《掌中字汇》，唐代刊印的《大方广华严经》，宋版《列子》残本，西夏文字经卷和杂剧零本。“杂剧零本”下注“匆忙过目，未能断言，疑为宋刊，此为海内孤本，为元曲之源流特放一大光明也。惟惜纸多破损！”[①] 此残本即《刘知远诸宫调》[②]。

孟列夫还写了《哈拉浩特中国书籍插图》一文，介绍藏书中许多刻本的插图，同时复制原图合编成书，收入《哈拉浩特·研究与资料》一书中出版。

然而，黑城存书的主要部分毕竟是西夏文的典籍，还有待于人们去掌握和研究。1959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的克平（1937～　）便是被选的人员之一。她从学习掌握西夏文着手，逐渐进入整理典籍的工作，1968 年发表论文《西夏语动词体的范畴》，1970 年以《西夏文〈孙子〉词汇与语法研究》的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接着又出版专著《西夏文语法》，她已成为俄苏有数的西夏学专家。有一部现已失传的唐代小说集《类林》的西夏文译本，经过她的整理，已于 1983 年在莫斯科出版，该书除影印出版原文外，还附有俄译文和她写的文章《一部今佚的中国类书的西夏文译本》。她的工作也为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此外，西夏文的《文海》木刻复印本（第一、二卷）

---

① 转引自王树村《游苏所见中国民间艺术藏品》，第 21 页。

② 严绍璗《狩野直喜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学林漫录》1983 年 3 月第 7 集。

也已由克平等人合译成俄文，于1969年在莫斯科出版。

五　西夏文本助《类林》重现原貌

我国已失传达700年之久的历史人物故事集《类林》，如今借助于西夏文译本得以还原汉文，再以完整的面貌重新面世。其复原过程分两步完成。

先是俄国学者克平的整理。她在科兹洛夫探险队1909年在我国西夏遗址黑城所获文物中，发现西夏乾祐十二年（1181）用西夏文刻印的《类林》。经过整理，于1983年在莫斯科出版。书中除影印西夏文原件外，还附有俄译文和注释；以及克平撰文《一部今佚的中国类书的西夏文译本》（8～35页）。全书576页，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出版。

后来我国学者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等花去几年时间，将西夏文本《类林》全部译成汉文，并参照王朋寿的《类林杂说》、敦煌《类林》残页等文献反复研究，终于复原了唐代《类林》古本，使这一失传多年的古籍重放异彩。①

史金波等专家谈及研究后的体会，认为《类林》西夏文译者的水平相当高。虽然将汉文《类林》译成西夏文难

---

①《失传700年，〈类林〉现原貌》，《新闻出版报》1994年6月10日。

度很大，但绝大多数条目翻译准确，体现了《类林》的原意，语言运用基本顺畅通达，前因后果交代明确，在其他史籍中都有印证。

他们合著的《类林研究》[①] 一书中，有《类林》西夏文影印本、西夏文、汉文对译相通译本，还有《类林》复原本。他们对《类林》的源流、版本、复原的方法、译文的特点以及在语言研究中的价值作了多方面探讨。

《类林》是我国最古老的类书之一。系由魏文帝曹丕组织人力编辑的工具书，但它久已亡佚。中国古代的类书，除官修之外，还有私家类书。《类林》便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一部私家类书。它近似于现代的故事汇编。原书有 10 卷 50 篇，所辑故事分作 50 个门类，一个门类所收故事最多的有 30 则，最少的仅两则，全书按儒家忠孝节义、功名利禄的思想分类编排。收录的 500 多条历史人物故事，起上古时代，迄唐朝初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民情、日常生活等方面。

作者于立政为唐初宰相于志宁之子，做过吏部郎中、国子司业。史金波等认为，于立政著书时所参阅、采纳的古书至少有 80 种，其中既有常见的史书，也有罕见或已失传的典籍，还有鲜为人知的地方豪族家传、别传、州郡人物传记及记载风土民情的各种文集。《类林》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一问世便为世人所爱。

---

① 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关于《类林》，我国古代《新唐书·艺文志》中就有明确记载："于立政《类林》十卷"，《宋史》等书中也有相同记载。但由于书已亡佚，近代书录中就再没有记载了。此次发现的西夏文本，可算是极大的贡献。

第六章

藏传佛教入俄

俄国古称“罗斯”，或称“基辅罗斯”。古罗斯本来是个多神教的国家，十世纪中叶东正教开始由拜占庭传入，公元988年，由弗拉基米尔大公定为古罗斯国的国教。当年，弗拉基米尔大公为了逼迫全体居民崇信该教，乃集合民众于基辅市的第涅伯河畔，把他们统一赶下河里去游水，表示已经“受洗”。从此东正教便成为俄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宗教。

东正教原是基督教的一支，基督教曾在公元四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但随着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尤其在西部势力日益衰落之后，基督教也形成了分别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西两派。以罗马为首的西部称为天主教（亦称罗马公教）。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部为东正教。因君士坦丁堡系拜占庭——希腊帝都，故东正教亦称希腊正教。该教被俄国接纳为国教后，在促进古罗斯的统一和发展上有过很大的贡献，也由于藉统治阶级的扶植，势力显得非常强大。凡是不肯信仰该教的居民，都会以“异教徒”的罪名受到政府的迫害。在那种情况下，其他宗教要传播，自然是难乎其难。

那么佛教又是怎么可能，而且是用什么方式才得以传入俄国的呢?

说起来真不简单，佛教传入俄国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

路程，经由藏、蒙、俄三个民族传递，分成两步前进，先是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域中传开，接着才争取到达俄罗斯腹地，其间历时三四百年。

一　在蒙古族聚居区传播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南亚次大陆北部，其发祥地在今尼泊尔、印度毗邻处。公元一至二世纪间，佛教分裂为两派：小乘和大乘。稍后，从大乘佛教中又分出一个支派——喇嘛教。它产生于中国的西藏地区，在俄罗斯传播的就是这支藏传佛教。

我国的藏传佛教在俄罗斯境内传播的范围，主要在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和图瓦人聚居的三个地区。其实，这三种人均系我国蒙古族的后裔。他们或游牧西进，滞留于俄国而被归化，如卡尔梅克人；或居住区原属于中国版图，只因后来沙俄扩占疆土才被归并入俄国之境，如布里亚特人。因而对于这些部分人来说，与其说是佛教传入俄国，不如说本来已经是佛教的信徒们被迫归顺了俄国。

中国的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个派别，由莲花生等僧人把印度的密宗传入我国西藏，依据当地的实际而西藏化，成为喇嘛教。这支藏传佛教有红教与黄教之分，以僧人带红色帽或黄色帽为标志。喇嘛教的红派曾从 13 世纪初起传入蒙古。不过在蒙古真正传开的却是稍后的黄教派，它兴

起于15世纪初，从16世纪末开始就在内蒙古和外蒙古传播开来，至1640年被定为蒙古信仰的独一无二的宗教。

显然，藏传佛教传俄的途径之一，在西路是由西藏传到同是我国境内的蒙古族地区，再由蒙古族带往游牧西进，到达南俄草原卡尔梅克，落地生根。

另一途径是由西藏，经过蒙古进入现位于蒙古国境外北方的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俄属），入其首府乌兰乌德市。再辗转至帝俄首都圣彼得堡。

（一）西路

卡尔梅克的那一路起于17世纪的30年代，由土尔扈特部进行。土尔扈特原是我国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的一个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在额济纳河北面）一带。17世纪30年代，他们遂西迁，入俄境至伏尔加河下游。土尔扈特部虽然远离祖国，但与国内的联系始终未断。康熙四十三年（1704），该部首领阿玉奇之嫂携子阿拉布珠儿及部众不远万里回到西藏朝佛。事毕返回时，为盘踞新疆的准噶尔部所阻，阿拉布珠儿便请求清政府予以收留，并划给牧地。康熙帝准其所求，封阿拉布珠儿为“贝子”，其所部于“嘉峪关外党、色尔腾地方安置”。“党”即党河（今敦煌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色”即色尔腾湖又称苏干湖（今阿克赛哈萨克自治县境内）。雍正九年（1713），清政府又应阿拉布珠儿之子丹衷之请求，将其所部迁至额济纳河下游。乾隆十八年（1753）正式设旗。额济纳河流域便成为蒙古族土尔扈特旗所辖之地

（今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

期间，我国第一位赴俄的使臣内阁侍读图理琛（1667～1740）曾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奉旨出使，经西伯利亚前往南俄，到达伏尔加河下游慰问土尔扈特王阿玉奇。稍后，他所“抚绥”的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大部分人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回归祖国，被清政府安置于新疆等地，编为若干旗。为了区别，故将早先安置在额济纳河设旗的那一部分称为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

还有一部分土尔扈特人就留在伏尔加河下游、南俄草原上的俄称“卡尔梅克”地方，在当地繁衍生息，后来成为归并入俄国的草原民族，以地名为族名，称为“卡尔梅克人”。18世纪中叶，俄人罗索兴翻译图理琛使俄归来的奏折《异域录》[1]时，对阿玉奇部的称谓已不见“土尔扈特”，而用了“卡尔梅克”[2]，便是明证。

到了19世纪初，俄国大诗人普希金（1799～1837）写的诗中，已经亲切地称之为“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了。不过，既然还是“朋友”相称，说明刚归顺不久。普希金1836年写的一首《纪念碑》，其中的一段诗文如下：

伟大的俄罗斯将传遍我的名声，它的一切民族：

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无论是芬兰人，

或未开化的通古斯人，或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

---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四十三、四十四。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俄苏中国学手册》上册，第2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都将用他们的语言传诵我的姓名。[1]

（二）东路

经由蒙古到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一路，也从16世纪末开始，藏传佛教通过中国西藏和蒙古的喇嘛传入布里亚特。布里亚特蒙古人分布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分成东西两大系，藏传佛教传开的地区主要是在东布里亚特。

布里亚特分处的西东两大系，分别以乌斯季——奥勒登和阿金为中心。东系的阿金属于远东地区，是稍后才被帝俄占领的。

沙皇俄国自伊凡三世于15世纪末（1497）建成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东部的疆界仅达贝加尔湖以东的远东地区，到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统治的18世纪末占领了整个远东地区，自然也包括东布里亚特，即今阿金布里亚特自治州。这样一来，整个有佛教信仰的东布里亚特广大地区就尽数入了俄国的版图了。

在该地区，18世纪初，公元1711年建成第一座喇嘛寺楚戈尔寺。至19世纪时，寺院已增至34座，喇嘛数以千计。有些大的寺院建筑还相当华丽，如公元1741年建立的宗加尔和古西诺奥译尔斯克两座大寺院。

藏传佛教在这里之所以能够传开，主要靠争取“合法化”。一方面靠布里亚特蒙古的王公（诺颜）和贵族（赛

---

① 郑铮译《普希金抒情诗选》，第269页，香港文学报社出版，2000年。

特）的支持并积极提倡。而王公和贵族们也需要利用宗教来控制居民和奴仆。另一方面需争取沙皇政府的正式承认，得到“合法化”，这是更为主要的因素。从沙皇政府来说，要巩固在新扩张的蒙古族地区之统治，也只有加紧控制布里亚特王公和加强同外蒙古封建贵族的联系，而透过在该地区有强大影响的喇嘛教（居民几乎全体信奉佛教），便是最有效的办法。当时各级大喇嘛都是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控制大喇嘛当然也就控制了政权。因而沙皇政府承认喇嘛教的合法地位势在必行。

不过，沙皇政府的态度是摇摆和矛盾的。从总的目标看，他当然想在非俄罗斯族地区实现宗教信仰的俄罗斯一体化，即在其扩张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外贝加尔一带，直至远东边疆的所有部族、民族之中，无一例外地推行东正教、强制他们接受洗礼，以抛弃各部族和民族各自原有的信仰，如布里亚特族的佛教，东部和北部各族的萨满教。他们便有限制喇嘛教的传播之举动，包括限制兴建喇嘛教寺庙和喇嘛的数量。然而布里亚特蒙古人同外蒙古人以及我国的蒙古族一脉相承，让喇嘛教风行于全民族之中，这股强劲的喇嘛教宗教势力和影响逼使沙皇政府不得不让步，采取缓和的策略，后来甚至改变态度，转为正式承认，使之合法化，借以达到控制社会局势的目的。这才有 1728 年沙皇政府颁布决议承认喇嘛教合法地位之举。

沙皇政府仿照对待东正教的先例，也让喇嘛教在布里亚特（蒙古族）地区带上“官方化”的色彩。委派宗加尔

寺的住持来负责统一管理布里亚特的所有喇嘛，并规定喇嘛必须向政府专门宣誓，表示效忠俄国政府。公元1764年，还由沙皇政府授予喇嘛教座主“班智达堪布喇嘛”的封号。

喇嘛得到沙皇政府的承认和鼓励之后，反过来也表示愿意效忠。有一些喇嘛还进一步宣传当时在位的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就是白度母（西藏佛教女神玛葛波）的化身，并在札忽寺中悬挂沙皇肖像，将它置于众神像之中。事情这样发展，就达到了政教统合的地步。

这种把两者结合的做法，后来就成了喇嘛教在俄国求生存、图发展的重要策略。

有了这种政教结合的推动，东布里亚特的古西诺奥泽尔斯克即被建成布里亚特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从当地居民中培养喇嘛。此地后来成为俄国境内的喇嘛教育中心。政府的用意在于让当地佛教寺院脱离西藏和蒙古的影响。

藏传佛教虽然有了条件发展，但速度依然缓慢。自1728年得到沙皇政府正式承认起，由其初传的中心城市乌兰乌德，辗转进入首都圣彼得堡，至1914年在俄罗斯帝国首都建立一座喇嘛寺，标志着藏传佛教在俄国心脏正式立足，历时整整176年。如若加上从16世纪末开始传入的一百多年，则佛教传入俄国也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

这个地区传播佛教的时间要比卡尔梅克早。卡尔梅克如前所述在历史上属于西蒙古部落，原来有萨满教流行。17世纪初，喇嘛教黄教派开始在西部蒙古传开，其中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由于本族的王公和贵族积极

提倡，纷纷改信了黄教。

（三）中路

藏传佛教传入的再一个地区是图瓦，即历史上的唐努乌梁海，原属左翼蒙古的一部。1853年，随着黄教进入左翼蒙古，同时也就传入了图瓦。18世纪，众多喇嘛进入图瓦传教，使得喇嘛教顿时兴盛起来。至20世纪，已有喇嘛寺院20余座，喇嘛3 000人。

20世纪50年代统计，藏传佛教在苏联境内传播的地区有：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图瓦自治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的乌斯季—奥勒登布里亚特民族自治区、阿金布里亚个民族自治区、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的民族区。设有佛教协会，由苏联的佛教管理局领导。管理总局的主席经佛教徒大会选举产生。驻地总部设在乌兰乌德市以南四十公里处的伊沃金喇嘛寺。

二 进抵首都圣彼得堡立足

为了立足首都，俄国佛教展开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取得西藏的支持，以提升自己的正宗地位，另一方面积极筹划兴建佛寺。

当局虽然促进东布里亚特成为俄国境内的喇嘛教育中心。但当地的佛教信徒和喇嘛仍然视西藏为藏传佛教的正

宗中心，以取得西藏的教育为荣耀，于是有布里亚特蒙古人阿格方·洛布桑·多尔日耶夫不远万里在19岁时就从乌兰乌德来到西藏，在拉萨最高的神学校学习，成为高僧。后并被授予“察尼德—汉姆伯”（系“喇嘛的教师”，即青年达赖喇嘛的老师）之称。就是他运用自己在佛教的地位和影响到圣彼得堡主持兴建佛寺的。

阿格方·洛布桑·多尔日耶夫（1854～1938）即阿旺·德智堪布[①]，出生于外贝加尔地区霍林的布里亚特族。1873年19岁时离开蒙古，随朝拜佛祖的香客来到西藏。1888年在拉萨郊区的蜂哲寺学经毕业，获得高级学位“拉南姆巴”，并被指派为青年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教师，成为其顾问和挚友。他对后者有很大影响，在东西藏上层人士中造成了一定人数的“亲俄派”。

建寺的倡议就是由他用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的名义提出[②]。

（一）建寺的背景条件

19世纪90年代前后，帝国主义列强企图染指中国西北边陲地区，包括西藏。阿旺·德智堪布为怂恿沙俄同英国对抗，让二者在西藏取得平衡，便于1898年首次来到彼得堡。他的意图立即得到上流社会“关心西藏问题”人士的

---

① 多尔日耶夫（即德尔智）：《走向西藏之路》，第5～15页，莫斯科，1973年。
② 参阅安德列耶夫《彼得格勒的佛寺》第5、19页，乌兰乌德，1992年。

呼应。虽然初访成效不大，但再次往访时已有宫廷事务部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宫廷内侍）出面庇护。乌为俄国殖民政策的积极推行者。经过他的引荐，阿旺·德智堪布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多次接见。

倡建佛寺的消息传开后，阿旺·德智堪布在佛教徒中的威望大增，获得多方的支持。当时在首都已有多个佛教团体。有来自外贝加尔地区的信徒，阿斯特拉罕省和斯塔甫罗波尔省的布里亚特人及卡尔梅克人，有当地的学生、手工业者和商人中的信徒，还有旅居彼得堡的一些下层哥萨克。他们大多信仰喇嘛黄教。因无佛寺，其拜佛活动只好在各自的寓所或旅店房间里，三五成群的进行，故极盼设立可共同参拜的佛寺。

同时，随着俄国同东方国家经贸的发展，来俄的各国人士，包括中国、日本和暹罗（泰国）人日渐增多，其中有些人是佛教徒，也有拜佛的要求。俄国上流社会人士也有出于形势需要（对西藏展开工作）而改信佛教的，包括宫廷内侍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和冯·费里克尔詹姆男爵等名流。

再有一种因素是，20世纪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正出现危机，使得俄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加紧作思想探索，从而引起对东方古老宗教包括佛教的关注。他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佛祖之道”，认为这种宗教是一种能够达到“道德上自我完善”的途径。最为鲜明的例子，就是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的探索。

托尔斯泰在1906年78岁高龄时，写给中国人辜鸿铭的信里，给予中国人民命运的同情：

中国人民虽然遭受到欧洲民族这样多不道德的，极端自私的，贪得无厌的暴行，而直到最近都是用宽宏和明智的平静、宁可忍耐也不用暴力斗争的精神来回答加之于他们身上的一切暴行。……伟大而强有力的中国人民的平静和忍耐只是引起了欧洲民族越来越多的蛮横行为。粗野的、自私的、只过着兽性生活的人总是这样，与中国发生关系的欧洲民族正是如此①。

也有对自身的思想探索历程的坦露：

中国人民的生活过去一直是我极感兴趣的，我也曾尽力去了解我所能了解的中国生活中的东西，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我也看过中国的佛经和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②。

最终，托翁得出了独特的结论：

只要中国人继续过以前所过的和平的、勤劳的、农耕的生活，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义：儒教、道教、佛教的教义（三者是一致的，都是要摆脱一切人的权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让、爱一切人及一切生灵），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己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③。

---

① 托尔斯泰《致一个中国人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30卷，百年纪念版。
② 托尔斯泰《致一个中国人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30卷，百年纪念版。
③ 托尔斯泰《致一个中国人的信》，《托尔斯泰全集》第30卷，百年纪念版。

托翁只是在思想认识上融汇了各家宗教教义之所长，形成了独特的“托尔斯泰主义”。不过那一代人里由思想变化而皈依佛教的，却也不乏其人。尤其在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发布的关于信仰自由的法令（实际上是对过去以一神教作为国教的那种局面做了解禁）之后，社会更有利于别的宗教教徒自由自愿地改信佛教。这无疑促成了佛教的传播。

如此种种因素的结合，使得在圣彼得堡建立佛寺的条件趋向成熟。

（二）建寺的物质基础

阿旺·德智堪布多方活动，积极筹措，先在南俄取得成效，获得支持。1906年，他在卡尔梅克草原上的马洛杰尔别托夫斯克（乌芦斯），阿姆特·布尔古斯特区（乌罗契谢）建立了两所佛教教会学校，均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提出申请，因而获得阿斯特拉罕省省长的批准。德智堪布为建校花去五千金卢布，并亲自从西藏运来三百卷佛经典籍，包括全套《刚珠尔经》和《丹珠尔经》，以及大批金、银、铜制的或装饰的器具。此后不久，他又在伊基佐胡罗夫斯克村的桑泽尔区（耶罗契谢）建立另一所佛教教会学校。这些地方的成效均表示了对于首都活动之支持。

同时，德智堪布还到过中国的五台山寺，同该寺黄教派的主持会见，获得致俄国政府的正式函件，包括一份申请书（要求在彼得堡建立佛寺以供当地佛教徒拜佛之用）。

1906～1908年期间的几项活动获得成功，对于德智堪布是莫大的鼓励。1908年春他重返彼得堡时，已正式向沙皇政府外交部递交申请，即五台山黄教派主持交付的以达赖喇嘛名义提出的那份申请书。外交大臣阿·伊·伊兹沃里斯基在1908年6月12日的批复中表示相信，“我们对达赖喇嘛此项要求予以呼应，将有利于对他本人和俄国境内广大喇嘛教徒都产生深刻的印象”。内务大臣斯托雷平阅览达赖喇嘛的申请书后表示完全同意兴建拜佛堂，“只需遵守建筑法规即可”。沙皇尼古拉二世也表态同意达赖喇嘛和德智堪布的申请。层层的公文批复手续终于完成。

1909年初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德智堪布时说：“俄国的佛教徒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在苍鹰翅膀的庇护之下”。至此，兴建佛寺的时机完全成熟。

三 兴建圣彼得堡佛寺

（一）动工与完成

1909年3月，德智堪布用18 000卢布在彼得堡购得一块地，面积为648.51平方俄亩，位于城郊区接合部的旧村（斯塔拉亚，捷列夫尼亚），在布拉戈维申斯克街（今滨海大道）和里波瓦亚林荫道两条路的交叉处之一角，有一边濒临大涅夫卡河，以河岸为界，地方僻静，恰好宜于

建寺。

依设计图，佛寺应为一座两层楼房，底层作佛堂，上层为喇嘛的宿舍，附设有一所学校。建寺经费预算为九万卢布，由达赖喇嘛捐赠五万。德智堪布出三万，所缺一万在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中间募集。动工以后才发现预算太低，实际将会超过十五万卢布。在1913年，德智堪布再前往蒙古请求赞助。

从建寺委员会的阵容[①]，也可看出俄方的重视程度。八人的委员会中，主席为东方学家拉德洛夫院士，委员有沙皇宫廷内侍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东方学家多次赴敦煌考察搜罗文物的鄂登堡（日后也成为科学院院士）以及彼得堡大学副教授谢尔巴茨基（谢尔巴茨科依），后者日后成为撰写印度原始佛教史的学者之一。德智堪布等人历尽千难万险，才匆匆把佛寺楼体建成，而装修工作却因经费不足拖延了一年。至1910年底，既完成了佛寺楼体，又以建德智堪布私人住宅的名义在寺旁加建了一座四层的石砌楼房和一座两层的办公侧楼。

佛寺本身的建筑则仿照西藏喇嘛寺的式样，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部高大宽敞，为有十二排圆柱的大厅，作为拜佛的道堂。大厅之上高耸的二楼，隔成一间间的斗室，供僧人住宿。北部为佛龛，置放佛像，各种祭祷用具和佛事活动用的旗幡、乐器。整体看来佛寺颇为宏伟壮观。

---

① 安德列耶夫《彼得格勒的佛寺》，第11页。

（二）建寺过程的曲折

建寺的困难主要在于当局和民间两方面的阻力。开工以后，沙皇政府对于此项工程的态度依然很矛盾。1909 年 4 月底刚动工，5 月中旬就以市长德拉乔夫的名义发出通知，要工程暂停，表面理由是建寺一事未按 1853 年发布的《东西伯利亚喇嘛教的法规》提交审核。实际上是当局仍然害怕该寺会成为在首都传播佛教的热点。因为建筑方案中，不但有佛堂，而且还有喇嘛的学校和宿舍。在当局眼里，后两项尤其令人担心。

建寺委员会不得不多方求情，向当局解释。所具陈备的理由为：（1）此寺限于拜佛使用；（2）宿舍仅为了供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两地来的佛教徒暂住的客栈，并非用于发展佛教徒；（3）佛寺地处市郊，人烟稀少，不会对周围人群造成影响。

为求得当局批准，建寺委员会 1909 年 6 月以主席德法夫洛院士的名义再次向内务大臣呈函，说明原委，并表示让步：只建佛寺，不建宿舍、不设学校。这样，内务大臣斯托雷平才于 9 月 30 日把该函转呈沙皇，由尼古拉二世批示“同意”。

民间的阻力则是来自东正教教会和黑帮报刊掀起的反佛教运动，而且来势凶猛。在俄国，基督教排斥异教的传统由来已久，他们看不惯也不能接受来自异教甚至异邦的事物，就连中国茶传入俄国，也被视为异端。

16 世纪，中国茶开始输入俄罗斯，东正教徒和回教徒相比，就具有两样的心态。穆斯林们敞开胸怀欢迎和痛饮，

并用以待客，到处热情有加，还说茶也是治伤风感冒的良药。因此，茶迅速传开，在穆斯林地区普遍接受，几乎成为取代酒的待客饮料。

东正教徒则不同，他们反对输入中国茶，惊呼："中国之剑已经射中了基督教的心脏，射入了俄罗斯，彻底摧毁了所有的人。"东正教徒中有部分人开始诅咒这种"绿色的药水"，说是"该死的东西"。尤其恶狠狠地咒骂开始接受并饮茶的俄国人，说"谁喝茶，谁就别想得救。"[①]

此次对待佛教，也是"日战重演"。东正教的一些人士把首都建佛寺一事看做是对于俄国正教信仰基础的破坏，仿佛是佛教企图让神圣的俄罗斯再度返回多神教的国度。于是各方面都有人士呼吁取消佛寺建设工程。阿旺·德智堪布本人和一些佛教徒都不时地收到匿名信、恐吓信，威胁说要炸毁佛寺。这一反佛教的恐怖浪潮中，出自沙皇在首都郊外的行宫附近，即皇村的"火速惩戒队"尤其猖狂。

建寺委员会顶住压力，冒了风险，好不容易才把工程完成。

四　首都佛寺的盛衰和重修

十月革命前的彼得堡有各种教堂和寺院近六百座，但佛寺仅此一座。不过阿旺·德智堪布等建成的这一座佛寺

① 德鲁宁《品茶漫话》第7、8页，喀山，1993年。

却具有全俄的性质，而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是藏传佛教在俄国最终立足的标志，又是佛教文化在欧俄的展示中心。

佛寺工程本来进展缓慢，为了利用“政教结合”的合法形式以获得沙皇政府的支持，不得不赶在沙皇政府的大节庆日之前草草完工，先举行庆典。在16世纪末之前，沙皇政府系由姓留里克的家族掌权，先后出过几位有作为的沙皇，如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1533~1584）等。但等到雷帝之子费多尔（1584~1598年在位）一死，留里克王朝绝嗣。出现了大臣戈都诺夫和舒伊斯基先后争王的局面，有过十几年的混乱期，直至1612年底舒伊斯基被推翻。改由大贵族米哈依尔·罗曼诺夫（1613~1645年在位）为沙皇。他于1613年即位。从此开始了俄国历史上长达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1613~1917）。

彼得堡佛寺为了参加庆祝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当政三百周年，赶在1913年2月21日这一天举行了落成典礼。但实际完全建成的时间（包括装饰工程完毕）应为1914~1915年间。不过在此期间，佛寺已经不时地举行大小型佛事活动。

第二次有影响的大型活动是在1914年6月9日。参加者有来自俄国境内的外贝加尔、阿斯特拉罕省和斯塔甫罗波尔省的喇嘛、蒙古的王公、俄国的东方学者（如多次赴中亚实地考察的知名旅行家科兹洛夫）。尽管政府当局力图

限制该佛寺的影响，如规定不准按照西藏佛寺的模样把外观装饰的金碧辉煌，甚至由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下令限制该寺编制为9人，但是彼得堡佛寺的影响仍然远及国外。就在第二次大型活动中，俄国驻曼谷领事带来了两尊佛塑像（一坐一立），其中一尊为铜质镀金释迦牟尼坐像，是暹罗国王所赠献的。

佛寺建成后不久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安全起见，寺中大批饰物、用具均疏散到比较安全的地方阿尔汉格尔斯克。至1917年，局势益发困难，喇嘛们都离开首都返回各自的故乡。十月革命后不久，佛寺关闭了一段时间。稍后，在20世纪20年代恢复举行过几次佛寺活动。参加者有来自蒙古和西藏的喇嘛。佛寺再次成为首都的佛教文化中心。当时首都彼得堡已改名为列宁格勒。1927年，列宁格勒大学的谢尔巴茨基院士在科学院之下筹创了“佛教文化研究所”，聘请精通佛事、佛经的专家学者和喇嘛为顾问。这对于东方学家们的研究工作极为有益。对此，刚举行不久的“第一届全苏（联）佛教大会”立即致电向谢尔巴茨基、鄂登堡、弗拉基米尔佐夫等东方学家表示谢意。电文云：“诚挚感谢你们倡议成立‘佛教研究所’，并深信研究佛教恰巧是让西方文化界正确理解本教的开端，也是为我们这一珍贵的宗教进一步繁荣昌盛奠定基础。”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进入高潮，不但要消灭富农，而且连宗教（包括喇嘛教）也被列为“社会主义改造的敌人”。为免遭迫害，许多喇嘛

脱下袈裟、隐去教职、逃离寺院。阿旺·德智堪布本人在1937年1月出走，离开列宁格勒，11月被捕关入乌兰乌德监狱，后因病保释就医，于1938年1月心脏病突发死于医院，终年85岁。

1937年大批逮捕喇嘛时，一些住在佛寺的东方学家如巴拉津、赞姆察兰诺等人也惨遭厄运。佛寺至此最终关闭。

1938年6月，佛寺及其附属建筑交付列宁格勒州工会作为“体育活动基地”。1941年反抗希特勒侵略的护国战争爆发，战争期间，该寺改为军队广播站用房。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有人提出佛寺的使用与归属问题。一批东方学家如科津、梅沙宁诺夫、司徒卢威等出面力争，要求并获得准许交付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辟为“宗教史和蒙古民俗博物馆”。

1960年，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即议会）决定将其划归东方学研究所永久使用。嗣后发现，该寺对于所存大批藏文珍贵文献（手抄本、刻本）[①]，包括从布里亚特和赤塔州运来的一部分珍贵文献，缺乏保藏功能，条件极为不良。为此，多方改造，几经周折，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决定辟为“宗教史和无神论博物馆”。

苏联开始改革和转型以后，决定将该寺发还佛教，1990年7月[②]，关闭了50年的彼得堡佛寺终于重修完成，重新开放，再次听到了喇嘛诵经的声音。

---

① 谢米乔夫《佛教、喇嘛教的起源和本质》，第51页，乌兰乌德，1960年。

② 安德列耶夫《彼得格勒的佛寺》，第187页。

五 《高僧传》俄译

俄罗斯汉学家早在19世纪就对佛教有研究，瓦·瓦西里耶夫院士写出了《东方异教：儒、释、道》（1873）。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有别的汉学家写出专著，如谢米乔夫等著《佛教、喇嘛教的起源和本质》（乌兰乌德，1960），当代的列·瓦西里耶夫所著《中国的迷信、宗教和传统》（莫斯科，1970）、《东方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莫斯科，1976）和《东方宗教史·宗教文化的传统和社会》（莫斯科，1983）等书也颇有影响。

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副博士米·叶·叶尔马科夫则从翻译中国佛教传记入手，向俄文读者广泛介绍中国的佛教。

叶尔马科夫着手翻译梁慧皎撰的《高僧传》，俄译本分成三册，第一册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包括原书的“译经”科27位僧人的传记。出版说明里特别指出：“该书是中国早期佛教史最重要的资料、中国文学的典籍。它广泛流传于中国、乃至朝鲜和日本，成为佛教传记体作品的典范。”译者计划依照原书分成的十四卷十科：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依次译出。第一册还附有译者的注释和详细的佛教资料书目索引。

叶尔马科夫为译本冠以一篇六万余字的长文《〈高僧传〉——中国佛教传记文献》，文章共有十节，对该作品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这也是译者多年研究中国佛教心得的结晶。此前，他已发表过《〈高僧传〉中的鸠摩罗什传及其在中国官方史学中的异说》（1978）、《中国官方史学家所描写的佛教人士（据〈晋书〉和〈高僧传〉资料）》（1987）、《中国文学里早期涉及的〈观世音经〉》（1987）、《六世纪上半叶僧人录片断》（1988）等文。这一次的长文则是对慧皎著作及有关的资料做了深入研究的结果。

译者在文章的“引言”里说：“现代的历史科学已经拥有广博的中国佛教资料，但这首先应归功于慧皎著《高僧传》。它包括自公元67年至518年期间的中国佛教资料，依照编年顺序列入257位历史人物的传记和二百多人的简短传文”。他认为，《高僧传》于20世纪初在西方，20~40年代在中国和日本，50~80年代在日本和西方，还有近年来在中国，都曾引起学者们研究的热潮。其中，中国的学者如梁启超、汤用彤、陈垣、曹仕邦、周叔迦、苏公望；西方的汉学家如沙畹、马斯佩罗、哈克曼、莱特；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塚本善隆、岩井谛亮、龙也清、山丙晋卿、村山嘉实、古田和弘、牧田谛亮等都有过贡献。他们推动了对《高僧传》乃至中国佛教的研究工作。日本著名的佛学研究者常盘大定所编定的《高僧传》日译本，是迄今唯一的外国全译本。而日本学者塚木善隆、岩井谛亮、龙也清合编的《梁高僧传索引》（1937~1939）在同类书中是最为完

备的。

叶尔马科夫表示，他的研究则注重阐明该著作的文艺观、确定它在世界文学遗产和中国佛教文学中的地位，并为其划分出传记的类型。为此，他分别以下列各节详加论述：“关于《高僧传》的作者”、“中国佛教史学的形成”、“《高僧传》的史料来源”、“《高僧传》的史学观念”、“《高僧传》和中国史学”、“从欧洲文学传统的眼光来看《高僧传》”、“中国佛教文学传统中的《高僧传》”、“《高僧传》的传记类型学”。

他在文中把列入传记的僧人划分成四类：（1）经书僧，包括译经、义解、明律、诵经、经师、唱导六科所列传的僧人。（2）神异僧，专指神异这一科的僧人。（3）尘世僧，包括《高僧传》中绝大部分僧人。（4）隐士僧，指习禅这一科的僧人。叶尔马科夫解释说，这四类僧人分别组成两组互相对立的类型。前两类是一组：经书僧的活动都与佛教经书有关，而且以经书为中心；神异僧则几乎同佛教经书没有关系，他们只靠自身神奇的力量和异常的才能，况且这些力量和才能也不是依靠顽强的劳动获得的，而是上天赋予的。后两类是另一组：尘世僧活动于世俗的人们之中，力求用自己的力量来促使佛教的发展，吸引社会的广大阶层都来接受佛教的影响，直至信仰佛教，而隐士僧则离群索居，或孤隐寺庙，远隔人群，或遁入山林，与虎、牛为伍。这类中国的隐士僧之产生实际上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道教隐士的影响。

译者在“结束语”中申明，俄译本《高僧传》第一册包括原书的1~3卷，即“译经”科。预计第二册将包括原书的第4~8卷，即“义解”科。第三册将包括原书的第9~14卷，即《高僧传》中的其余各卷、原作者的序言及其与传记有关的来往书信资料等。

继《高僧传》第一册俄译本在1991年出版之后，第二册俄译本也已于2005年出版。

《高僧传》的俄译本是个大工程，它将是继日译本之后第二个外文的全译本。这也是俄国汉学家研究中国佛教的新进展。译者在1990年来北大进修时，曾谈及他研究中国佛教的宏大计划，包括对比研究或研读唐道宣撰《续高僧传》、赞宁著《宋高僧传》和如惺著《大明高僧传》，以及有关的中国佛教史籍，相信他很快将有研究成果陆续出现。

第七章

诗词戏曲章回小说译著概览

一　诗词和戏曲选本

（一）唐诗

苏联时期对唐诗的翻译是比较充分的。十月革命后，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倡议对中国诗歌进行研究，特别是由于表现形式的难度大而在俄苏研究得少的中国古典诗歌。他在1920年提出一个翻译中国文学名著的宏大规划，包括有“全中国都敬重的伟大诗人杜甫的诗”。

唐诗俄译本最流行的有两种，均在20世纪50年代问世。一种是195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集（唐代）》，由费德林编选并写有一篇长序，由亚历山大罗夫、马尔科娃、巴斯曼诺夫等15人译。另一种是1957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集》第二卷（唐诗），由郭沫若和费德林编选。两书均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印数均为35 000册，在苏联流传很广。

这两种诗集入选的诗人多，是反映面最广的唐诗俄译本。前一种选入58位诗人的181首诗。其中，最大的诗人入选的诗很多，如李白18首，杜甫20首，白居易18首，王维17首。重要的诗人也有三四首或七八首不等，如孟浩然、刘长卿、岑参、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元稹、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李煜等。其他入选的人也都是名诗

人，虽只选了一首（有的选二首），却是名篇。从初唐到晚唐依次有：王绩、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沈佺期、贺知章、王翰、崔国辅、李欣、王湾、王之焕、王昌龄、高适、常建、李嘉祐、钱起、张继、顾况、戴叔伦、张志和、孟郊、韩愈、王建、李贺、李绅、曹邺、皇甫松、聂夷中、杜荀鹤、牛希济等。

后一种在前一种的基础上略有增删，去掉李煜等，增加张若虚、陈子昂、张九龄、皮日休等，扩大为61位诗人的202首诗。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又出版过几种有关唐诗的合集：1975年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歌集》，1979年斯米尔诺夫编《中国八至十四世纪抒情诗歌集（王维、苏轼、关汉卿、高启）》，1984年莫斯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三至十四世纪写景诗集》和1984年出版的《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歌》。

同时，还出过几位唐朝大诗人的个人诗集：有吉托维奇译《李白抒情诗选》（1956和1957）两种，吉托维奇译《杜甫诗集》（1955和1962）两种及《杜甫抒情诗集》（1967），吉托维奇和苏霍鲁科夫各译一种《王维诗集》（分别为1959和1979），还有《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诗歌三百首）》（1960），《白居易绝句集》（1946、1949和1951三种），《白居易诗集》（1958和1978两种）《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

艾德林也是著名唐诗研究者，他1949年发表的《白居易绝句集》是一本研究兼翻译的作品，它肯定了白居易诗

歌的本质特点是“朴实通俗和深刻的人道主义”。他在另一部专著《陶渊明和他的诗歌》（1967）中，连带论述唐诗既汲取古老传统的营养，又继承晋朝陶渊明首创的自然和朴实之风，而且擅长于表现人民丰富而崇高的精神境界。艾德林同索罗金合著的苏联第一本自古迄今的中国文学简史《中国文学》（1962），在勾勒唐朝诗歌发展的脉络时，指出：那时的“诗歌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它无所不在。我们这一次又忍不住要作对比：论多面性，李白就比如我国的普希金”，“李白以及整个唐诗的细腻抒情、朴实和人道主义，特别强烈地表现在当时已发展到极复杂的体裁‘绝句’中了”。书中进一步论及两位大诗人：“唐诗由于有了杜甫，就可以说它已经为农民的贫苦而大声疾呼了。而在杜甫之后，白居易才可能说出唐诗中最大的揭露性的话语”。艾德林还在《唐诗简论》（1970）等一系列文章中论述唐朝诗歌创作。

费德林除了是苏联唐诗翻译工作的组织者，还是著名的翻译和研究者，从诗经到当代文学都有研究，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写过大量的评论文章和著作，包括有论《诗经》的专著和系列研究屈原的文著。除了从宏观上概括中国文学成就的文章外，还有具体论唐代诗人的评语。近期的如《白居易》（1972）、《伟大的李白》（1973）等。费德林曾概括其研究工作的体会说：“我一辈子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始终没有中断过，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文学和文

化方面是值得自豪的国家。中国的诗经、楚辞、唐诗、元曲等等优秀文学著作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唐代诗人被苏联汉学家研究并写成专著的，除前述司空图、白居易外，还有李白、杜甫和王维。

李白的研究者女汉学家费什曼在1941年完成副博士学位论文《欧洲对李白的学术研究》，到1958年又写出专论《李白的生平与创作》，突出强调李白诗歌的思想成就是“爱国主义和人民性”。

对王维作比较充分研究的是达格丹诺夫。他在1984年出版专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既是全面论析王维的生平与创作，又有新的角度，抓住王维同禅佛的关系这条线索，重点突出。达格丹诺夫还从同样的角度研究白居易等诗人，并写出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如《禅佛对唐代诗人创作的影响，以王维和白居易为例》、《论白居易的两篇佛教散文》和《论白居易同佛教和尚的友谊》，时间均为1980年。

苏联当代研究者对唐诗成就的论述，以费德林最具代表性。他在1972年纪念白居易诞生120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继陶渊明之后“唐代诗人陈子昂也反对旧的形式和题材，克服矫揉造作晦涩难懂的诗风，主张恢复三国时期曹植、阮籍的诗风和韵律规则。随着诗歌题材的进一步扩大，诗歌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八世纪便出现了当时最杰出的风景诗巨匠、诗人和画家王维”。这个时期，“最大的诗人李白在绝句和七律上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并对以后数

百年的诗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安禄山之乱导致唐朝衰落以后，“旧的优秀诗歌传统的继承人和新诗歌的创始人杜甫……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对老百姓利益的深切关怀和对孤苦无告者遭遇的同情”。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倾向”。“白居易的创作经常从取之不竭的民间诗歌，向伟大的前辈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的经验汲取养分”，使得“白居易的诗成为唐朝在民间最为普及的诗”。所以，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称赞白居易的诗从达官贵人到牧人马夫是“妇孺皆知”，争相传诵。费德林肯定，如同其他几位大诗人一样，“白居易的诗已经超越时代和国界，成为无数国家和人民的精神财富”。

（二）宋词

苏联对宋词的译介不如唐诗多，但仍然出过不少作品集。最早出的单人集是巴斯曼诺夫译的《辛弃疾诗词集》，由国家文学出版社于 1959 和 1961 年各出一种本子。接着，巴斯曼诺夫又译出李清照《漱玉词》，也出了两版（1970 和 1974）均由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有戈鲁别夫译的《苏东坡诗词集》，文艺出版社，1975 年出版。除这些个人专集外，就是散见于各种诗选里的若干词人作品选，如《宋代诗歌》、《中国古典诗歌集》等。

入选词人最多、作品相对集中的一本集子是《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由巴斯曼诺夫译、注并序，文艺出版社 1979 年出版。入选的词人有 19 位，其中宋代词人占了十

位，即欧阳修、柳永、苏东坡、黄庭坚、秦观、李之仪、李清照、朱敦儒、陆游、辛弃疾。此书出版后反响较大，连续发表四篇书评。汉学家谢列布里亚科夫认为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俄文版的“第一部中国词选”。

1987 年出版的《文学百科词典》介绍说：“宋代词人流传最广的是柳永、李清照、辛弃疾和苏东坡”。苏联始终倾注于词研究的专家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他于 1979 年出版专著《中国十至十一世纪的诗作·诗和词》（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出版，1979 年）。该书除了系统介绍词和诗在韵律上有何差异，并着重论述“词”的形成和发展史，还专门有四章评介宋代四位作家所写的词和诗：这分别是《王禹偁及其诗词选》、《诗人苏舜钦》、《梅尧臣的词》和《欧阳修在发展诗词中的作用》。汉学家费德林曾论及该著，认为宋词对苏联汉学界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未经充分研究的领域”，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贡献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填补了苏联在中国中世纪文学知识上的一个大空白，使人对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词’这种现象有所了解”。

（三）宋诗

早在 19 世纪中叶，俄国杂志就开始译介宋诗。《祖国纪事》1856 年第 6 期刊载俄国诗人费特从其他欧洲文字转译的苏轼诗《阴影》。1880 年出版的瓦西里耶夫院士著《中国文学史纲要》把苏轼作为中国大诗人之一，同杜甫、李

白的名字并列向俄国读者作了介绍。后来1914年马尔科夫编译的《中国之笛》诗集中也有两首苏轼的诗。此后，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不断有收入宋诗的中国诗集俄文版问世。

主要的俄文版宋诗集有两种。一种是郭沫若和苏联汉学家费德林合编的四卷本《中国诗歌集》第三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共334页。其中，宋代诗歌（包括词）占了120页，共收入宋代诗人37人的72首诗和词。入选的诗以范成大为最多，被选六首，陆游次之，选了五首，苏轼和王安石各选入四首。选入二首以上的诗人还有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杨万里、李清照、辛弃疾、朱淑真等，其他选入一首的有张先、晏殊、文同、柳永、张来、朱敦儒、张考祥，载复古、张镃、文天祥、陈允平等。

然而，正如汉学家克立夫佐夫（1921～1985）所说，同唐宋诗在中国的地位以及唐诗已经得到广泛介绍相比，宋诗的翻译就显得很不够。他说："不但在苏联，而且在其他国家（日本除外），宋诗的翻译和研究都很不够"。因而，在1959年苏联又出了一本《宋代诗歌》克立夫佐夫序，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宋诗最全的俄译本，它包括一部分宋词，共收入40位宋代诗人的181首诗。宋代的著名诗人均已收入。其中，入选诗歌最多的是辛弃疾、陆游和苏轼，分别为29、26和18首。欧阳修、范成大、王安石、李清照被选的也不少，分别为12、9、10和8首。其他被选的人从1首到6首，多寡不等。计有：王禹偁3首，寇准1

首，柳永6首，范仲淹2首，张先3首，晏殊1首，梅尧臣5首，苏舜钦1首，张泳1首，文同1首，王令2首，黄庭坚3首，陈师道2首，张来1首，唐庚1首，陈与义5首，朱敦儒4首，岳飞1首，杨万里2首，朱熹2首，韩驹2首，张考祥1首，刘克庄4首，元好问1首，朱淑真3首，戴复古3首，史浩1首，张镃1首，文天祥1首。

这本宋诗的译者阵容很强，主要译者是著名诗词翻译家巴斯曼诺夫、戈鲁别夫、切尔卡斯基、阿赫马托娃和雅罗斯拉夫采夫。其他的译者是阿杜耶夫斯基、班尼科夫、斯塔罗斯金、阿尔戈、柯尔察金和西佐娃。

选录宋诗的其他诗集还有：《中国古典诗歌集》艾德林译，文艺出版社1975和1984年出版的两种，《中国八至十四世纪抒情诗集（王维、苏轼、关汉卿、高启）》斯米尔诺夫编，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中国三至十四世纪写景诗集》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等。

苏联还为几位著名宋代诗人出了专集。最早的是巴斯曼诺夫译的《辛弃疾诗词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和1961年各一版，后来，有戈鲁别夫译《陆游诗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和《苏东坡诗词集》文艺出版社1975年出版。

苏联唯一的研究宋诗专著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写的《中国十至十一世纪的诗作·诗和词》。

（四）元曲

俄国译介中国元代戏曲始于19世纪初叶。1829年《雅

典娜神庙》杂志第11期登载一篇短文《学者之女雪恨记》，介绍了关汉卿的《窦娥冤》剧情。还叙述了另一种元杂剧《元夜留鞋记》的故事梗概。1839年《读书丛刊》杂志第35卷译载一篇元剧，名为《樊素，或善骗的使女》，作者郑德辉。经查对，实则郑光祖的《㑇梅香翰林风月》。1847年在彼得堡出版高则诚的《琵琶记》俄译本，系由法文转译的。19世纪下半叶，在1880年出版的瓦西里耶夫著《中国文学史纲要》中介绍了王实甫《西厢记》的梗概。

俄国汉学家对元代戏曲的评论不多。但瓦西里耶夫院士的论述却相当精辟。他在《中国文学史纲要》里简述中国古典戏剧的演变，指出《西厢记》和欧洲最优秀的歌剧相比，毫不逊色，说它"语言精丽"，"如果撇开语言不谈，仅就情节和剧情的发展，再加上台词和曲词，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出多少这样优美的剧本"。

十月革命后，苏联对元曲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王希礼写的论文《中国的戏剧》（1929）曾涉及元曲。1958年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纪念关汉卿创作700周年，在莫斯科出版《关汉卿——伟大的中国剧作家》一书，收入费德林、艾德林、索罗金等汉学家的论文及《窦娥冤》、《救风尘》的译文（均节译）。1960年又出版孟列夫译的《西厢记》。它和六年后出版的《元曲》都有较大的影响。

《元曲》由列宁格勒大学汉学家维·彼得罗夫编选并作序，孟列夫校译，艺术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关汉卿的《窦娥

冤》、《望江亭》、《单刀会》，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李好古的《张生煮海》，石君宝的《秋胡戏妻》，张国宾的《合汗衫》，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剧本。译者都是对中国戏剧有研究的人，如孟列夫、谢列布里亚科夫、马里诺夫斯卡娅、司格林、马斯金斯卡娅。这是苏联收集元曲最多的一个选本。汉学家李福清肯定它让“苏联读者读到11个著名的元杂剧剧本”，并且“从序文中可以得到关于元杂剧内容、主要形象、结构、角色行当和宫调等比较完整的知识”。

对元杂剧的评论不少，最重要的是索罗金论元杂剧的专著《十三四世纪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该书从“戏曲体裁的起源”、“元杂剧的结构”、“元杂剧的人物形象”以及元杂剧作者的世界观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元代戏剧作品，出版之后反响颇大。李福清认为，“这本书的主要价值，不仅在于资料丰富，而且有独到的见解，处理资料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新颖”。

此外，盖达的专著，科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戏剧——戏曲》也论及元杂剧，并作了一般性的介绍。

（五）元明清诗

在整个苏联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元明清诗研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的元明清诗歌已散见于各种俄文版的中国诗集中。主要的有以

下几种：

（1）《中国朝鲜诗选》，吉托维奇译，彼得罗夫序，由国家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收入谭嗣同的诗15首。

（2）《东方文学选集》，吉托维奇译，1957年出版，收入清代诗人谭嗣同的诗9首。

（3）《中国八至十四世纪抒情诗集》，斯米尔诺夫编，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收入关汉卿诗27首和高启诗60首。

（4）《东方古典诗集》，阿赫玛托娃译，1969年出版，收入徐釚等元明清的5位诗人的诗5首。

（5）《印中朝越日古典诗集》，1977年出版，书中收入中国元明清王冕、高启、戚继光、汤显祖等22位作者的诗35首。其中，高启最多，一人就占了14首，余下21人则每人收入1首。

此外，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曾译过刘致的一首诗，登在《苏联中国学》杂志1955年第1期上。

收入元明清诗最广的一本诗集是由费德林通讯院士编选的《中国诗集》第三卷，由国家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计收入72位诗人的104首诗。这些诗分别统计为：

元代：马祖常、贯云石、张翥、鲜于枢、萨天锡、徐再思、刘致、高启、王冕、迺贤等17人的诗30首。

明代：李东阳、唐寅、边贡、何景明、杨慎、王世贞、冯梦龙等14人的诗15首。

清代：吴伟业、钱澄之、毛先舒、徐釚、朱彝尊、夏

完淳、蒋士铨、林则徐、龚自珍、项鸿祚、黄遵宪、谭嗣同等42人的诗59首。其中，多数人仅收入1首，黄遵宪和谭嗣同则分别被选用4和6首。

在元明清诗的俄文译者中，比较著名的有伊里亚·斯米尔诺夫、吉托维奇、齐维里兴、尤·亚历山大罗夫、戈鲁勃科夫、阿尔戈以及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等。

苏联汉学家对元明清诗的研究，重点放在少数几个名诗人身上。如莫斯科大学毕业生，现任科学出版社副编审的斯米尔诺夫，就把主要精力用于译介和研究高启的诗。两种收有大量高启诗的俄译本均出自他的译笔：《中国八至十四世纪抒情诗集（王维、苏轼、关汉卿、高启）》译载高诗60首，《印中朝越日古典诗集》译载高诗14首。同时，斯米尔诺夫发表过几篇论文，先后有《论高启诗的若干特点》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青年科学工作者和研究生学术会议文集》（提纲）（1974年，第1册）和1975年《十四世纪末中国诗史片断（高启早期的生活与创作）》，并于1978年以论文《高启（1336～1374）的生平与创作》（共21页）在东方学研究所获副博士学位。

苏联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注重具有革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人。如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三种诗集：《东方文学选集》（1957）、《中国诗集》（1957）第三卷和《中国朝鲜诗选》（1958）中均收有谭嗣同的诗，分别为9、6和15首。以研究清末谴责小说著称的莫斯科大学教授谢曼诺夫写出了长篇论文评介黄遵宪，题为《黄遵宪诗中的反帝国主义

基调》[①]，尼·彼得罗夫则以研究黄遵宪的论文《黄遵宪——19世纪末的中国爱国主义诗人》（共15页）于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论文由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出版。海参崴远东大学的副教授达·扎娅茨为《简明文学百科全书》（1975）第八卷写出专门词条介绍黄遵宪。此外，在《外国文学主要作品选、东方文学》一书中也选入了黄遵宪的诗若干首。

扎娅茨对黄遵宪的观点在苏联汉学界具有代表性。她认为，黄是"中国诗人、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拥护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改良运动"，"在诗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斗争的各个阶段"，"其诗歌不但揭露列强对华的罪恶政策，而且，暴露清廷妥协投降的立场"。此外，她也肯定了黄诗是中国诗坛"第一次描写日、美、越、英等国生活"的作品，在艺术上充满了抒情情调和民歌基调。

清代诗人的革命精神得到充分肯定的还有谭嗣同和秋瑾。扎娅茨曾于1987年出版一本篇幅不大的专著《秋瑾——中国的女革命家和女诗人》，系统介绍秋瑾的革命生平及其反映革命志向和革命斗争的诗作。汉学家维·索罗金为《文学百科词典》撰写的"中国文学"条目中，评价黄遵宪的作品是"突出的爱国主义抒情诗"和"主张更新古典诗歌形式"的同时，也充分肯定谭嗣同提出"诗界革命"的功绩。

---

① 见《东西方文学的相互关系》文集，1961年，第81~118页。

二　杜甫研究今昔

我国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712～770）的诗在俄罗斯和苏联都曾广泛流传，他是俄文读者最欢迎的世界著名诗人之一。

（一）最新的评价

1987年，俄文版新编的《唐诗集》问世。这是苏联外国文学翻译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但收入的作品多，印数大，计选入唐代54位诗人的610首诗，印数达五万册，而且有当代资格最老的汉学家艾德林（1909～1985）写的一篇长约两万多字的序言，系统地评介唐诗，简要而精辟。其中，评论杜甫的文字也富有代表性，反映了苏联汉学界对杜甫的最新评价。主要部分摘录如下：

杜甫的创作通常分成四个时期。35岁以前是求学和流寓时期，了解祖国风土人情，结识李白、高适并曾一起游历。据保存至今为数不多的杜甫青年时代诗句判断，他是很有抱负，对自身的力量和才能充满信心的人。随后，是落魄长安十年，至42岁为逃避安禄山之乱才离开。杜甫在首都长安时生活困窘，仕途无望，但比起人民的苦难来，他个人的不幸已不算什么了。他倒是在某些地方预见到唐代王国即将覆亡，于是产生了《兵车行》这首谴责好战者

的名篇。这是首前无古人的诗作，以相送出征开篇，以战死者新魂旧鬼的哭泣与怨诉结尾。杜甫提出要求罢征战……

在安禄山之乱以前不久，诗人写了一首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一著名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诗人为自己安宁的生活而感到羞愧。

不过，安禄山之乱所造成的苦难，还未能使思想上业已成熟的诗人进一步发展下去。杜甫创作的第三个时期自他从叛乱者手中逃出开始。他陷于贼手时曾哀哭国家的覆亡。逃出之后便写成《羌村》以及“三吏”、“三别”（共六首）等著名的诗篇。这些记事的诗作对诗人的家庭和平民百姓都作了真实的描写。他在《新安吏》中描述到被驱赶上战场去的几乎都还是孩子。诗人告诉做母亲的：哭也没用，“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他的“三别”诗就是凄惨的独白。这些诗都表达了为人民和国家的灾难忧心如焚的心情。诗中大量的“散文句子”，以及由这一切所组成富于诗意的现实图景，使得人们把杜甫的创作称为“诗史”。

杜甫创作的最后一个时期可以从759年，即从他弃官之后于年底来到成都时算起。他在成都西郊建成了“草堂”。然而，他的生活并未安定下来，他还是在流寓的途中去世。在最后11年中，他写了一千多首诗，其中有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个人生活的不幸导致诗人期望有一座广阔的大厦，以便使普天下的穷苦人能够得到救助，到那里去躲避风雨：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同情心，不是在饱受苦难的人面前为自己的安宁感到羞愧，而是明白地表示，为了穷苦人的福利，假如需要，他愿意牺牲自己。这里也不仅仅是杜甫个人思想感情的进步，而且也是中国诗歌在其对人的态度方面的发展。自我牺牲的意愿此时还是相当抽象的，因为诗人还看不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真实途径，自然他只能寄希望于君王的善心……不过我们后面还可以看到，就连白居易这样的诗人对于最高统治者也是存有希望的。而他对于现实的揭露已经比杜甫更加具体得多了。

为农民而焦虑，期望他们得到富足，以及对自身的安宁感到内疚——这一切即便在杜甫吟咏自然的诗歌中也时有表现。……在有一首诗中，他对于暴雨冲走他的茅屋态度很冷静，但愿雨水能够使庄稼长起来，但到暴雨已经成灾时，他便思考起庄稼人的不幸……

杜甫也写过吟咏友情、吟咏山水的诗歌。这类诗句总是鲜明、朴素又具体。

杜甫的创作对于中国诗歌有着长远而巨大的影响……我们觉得，杜甫的影响比李白要大，因为李白尽管具有令

人惊叹的独特个性，但总还是传统的东西；而杜甫虽然在多面性和鲜明性上稍逊一筹，但由于他在运用自己巨大才能上目标专一，第一次真正地把流离失所的人们引进了中国诗歌。诚然，在此之前也有人对颠沛流离的人们表示关注，但从来没有（像他）如此的专一和深切①。

（二）新编与旧译

这部由艾德林新编选的《唐诗集》选入杜诗62首，基本上包括了杜甫各个时期和各种题材的诗歌。既有寄寓长安时天宝末乱以前的诗《画鹰》、《春日忆李白》、《赠高式颚》、《赠卫八处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等，也有安史之乱后的诗《月夜》、《春望》、《天末怀李白》、《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还有至成都以后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亭》、《落日》、《可惜》、《病柏》、《枯柟》等。此外，诗人出峡入湘时、居夔州时的诗也有入选的，如《白马》、《孤雁》、《晓发公安》等。从诗体上看，入选的诗也兼顾古诗、乐府，以及近体诗的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等各个方面。比起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两种唐诗的俄文译本来，这是选译杜诗最多的版本之一，因而极受欢迎，第一次印行的50 000册立即销售一空。以往的两种译本则各印出35 000册。

---

① 艾德林《唐诗》，见《唐诗集》，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3～16页。

不过，杜诗的俄译很早就有了。最早的译作是《羌村》等四首，载于1896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诗歌里的中国和日本》一书。不久之后，在圣彼堡出版由叶戈里耶夫和马尔科夫翻译的诗集《中国之笛》又选入《赠李白》等四首。此后，不断有书刊登载杜诗的俄译，至20世纪80年代（1983）统计，已发表了28种。其中，可以分成三类：

一是杜甫单个人的诗集，共有三种：

（1）《杜甫诗集》，费德林主编，吉托维奇译，谢列布里亚科夫序，蒙泽勒注释，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224页。

（2）《杜甫诗集》，吉托维奇译，蒙泽勒编选并注释，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国家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276页。

（3）《杜甫抒情诗集》，吉托维奇译，谢列布里亚科夫序，蒙泽勒注释，列宁格勒，文艺出版社1967年出版，175页。

杜甫是在苏联出版过个人诗集的一位著名唐代诗人之一，其他三位是李白、王维、白居易。

二是各种类型的中国诗集收有杜诗的，影响较大的有六种（1987年的新编本《唐诗集》除外）：

（1）《中国古典诗集（唐代）》，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计收入吉托维奇翻译的杜诗《春日忆李白》、《春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白马》等20首。

（2）《中国诗集》第二卷（唐诗），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收入杜诗20首，内容同上。

（3）《中国朝鲜诗选》，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8

年出版，收入吉托维奇译的杜诗《前出塞》、《后出塞》、《月夜》、《对雪》、《羌村》、《客至》、《晓发公安》等80首。

（4）《中国文学·作品选》，莫斯科，1959年出版，第一卷，收入吉托维奇、蒙泽勒译的杜诗《垂老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枯柟》、《孤雁》等20首。

（5）《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诗歌三百首）》，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收入吉托维奇译杜诗《春日怀李白》、《赠高式颜》、《赠卫八处士》、《前出塞》、《后出塞》、《梦李白》等87首。

（6）《印中朝越日古典诗集》，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收入阿列克谢耶夫、吉托维奇译杜诗《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梦李白》等14首。

其余为第三类，属于报刊发表的译诗，或一二首，或三四首不等，像《星》、《外国文学》、《涅瓦》、《共产党人》等杂志都曾先后译载过杜甫的诗。

苏联几代汉学家中都有人为翻译杜诗而尽力，先后出现过知名的杜诗译者阿列克谢耶夫、休茨基、吉托维奇、艾德林、蒙泽勒、鲍勃罗夫等。

（三）评论与专著

至1983年统计，汉学界已有论杜甫的文章17篇公开刊载，比较有影响的是康拉德院士论《杜甫的秋兴八首》，载《中世纪》一书，1960年，莫斯科；尼科里斯卡娅《论杜甫的诗〈丽人行〉》，载《莫斯科大学学报》东方学版，1979

年第一期，以及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艾德林《杜甫：1250周年诞辰纪念》，载《文学报》1962年4月12日、索罗金《中国诗歌的天才》，载《真理报》，1962年4月21日、切尔卡斯基《穿越十二个世纪》，载《星火》杂志，1962年第18期。

然而，这种评论文章的影响到底不如教科书和文学史书大。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都评述了杜甫的生平与创作，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艾德林、索罗金著《中国文学简编》（1962）、费德林著《中国文学史纲要》（1956）和莫斯科大学的教科书——波兹涅耶娃主编《东方文学》中国文学部分。在后一部书中，波兹涅耶娃写了专节《王维、李白、杜甫》，系统介绍我国唐代三位大诗人的创作，其中"杜甫"约占三分之一篇幅（近五千字）。文中结合杜诗《梦李白》、《丽人行》、《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前出塞》、《新安吏》、《石壕吏》、《垂老别》、《客至》等具体阐述了诗人的创作特点。作者把杜甫的创作分成三个阶段：寓居长安及到长安以前时期，安史之乱后时期，迁居成都以后时期，而分析《丽人行》一诗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由此看到杜诗的现实主义特色，则是这一节的重点。作者兼顾诗与诗人、作品与社会、点与面诸方面，有助于学生理解杜甫的作品及其成就。

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远东大学等校，不但在课堂上讲授杜诗，而且有学者已经写出评论杜甫的专著。其代表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

(1958)。此外，近年则有青年汉学家别仁著的《杜甫传》。

（1）《杜甫评传》[①] 俄罗斯汉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专著，多从社会学批评的观点出发，兼论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重在论思想性，尤其强调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人民性。《杜甫评传》是个突出的例子。该书的"序言"指斥以往论者的通病时说：

西方和旧中国的资产阶级文艺家力图把杜甫说成仅仅是形式上的大师，而绝口不谈他首先是爱国主义诗人，是中国最早的真正人民诗人之一，他热爱普通人，为他们贡献了最优秀的作品。

作者谢列布里亚科夫在评传中指出：杜甫"继承屈原、陶渊明，包括初唐诗人的传统"并加以发扬，"在中国诗歌史上打开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他对诗人作了全面的总评介后，联系时代背景来谈诗歌形象的思想意义。他说，杜甫在长安的十年失意，"并不是一个失意者的遭遇，而是一个具有高尚理想的人在封建时代的典型命运，他的理想同现存制度势必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他的诗便显出暴露社会的倾向。

作者着重分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兵车行》、《石壕吏》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一批诗作的思想内容，指出杜甫希望看到祖国的土地从侵略者手下解放出来，因而诗中大大加强了"爱国主义基调"。同时，由于

---

① 谢列布里亚科夫《杜甫评传》，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

诗人接近人民，才“使他的诗具有人民性”。“在诗中歌颂普通人的精神美并鞭挞官吏的残暴”。他把诗人的艺术成就归结为：“杜甫的抒情诗中塑造的是诗人自身的形象——这是一个能深切体会他人的苦乐、关心祖国人民的命运，在当时堪称为进步人士的形象”。

作者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分析杜诗的艺术性，肯定杜甫作为“诗人有娴熟的，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创造了准确、鲜明的形象，达到诗歌叙事的最大容量和集中概括”。不仅如此，作者还注意从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样高的成就依然跟时代有关：一方面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著名的诗人就有两千多人，流传下来的诗也有 49 000 多首。杜诗正是这股诗歌洪流中的突出代表，是众多诗人经验的荟萃。另一方面，杜甫个人的成就也是当时诗坛各种条件形成的。当时情况复杂，流派纷呈。有人单纯模仿前人，格调单一；有人盲目追求形式而无思想内容；有人无病呻吟，消极颓废；有人苟且偷安，力图摆脱安禄山之乱后出现的复杂局面，不敢面对现实。当然，也有人继承民间创作《诗经》和乐府的传统，能够广泛地概括现实，反映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和人民的苦难。杜甫恰好是在这许多互相对立的诗歌流派和传统中作出正确的抉择，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就。

书中从艺术上肯定杜诗时，强调指出杜诗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例如它夸赞杜甫的山水诗，尤其是杜甫漂泊西南，寄寓成都郊外草堂时期吟咏自然的诗，“比陶渊明还

要质朴和鲜明”，“他绝少书卷气和文诌诌的语言，他能从容不迫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江亭》一诗恰似在同挚友谈心”。而且“杜诗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山水诗”，它“把歌颂祖国大地之美、歌颂普通农夫的生活等基调同诗人对自身命运和国家大事的思考结合在一起”。

书中进一步探讨杜诗对后代的影响，说“杜甫是唐代‘社会派’诗歌的创始人。这一派诗人深化了杜甫的创作原则，创造了许多社会题材的诗歌”。同时，“杜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后代诗人向他学习的正是“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和高超的诗艺”。谢列布里亚科夫在这部专著中始终强调杜诗的思想及其社会价值。他正是从社会功利主义的角度来强调杜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位古代优秀作家的诗句至今还能激励读者，在他们的心中激起高尚的情操”。因此，可以说：“杜甫的声誉已经超越中国国界”。

谢列布里亚科夫要算是苏联汉学家中研究杜诗成就最大的一位。他 1950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留校任教后即以杜甫诗为研究的起点，1954 年完成论文《八世纪伟大的中国诗人杜甫的爱国主义与人民性》，获副博士学位。接着，不断深入研究，扩展规模，形成专著。后来，研究的重点虽然转移到宋词上，但唐诗和杜甫却仍然是他关注的领域，在长期的教学中一直注意加以讲授。

（2）《杜甫传》① 这是苏联评介杜甫的另一部重要著作，

---

① 别仁《杜甫传》，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7 年出版。

为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研究员青年汉学家别仁所著。《杜甫传》被列入“名人传记”丛书，是面向广大青年读者负有思想品德教育使命的读物。这套丛书自从 1933 年由高尔基创办以来，中国作家里只有杜甫享受到“名列其中”的殊荣，足见苏联对杜甫的重视。书中介绍诗人的生平业绩，突出强调其热爱祖国、接近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以及其现实主义的创作。别仁，原名列昂尼德·叶甫盖尼耶维奇·巴迪尔金，是诗人兼汉学家，对杜甫有长期的研究，除了译杜诗，还参考中国作家的创作，特别是冯至的《杜甫传》，陈贻焮的《杜甫评传》、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以及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等书，把这部俄文版的《杜甫传》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感人，很适合青年读者阅读。别仁认为，中国古代的传记与西方的写法不同，几乎不注意人物的内心的感情和生活细节，而只记叙传主的丰功伟业和高洁品行，因而他写这部传记时就要弥补其不足，兼顾两个方面：既写言行，也揭示内心。

别仁解释他的写法，认为这样去写杜甫并不难。因为杜甫并不遵奉古时候那样的信条：“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相反，他是力图走出去，到各个生活领域里去，无论担任公职或种地割稻，无论外出远游，还是作文写诗，他都努力实践，同时把这些实践反映在其诗中。从诗中可以看出杜甫的外貌细节：瘦削的脸形，稀疏而斑白的头发和胡须等等，一切都可以捉摸得到。还有，杜甫也不像中国古代的僧道隐士那样，在“忘却尘世生活或者从参禅之中去寻

找诗的灵感”。相反，他的灵感直接来源于城市的生活，他的诗中充满着喜怒哀乐，一切人类的感情——他的妻子儿女如何幸免于安禄山之乱，他如何孵养小鸡，以及如何带着猎鹰去追逐猎物，这一切在诗中都写得非常逼真，犹如中国古代画家的写生，同时又充分反映诗人的感情，把一切写得优美动人。此外，“杜诗还把祖国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富于民族的风情，包括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婚葬仪式，是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宝贵资料”。在别仁看来，杜诗正是“历史、神话、传说和民间口头创作的综合，杜甫是一面真实的民族之镜。它既反映民族的过去，也反映它的现在和将来”，恰好可以充当青年爱国、爱民和爱生活的教材。

三　章回小说译本种种

章回小说在俄苏的传播始于19世纪上叶。1832～1833年在莫斯科由拉扎列夫印刷所出版《好逑传》（114卷），系从法文转译的。1843年俄国一家重要杂志《祖国记事》译载《红楼梦》第一回，柯万科译，载当年第26期，曾引起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赞赏。译者谈到他的翻译动机时说：“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喜庆节日，婚丧嫁娶、消遣娱乐，官宦的舞弊、奴婢的机诈……这一切在书中都有惟妙惟肖的描述。”“如果把这本书译成俄文，那么那些想了

解中国人习俗或希望学习汉语的人都将受益匪浅”。后来，在20世纪初又译出《施公案——中国福尔摩斯》，阿凡纳西耶夫节译，1910年在海参崴出版，并在1909～1910年的《边陲报》上连载过。

俄国最早对中国章回小说作出评价的是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章回小说大批译成俄文则是在苏联时期。几部中国古典名著都在是20世纪中期翻译出版的，计有：1954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两卷本，帕纳秀克译；1955年施耐庵的《水浒传》两卷本，罗加乔夫译；1958年曹雪芹的《红楼梦》两卷本，帕纳秀克译，和刘鹗的《老残游记》，谢曼诺夫译；1959年吴承恩的《西游记》四卷本，罗加乔夫、科洛科洛夫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沃斯克列辛斯基译和李汝珍的《镜花缘》，费什曼、蒙泽勒、齐别罗维奇译；1960年曾朴的《孽海花》，谢曼诺夫译，以及1963年钱彩的《说岳全传》两卷本，帕纳秀克译。

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有1974年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帕纳秀克译；1977年的《金瓶梅》，马努辛译；1983年罗贯中、冯梦龙的《平妖传》，帕纳秀克译。

其中，几部名著还出过缩写本：《三国演义》（1984）、《西游记》（1982）、《水浒传》（1968）。

译者多为苏联著名的翻译家，如帕纳秀克、罗加乔夫、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谢曼诺夫、马努辛等。

评介章回小说的论著，除了几本综述性的文学史书、专题论文集外，就是一批专著。其中，有李福清的《从神

话到章回小说》（1979）和《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1970），罗加乔夫的《论吴承恩的〈西游记〉》（1984），谢曼诺夫的《中国章回小说的流变》（1970），费什曼的《中国的讽刺章回小说》（1966），还有专论某一部小说的系列论文，如：鲍列夫斯卡娅论罗懋登《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马努辛论《金瓶梅》，沃斯克列辛斯基论《儒林外史》，斯科罗包加托娃论《镜花缘》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单篇论文。截至1983年，苏联发表论及章回小说的论文共有120篇。其中，《红楼梦》最多，有27篇。其他较多的依次为《水浒传》20篇、《儒林外史》16篇、《西游记》15篇、《三国演义》11篇、《镜花缘》11篇等。

四 《红楼梦》在苏联

俄苏对《红楼梦》一向比较注意，早在1843年《祖国记事》杂志第26期就刊载了由柯万科译的《红楼梦》第一回。瓦西里耶夫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一书在评述中国长篇小说时，也把《红楼梦》放在首位。从第一次译介以后一百多年里曾几次有人计划翻译全书，终因太难没有实行，直到1958年才由莫斯科军事外语学院汉学家帕纳秀克译成俄文两卷本，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的诗词为列宁格勒汉学家孟列夫翻译，俄文版的序系费德林所作。

俄国为搜藏《红楼梦》的版本曾费尽心力。目前，在苏联图书馆中就保存有60多种刻本的《红楼梦》及其续集。其中，在列宁格勒亚洲图书馆馆藏抄本《石头记》是连中国也没有的孤本，它在1964年被发现，为我国已知的《红楼梦》12种抄本之外，增添了第13种抄本。

苏联写过评《红楼梦》文章的人不少，主要有三个人，最早的是莫斯科大学教授波兹涅耶娃。她于1954年为王力的《汉语文法》俄译本写了序文，由于这本文法书里许多例句都是引自《红楼梦》，她的序文便题为《论红楼梦》，以帮助读者既能理解文法书，也可以了解小说的内容。这篇长达15页的序文中涉及小说的成书、作品内容、人物形象和思想和倾向等方面，是第一篇向俄文读者全面详细地介绍《红楼梦》的文章。

后来有莫斯科大学副教授林林（1924～　）作为专门课题进行研究，她是林伯渠的女儿，1959年毕业于苏联作协的高尔基文学院，1972年以论文《红楼梦中的新人研究》获副博士学位。此外，她在20世纪70年代还发表过论《红楼梦》的文章八篇。《贾宝玉：中国启蒙主义小说〈红楼梦〉中的正面人物》一文（1970），认为宝玉对内心自由的追求与父亲宗法道德观处处发生冲突，曹雪芹在宣扬“童心”这一点上和卢梭的思想是相通的。《〈红楼梦〉中的“芙蓉女儿诔”》一文（1972）指出，宝玉祭丫环晴雯的这篇诔文，正是其内心世界的披露，它不是献给达官贵人，而是悼念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奴，是对传统的冒犯，这一点

表明曹雪芹思想有启蒙主义的性质。在《论〈红楼梦〉中的两个妇女形象》一文（1974）中，林林分析宝黛两个女主人公，指出宝钗深受儒家道德观念的熏陶而不能理解黛玉的孤高自许，但也不能把宝钗全盘否定。

另一位研究者是庞英（中国籍，长期居留苏联），他近年来对新发现的列宁格勒抄本进行专门的研究，用它和其他版本互相勘比，准备以它为底本，印出一个加评注的本子，至1981年他已发表系列文章七篇。在《文学传统对〈红楼梦〉的影响的若干例》（1979）一文中，他对照了《金瓶梅》和《红楼梦》两书的内容，指出后者从前者借取了若干情节和文字。此外，李福清和孟列夫对苏联小说藏本也作了分析，思乔夫对小说中服饰进行的分析也颇有特色。

五　彼得堡新发现《红楼梦》抄本

1964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发表署名文章，宣告在该所保藏的中国古籍里，发现有一部前所未闻的《石头记》抄本。

（一）新发现的抄本概说

此抄本为《红楼梦》80回本，共35册（合计1 752页），线装，有包角。抄本用清代常见的竹纸，纸色浅米黄，纸质似不够光洁。抄本的底本属于脂砚斋评本。抄定

的时间推断不早于乾隆末年，也不晚于道光初年。在嘉庆年间最为可能（1796～1820）。

抄本无总题。书名系置于每回回目之前，大多数回目之前置以“石头记”，如

石头记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只有个别回目之前置以“红楼梦”，如

红楼梦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抄本用毛笔竖行抄写，大体上每页 8 行，每行 20 字，按笔迹判断，抄写人先后有 8 位。字体有繁体字、简体字和不标准的手抄体。抄后装订用的衬纸是清高宗的《御制诗》第四、五两集，系重装时衬入。

（二）发现过程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前身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是俄国东方学书籍的最大图书馆。其藏书侧重古代东方文献、手抄本、木刻本，历史文集等 70 多万册，包括汉文等手抄本 7 万多册。在该东方学研究所抄本部的这本《石头记》抄本，曾经过 20 世纪的三次清点（1937、1940 年代和 1956），均未引起注意。直到 1962 年，汉学家李福清为调查中国小说俗文学各种不同

藏本时，才注意到它。于是他同该所的汉学家孟列夫开展考证工作，在1964年发表文章公布这一发现[1]。文章立即引起日本和我国台湾学者的注意，他们于1965和1973年先后发表论析的文章。在俄国已有多位学者以该抄本为据开展研究工作。

孟、李二人进一步考察了抄本传入俄国的经过，证实此系俄国东正教宗教使团第11届成员，俄国留学生库尔梁德采夫带去的。他1830年来北京，1832年回国。据同批来京的另一位学生科万科说，他们需要尽快学会口语，但又无法经常同中国人接触……这本书是用地道的口语写成的，因此正合他们心意。

198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派员前往考察，将抄本影印回来，由中华书局出版（1986），分成六册，书名为："《石头记》　曹雪芹著　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在影印出版本"序"文中肯定："此抄本所据底本既系脂本旧文，且其中部分还保存早期未分回之初状，抄本正文虽颇有脱漏，然亦甚多可以与其他脂本对校，足以补其他脂本之抄误、抄漏者，固已弥足珍贵矣。"

"此本于道光十二年（1832）传入俄京，迄今已越152年，乃赋归来，实为红学界之盛事，亦中苏文化交流之佳话也！"（同上"序"）

---

① 孟列夫、李福清：《前所未闻的〈红楼梦〉抄本》，《亚非人民》，1964年第5期。

第八章

汉语言文学教育

俄国的汉语教育早期可以追溯到1715年东正教派驻北京使团所设立的俄罗斯馆。在国内，系由比丘林于1831年在恰克图开办第一所汉语学校。以后1837年在喀山大学东方系、1855年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先后开设汉语教研室，使得汉语言文学教育在高校立足。

一　王力《中国语法纲要》俄译

20世纪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的汉语专业都使用北京大学教授王力的《中国语法纲要》为教材。

早在1950年代初，王了一（王力）所著《中国语法纲要》一书就被引进苏联并译成俄文，作为汉学专业大学生用书，而为该书俄译本（1954年正式出版）作序并加了详注的人恰好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汉学家龙果夫。序文盛赞王著的权威性，由此王力先生的著作得以在苏联流传。

由于该书多数例句引自小说《红楼梦》，为帮助学生理解，就请莫斯科大学教授汉学家波兹涅耶娃另写了一篇序文，介绍小说是怎样的一部名著以及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包括人物形象评析等，成了一篇很有分量的《论〈红楼

梦〉》文章，这更引起学生对该语法书的兴趣。波兹涅耶娃的文章又是有名的《红楼梦》论文，而引起我国文学界重视，被译成中文在《人民文学》1955 年第 6 期发表，并被多种红学论文集转载。

在 1950 年代中期，当龙果夫写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52）一书时，反过来立即得到王力等中国名家的肯定，先是被逐章翻译过来，分期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刊出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后，又在 1958 年出版全书（科学出版社）。该译本系由郑祖庆初译，王力、吕叔湘、邵荣芬、范继淹逐章校改译文，吕叔湘撰写按语。从这个译者的阵容可以看出该书是多么受中国学界的重视。译者在中译本序文中高度评价："龙果夫教授这本书，对语法有比较开明的看法，不肯把西方的语法体系，强加在汉语上。"

正是由于权威学者的评介，这本书才更快地引起重视，而且在中国也长期流传，至今仍为汉语专业研究生的参考书。它不但在汉语语法研究学术史上占有历史地位，而且在当前也具有实用意义。它并使得龙果夫与王力的一段文字因缘显出光彩。

二　汉语第六方言的发现

龙果夫（1900～1955）出生于圣彼得堡一官吏家庭，192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民族与语言科。他先后在苏联托尔马切夫军事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和海参崴

远东大学等校执教 11 年，在此期间在汉字拉丁化委员会兼职。他曾协同瞿秋白在推行汉字拉丁化上做了许多工作，包括拟定拉丁化方案、组织人力付诸实行和推广等，后来进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专事语言研究。

他很早就显示出对语言的敏感性和研究才能，他青年时代发现新方言的故事至今仍传为美谈。1930 年代初他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院教中国留学生俄语的时候，就注意从那些中国学生的口语中搜集语言资料，以进行汉语方言研究。那时有大批中国热血青年在北伐战争和大革命失败后纷纷避难苏联，人数多而且来自许多地方。龙果夫充分利用了这种特殊的条件。过去一般认为中国有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语等五大方言体系，可是他在调查中发现，有两位来自湖南省湘潭县湘乡的学生讲的方言很特别，他闻所未闻。于是他用录音整理的方法记录下来作分析，反复对比研究，发觉它不属于五大方言之内，随即发表文章阐明新的发现，引起很大反响。

限于当年的条件，龙果夫不可能亲身来华，于是由苏联科学院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到中国当地验证，结果证实了他的发现。从此传开了他没到过湖南却发现了“湘语”方言的故事，犹如在俄国流传的发现北冰洋的故事一样。据说先有科学家根据报纸报道冰的流向信息，推测有北冰洋存在，而后才由北极探险队加以证实。此二事被传为美谈：“科学家看报纸发现了北冰洋，龙果夫在家里发现了中国的第六方言。”

龙果夫的科学发现并不是出于一时的灵感，而是来自

深厚的民族知识和语言功底。1930 年他在欧洲国际上最具权威的汉学年刊《通报》发表长文《方块字文献和古代官话》，对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 ~ 1945）以前所作的中古汉语构拟作出了重要修正。那时已经激起波澜，引起了世界汉学界的刮目相看。

三 “部尾检字法”的汉语字典

汉学家鄂山荫（1900 ~ 1982）按俄文音译应为奥山宁，但他以自取的中文名行世。他在苏联驻华外事机构任职，居留中国 10 年，后转入几所高校任教，最后调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任字典部高级研究员。

不过，他关注的中心始终是如何让俄国人更便于掌握汉语的字词，其目标是编纂出汉俄字典。从 1956 年起，鄂山荫调任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字典部主任，而日后编出的《华俄辞典》便成了他研究事业的顶峰，也是他的代表作和毕业劳作的结晶。

鄂山荫编成的辞典前后共出了 4 版。第一版出版于 1952 年，收词 6.5 万条，共 891 页，书名为《华俄辞典》（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第二版成书于 1955 年，收词增至 7 万条，但篇幅仅增为 900 页；到了 1959 年出第三版时，篇幅已增至 1 101 页，其间在 1957 年还曾出过一种袖珍本《华俄简明辞典》，收词约 1.7 万条；至于第四版的问

世已是在他身后的 1984 年。鄂山荫在 1982 年 9 月 5 日去世，辞典则由后人接着完成。该版的篇幅已大为扩展，成为四卷，于 1983 年至 1984 年出全，所收词语剧增至 25 万条，四卷的篇幅共计在 3 600 页以上，书名也改为《华俄大辞典》（Вольщо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коеарь）。

这是俄国正式出版传世的唯一一部大型汉俄辞典，更是鄂山荫博士学术上的一座丰碑。如果从 1945 年鄂山荫开始准备工作算起，经过几种版本的逐渐演进，到 1984 年四卷本最终完善，则前后历时近四十年。

这本辞典采用的"检字法"极为别致：曰"从右下角的笔形算起"。对方块字来说，"右下角"往往是汉字的最后一画，因此姑且称之为"部尾检字法"，同中国人习用的"部首检字法"相比，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辞典即按方块字的右下角的笔画字形归成 5 类"部尾"，每类之内再分成若干组。整部字典的快速检字表便成了 5 类、24 组了。然后，每一组才包括若干栏，总共设为 60 栏目。

以下是包括有 5 类 24 组 60 栏目的汉字快速检字表：

附表 1　按黑体笔画确定部尾

В приведённых ниже иероглифах основа отмечена жирным штрихом:
上 下 片 門 多 勿 木 兆 飛 頁
Для печат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шрифта установлены 24 основные характерные черты, они составляют 24 раздела словаря. 6) Основные черты располагаются в следующе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附表 2　按部尾分成的五类

Отделы	I	II	III	IV	V
Направления	→	↓	↙	↘	↘↗
Основные черты	一 口 ↦	丨 丨 丿丨 ㇕ ㇕ ㇁	丿 ㇇ ㇇	㇏ ㇂ ㇈ 乂 ㇗ ㇊ ㇏ 儿 乙	丶 ㇏ ㇀
Количество основных черт	3	6	3	9	3

附表 3　按五类部尾分成的 24 组

В развёрнутом виде порядок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основных черт（т. е. 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лфавит）будет таков:
一 口 ↦ 丨 丿丨 ㇕ 丨 ㇕ ㇁ 丿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乂 ㇏ ㇂ ㇗ 儿 ㇈ ㇊ 乙 丶 ㇏ ㇀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B）Для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местоположения иероглифа в словаре нужно определить основнуIo черту отыскиваемого иероглифа и найти по указателю на внутренней стороне обложк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раздел и номер его страницы.

这种“部尾检字法”是俄国人用惯了的方法，已有悠久的历史，由第一代汉学家瓦西里耶夫院士于 19 世纪首创，传到 20 世纪初的罗森堡为第二代，再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三代的郭质生（科洛科洛夫），代代相传，凡编纂汉俄字典的人，都使用这种方法。不过，前面三代编过的汉俄字典都不曾长期流传，有的甚至只是手稿而未及出版，唯

有鄂山荫编成的字典，才使这种方法定型和流传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鄂氏的新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青年一代来华留学的人数量日增，新一代更习惯于拼音字母为序的中国汉语字典了。

四 现代文学进课堂

（一）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引进中国文学的“洪流”中，现代文学占很大比重，现代文学十大名家鲁、郭、茅，巴、老、曹，沈、艾、张、赵，除沈从文、张爱玲未作介绍外，均已被翻译。已出现有《鲁迅选集》（四卷）、《郭沫若文集》（三卷）、《茅盾文集》（三卷）、《巴金文集》（两卷）、《老舍选集》（两卷）、《曹禺剧作选》（一卷）、《艾青诗选》和《赵树理小说选》，其他如叶圣陶、丁玲等大家都有介绍。其规模之宏大，时间之集中，在世界汉学史上极为罕见。鲁迅被称作中国的“高尔基”或“果戈理”，其研究既多且深，独得学界青睐。这种热潮，“表明了苏联学者和全体人民对中国命运的深刻关注，以及他们同中国人民扩大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华克生语）。而在20世纪60～80年代，切尔卡斯基持续不断地编译诗集，恰好组成了一个介绍现当代诗歌的完整系列。所编四本诗集选诗人逾百名，

规模相当可观。“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勃兴立刻引起汉学家的注意。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苏联又出现了译介中国文学的热潮，特别是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这时汇编成书的作品集，有七种中短篇小说，十种中长篇小说，一部诗集，收入作家诗人数十名。当代作品的俄译本印数很多，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俄国学者肯定我国的新时期文学，认为它有暴露阴暗面和反映开放改革成就的作用，竭力向读者推荐新一代作家。关于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创新，他们的探索也很细腻。迄今已出有研究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曹禺、艾青等人的专著或评传，每人至少一卷。

总之，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大体包括文学史、作家论和作品分析等范畴，由于涉及面广，成果丰硕，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学术体系。其学术特色是密切联系时代思潮，重视思想性、民主性、进步性和革命精神。这也是他们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因此某些西方还很少介绍的作家，苏联都有译介和研究。

中国文学不仅译成了俄文，而且译成了乌克兰文、塔吉克文、亚美尼亚文、哈萨克文等多种文字。

（二）现代文学教学

高校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是从王希礼（瓦西里耶夫，1899～1937）开始的。他于1927～1930年随苏联军事顾问团来华，参加北伐战争，曾与鲁迅通信，最早翻译了鲁迅

的小说《阿Q正传》(1929)。回国后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首开一门系统的新课《中国新文学》，讲授五四运动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定型是在20世纪50年代，有波兹涅耶娃和谢曼诺夫两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内容包含1917年以降的现代文学创作。收入波氏等主编的《现代东方文学》(1977年出版)一书中，是俄国高校当年稳定的教材。

五　解放区文学备受青睐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1年便有5位作家荣获苏联国家奖——斯大林文奖金，即丁玲、周立波、贺敬之、丁毅、刘白羽，均来自解放区。他们时常在俄文报刊上被广为推介。此外，凡是出自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当年在苏联文艺界均备受重视，迅即被翻译出版。

当时被翻译的代表作品举其大者如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罗果夫译，1952)，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波兹涅耶娃译，1949和1952)、《丁玲选集》(波兹涅耶娃译，1954)，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鲁德曼译，1951和1952)、《山乡巨变》正篇(俄译本改名《春到山乡》，克里弗佐夫译，1960)及续篇(俄译本改名《清溪》，克里弗佐夫译，1962)，《铁水奔流》(伊凡科译，1957)，赵树

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克里弗佐夫译，1949)、《李有才板话》(施奈德译，1974)，《张来兴》(俄译本改名《硬骨头》，贾托夫译，1963) 和《赵树理选集》(贾丕才译，1953) 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罗高寿、斯佩兰斯基译，1951)，邵子南的《地雷阵》(彼得罗夫译，1950)、欧阳山的《高干大》(彼得罗夫译，1951)，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法恩加尔译，1960) 和《上海的早晨》(斯拉勃诺夫译，1960)，柯蓝的《红旗呼啦啦飘》(贾托夫译，1951)。

草明的《原动力》(罗高寿译，1950)，刘白羽的《火光在前》(伊凡科、帕纳秀克译，1951)、《刘白羽选集》(罗扎诺夫译，1955)、《无脚拖拉机手》(俄译本改名《永不熄灭的火焰》，斯米尔诺夫译，1959)，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马尔科娃译，1957)，胡可的《战斗里成长》(贾托夫译，1951)，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贾托夫、克里弗佐夫译，1957)，吴强的《红日》(谢曼诺夫、斯米尔诺夫、施奈德译)，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帕列伊译，1956) 等。

袁静的《红色交通线》(俄译本改名《特殊任务》，戈洛夫略夫译，1961)，马烽的《仅仅十年》(收入 17 个短篇，贾托夫译，1960) 和《不能忘记的人》(短篇小说集，文学社编选，1960)，周洁夫的《走向胜利》(沙什洛夫译，1959)，梁信的《刘胡兰》(切尔卡斯基译，1958)，雷加的《站在最前列》(戈洛夫略夫译，1959)，张孟良的《儿女风

尘记》（伊凡科译，1959），冯德英的《苦菜花》（帕纳秀克译，1959）和《迎春花》（帕纳秀克译，1961），梁斌的《红旗谱》（俄译本改名《三代人》，帕霍莫夫、亚诺夫斯基译，1960）。

拒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解放区文学被翻译成俄文的就有27位作家的近40部小说。当年这些作品在苏联读者中曾广为流传。

此外，还有新诗（即白话诗）已译成俄文的，除有诗人个人诗集为单行本，如作家《萧三诗选》（诗人自译，1954），艾青的《黎明的通知》（吉托维奇译，1952）、《太阳的话》（切尔斯基编选并译，1989）和《艾青抒情诗选》（尤·索罗金译，1981）以外，流行最广的为费德林编选于1959年出版的《中国新诗集》（1919～1958），费氏邀集了艾德林、切尔卡斯基、吉托维奇、亚罗斯拉夫采夫、鲍特文尼克、戈卢别夫、阿历山大罗夫、捷尔-格里戈梁、埃弗隆等35位译者，选译41位中国现代诗人新写的新诗，其中除郭沫若、康白情、闻一多、朱自清、冰心、冯至、蒋光慈、殷夫等外，其他大部分均为来自解放区的诗人，有毛泽东、朱德、刘伯承、萧三、柯仲平、蒲风、何其芳、田间、力扬、卞之琳、王亚平、严辰、戈壁舟、李季、阮章竞、张志民、贺敬之、郭小川等。

俄苏汉学家对中国解放区文学如此大量地、长时间地坚持翻译介绍，这在国际汉学史上显得特别突出，也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够比拟的。

第九章

民间年画和中国画论

199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由苏联学者李福清和中国学者王树村、刘玉山合编的《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首次把二百多幅在中国已佚传的年画公之于世。据编者介绍，在国外所藏的中国年画中，以俄苏的藏品为最多。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冬宫）藏有五千多幅，该市民俗及宗教史两个博物馆各藏有五百幅左右，列宁格勒市立图书馆一百余幅，莫斯科东方民族艺术馆约五百幅，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五百多幅，伊尔库茨克州美术博物馆150幅，喀山大学民俗博物馆三百多幅，基辅东方西方艺术博物馆五十幅左右，鄂木斯克市艺术博物馆20幅，其他如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市等也有一些藏品[①]。《珍品集》所收多为清代已佚传的精品。该书用中俄文两种文字出版，这引起广泛的注意。人们开始探究，为什么俄苏藏有那么多的中国年画，这需要从几代的收藏家和研究者的活动来做各方面的考察。

① 参阅李福清《中国年画在苏联》，《明报月刊》，1992年2月号。

一　俄国收藏中国民间年画的首创者

俄国收藏中国年画的首创者是弗·列·科马罗夫（1869～1945）。他后来成了俄国科学院院士（1920起）和院长（1936起），毕生的贡献殊多。主要的一项是考察俄国远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植物区系。有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学和植物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是物种的地理形态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在青年时代，他曾于1896和1897年两次前往东北研究植物群系。第一次到过吉林市，第二次到过沈阳和吉林。两次都买了不少年画，共约三百幅。

1898年的一天，他在彼得堡的俄国地理学会作报告介绍植物研究成果的同时，展览了他带回的中国民间版画藏品。其中有印刷的佛像、戏曲故事、天津都市风光以及各种历史和现实文学题材的年画。“这可能是世界上的第一次中国年画展览会”。[①]

这批展品大多是杨柳青印刷的，其中有不少已佚传。如大型《红楼梦》年画：《藕香榭吃螃蟹》，画中有贾母、史湘云、王熙凤、彩云等23个姑娘和宝玉在一起（故事见小说第三十八回），系杨柳青盛兴画店印的。

一个植物学家，怎么会想起收藏中国年画呢？这要从

① 李福清《中国年画及其俄国收藏者》，《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1期。

当时俄国学术界的思潮来看。从19世纪中叶起，俄国学术界就对民间文化发生兴趣，有的人记录民间故事，有的人搜集民间谚语和风俗！有的搜寻并编辑出版民间版画。这种风气甚至影响扩大到中亚民族的学术界，即以吉尔吉斯为例，它的16世纪以前创作的英雄史诗《马纳斯》就有哈萨克民族学学者在1856年记录的，又有1862和1869年俄国学者记录的，[①] 虽然都只记下了若干片断，但却可以证明，学术界对民间文化的意识是萌发得较为早的。同样的史诗在我国克尔克孜民族中也有流传，但中国学术界开始记录《马纳斯》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

科马罗夫无疑是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他在1940年致阿列克谢耶夫的信中就谈到，他“在满洲搜集中国年画时，不曾想到它们的科学价值，而只是注意到它们的风俗价值”。[②] 同时，他也对俄国汉学家不重视其风俗价值疑惑不解：“我在1898年展出自己的全部藏品时，汉学家们态度之冷淡更使人以为这些藏品毫无价值”。[③] 其实，这并不能怪汉学家。因为他们受的是中国正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囿于传统，只重视研究中国的儒、释、道学，而民间文化如年画之类照例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了。

相反，俄国学者从民间文化的意识出发，往往能突破局限，更早地注意到年画的价值。俄国版画和木版画的收

---

① 《简明文学百科辞典》，莫斯科，第3卷，第526页。

② 转引自李福清《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序”。

③ 转引自李福清《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序”。

藏家与鉴赏家罗温斯基（1824～1895）就是从搜集俄罗斯民间版画开始，后来对东方民间画也发生兴趣。1875年他乘船游埃及、印度、中国、日本，就注意搜寻当地的民间画。目前，收藏于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罗温斯基藏品中，就有四十幅中国年画，其中不少是中国已佚传的珍品，如据《红楼梦》第四十九回画的《薛宝琴拆梅》，细致工巧，画薛宝琴披着皮衣，右手拿一枝盛开的梅花，后边是陪伴的丫环，也拿着花瓶，里面插一大枝梅花，此画系杨柳青印的。还有，杨柳青齐健隆画店印的《文王请太公》、爱竹斋印的《司茶花神白乐天》等。这些稀世珍品的收藏竟来自非汉学家之手，从中也可看出当时民间文化意识在不同领域学者身上的差别。这些收藏虽然件数不多，据说还是俄国最早的中国年画藏品。

当然，科马罗夫之收藏年画可能还有个人的原因。正如瓦西里耶夫院士在熟悉了中国文学之后，曾为俄国知识界不了解这个邻邦大国而感到惭愧一样，科马罗夫也在考察了中国东北植物界的过程中，对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情况发生了兴趣，喜欢勤劳的中国人。他的考察日记中，就反映出曾参观寺庙，对佛像、关帝塑像、各种地狱景象的泥塑都有兴趣加以了解。因而，他虽然不是汉学专业研究家，却为俄国的汉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二　中国民间年画的研究者

作为苏联汉学奠基人的阿克谢耶夫院士（1881～1951），曾在汉学的各个领域作过探索，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年画研究是其中之一。他死后由其门生整理出版的《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绘画中所反映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1966）即是代表作。该书收入论中国民间年画、民间戏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宗教、迷信等方面的论文，是一部中国民间文化的论文集，并附105幅民间年画。其中，有彩色画八幅。它也是俄苏汉学家唯一的年画研究专著。阿列克谢耶夫的研究工作有几个特点：

（1）进行大量、持久的搜集。阿氏在大学时代看到科马罗夫带去的一幅骑鹿的寿星年画，被激发起兴趣，但没有来得及弄懂画意。毕业后，应聘到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鉴别馆藏中、日古钱币，了解到青铜护身符中各种图形文字都各有含义的情况，加强了探究中国民俗和民间信仰的兴趣。此后，到英、法进修期间逐步扩大这个领域的探索。1906年到中国进修时，便开始大量搜集材料。据他《在旧中国1907年游记》记载，他所注意并搜录的民俗材料范围极广，有奶妈的摇篮曲、盲艺人的说唱、民间的传说，寺庙和各地名胜的碑铭、匾额、告示、孔庙里的颂词、祭文，宫殿瓦当上的吉祥纹样，民间宗教迷信活动中的咒语，有

各种印刻字画的信笺等，甚至对表现各种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和日常生活的汉画像石，都做了拓片。

更为有趣的是，他那系统的搜集年画的活动。1907年他陪同法国汉学家沙畹（夏瓦纳，1865～1918）在华北考察文化古迹，五个月内走了五个省。阿列克谢耶夫到过清代三个主要的年画产地：天津的杨柳青、山东的潍县、苏州的桃花坞，购到一大批年画。还到过河南的朱仙镇，买到以钟馗为题材的年画。其后，又到豫西买到灵宝年画。1912年阿列克谢耶夫再次来华，到南方搜集年画及调查民间宗教信仰。在上海、厦门、汕头、广州、佛山等地，都搜集到一些年画。南方之行不如前次在北方搜集得多，但两次搜集到的年画总共也有4 000～5 000幅。

（2）搜集与研究并重。他从到北京着手搜集年画开始，就注意弄清其含义。对于年画富于象征手法感到新奇：一个活泼的男孩一只脚赤裸，一只脚穿草鞋，意味着祈望风调雨顺；一只大公鸡在牡丹花下啼叫，意味着荣华富贵。这一切都强烈地吸引着他及早开始研究。他煞费苦心取得中国老师的帮助，并以帮老师翻译德文稿件为代价，让老师把每张年画的情节和象征意义写成文字说明。后者虽然给以指导和帮助，但对于解说这类年画仍抱不屑为之又不得不做的态度。于是，在阿氏年画解说本的封面上，以“粗画解说”为标题，一共为四百张年画写了文字说明。阿氏在北京的学习和研究大有进展，以至他外出考察时，已经能以算是懂行人的身份去采购年画了。据他到杨柳青的

日记所写："我们走进一家画店，店主脸上露出极为疑惑的神色，两个会讲中国话的洋人（指他和沙畹），不仅知道有年画这种东西，而且能用行话一一解说其内容，真是怪事。"阿氏接着便写到他进一步研究的想法："我买了一大批年画，见到如此丰富的材料，我的胃口越来越大。我想用这些材料写学位论文。这个题目越来越吸引我。何况，从来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年画呢！民间艺术的精华与'高雅'艺术相通……民间艺术往往是几近完善的，年画即是一个例子"①。

除了年画的内容、含义，阿氏还研究年画的制作者。正如他后来在游记中所分析的，这些绘制者半是书生，半是艺人（民间画家），他们学过儒家经书，但其文化修养又不太高，所以在画上题写的文字便似通非通，"有时在一张画上既有文言，又有民谣俚语，而画中的许多形象都含有大量的典故"②。

阿列克谢耶夫甚至计划出版其搜集和研究年画的成果。1909年回国时，他曾与科马罗夫讨论，表示要编选出版一部大型的中国年画集，并向帝俄科学院提出申请，因科学院拒绝拨款而未果。这使得他不但未能出版画册，而且放弃了以年画等民间文化为题写学位论文的打算，改为写论

---

① 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在旧中国——1907年游记》，莫斯科，1958年，第36页。

② 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在旧中国——1907年游记》，莫斯科，1958年，第36页。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文章。不过他后来还是写出不少论年画的文章，如1910年的长篇论文《从年画和护身符看中国符咒形象的若干主要类型》，1918年的论刘海与和合二仙的长篇文章。20世纪30年代又写过一系列文章论述年画所反映的中国传统道德、民间信仰和戏剧作品等。

（3）开展年画的宣传介绍工作。阿列克谢耶夫不但以研究中国年画在俄国汉学家中独树一帜，而且做了大量的宣传介绍工作。1910年他在皇家地理学会展览中国年画一个月，每天到场向观众讲解年画的内容和艺术特点。1911年又在明斯克作讲演介绍中国的民间文化。此后，多次在国内外举行讲座。1926年应邀在伦敦的东方语言学校讲学，作过有关中国民间信仰和戏剧的系列讲座，并展示他所收藏的年画照片。他所写的在中国广为流传的财神崇拜的讲稿，后于1928年在伦敦出版过小册子（该书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新加坡再版）。

阿列克谢耶夫所做的年画介绍工作，不但在俄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具有开拓的意义。

三　收藏年画在俄国蔚为风气

由于汉学家、民俗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和宣传介绍，在俄国知识界以及一部分其他人士当中，收藏和鉴赏中国年画几乎成了风气。例如，1911年俄国军官诺文斯基在东北搜集到

一部分年画，现存彼得堡民俗博物馆，1912年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院学生尼·维诺格拉多夫在哈尔滨搜集到140幅年画，回国后于1913年冬天在该校展出一周，引起热烈反映，报刊还加以报导。又如，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者格·波塔宁，1893年到过西藏、甘肃、四川一带，除了采录民间故事和传说，也搜集年画。其中，有20幅反映爱国主义内容的（描绘英雄刘永福反击法国侵略军等），现存伊尔库茨克州艺术博物馆。彼·科兹洛夫在清光绪末年从甘肃带走黑水城的大批文物，其中就有木刻版画精品《四美图》，图上面刻有"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等字，现存冬宫博物馆。

从事搜集的人多，藏品自然分布很广。不但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大城市，而且在其他许多城市，如敖德萨、萨拉托夫、维尔纽斯、斯摩棱斯克等地的博物馆都藏有中国年画。此外，私人收藏的也不少。近年来，新的藏品还时有发现，或者进行买卖，直至最近，在莫斯科等城市里的旧书店或旧文物店里偶尔还能碰上清末制作的中国年画。[①]

俄苏收藏的年画，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品种多样。单从题材看，有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如反映中日甲午战争的《台湾军船图》、《炮打日本国》、《炮打日本》、《倭酋唾手得台北，刘义愤怒缚桦山》、《台湾平服生番图》；反映中法战争的《刘提督镇守北宁图》、《刘提督生擒李威利》、《北宁水战大捷》，《基隆捷报》、《五路大军

① 李福清《1990年中国民间年画的新发现》，《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4期。

恢复北宁》、《彭大哥、马督帅防边》、《长门大捷》、《福州大捷》、《基隆大捷》、《北宁大捷》、《法国攻北宁，刘帅获全胜图》、《克服北宁河内水战刘军得胜新图》；反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捉拿倭俄奸审问正法》、《炮打西什库》。后者反映的是法国北堂主教樊国梁以西什库教堂为据点，武装射击义和团，而中国方面则有董福祥统领步兵反击，由“红灯照”义和团助战。据年画专家王树村考察，此类年画在伊尔库茨克的博物馆收藏较多，彼得堡等各地博物馆也有收藏。而在我国“国内虽然屡有发现，但为数不多”，“可惜人们只知名人书画之时价，忽略了民间年画深远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①] 藏品最多的是民间文学和民俗的年画。民俗如各种神像，包括门神、财神、灶神等。各种风俗，如过年、结婚、喜庆、祝寿、民间游戏（《年年有鱼》、《福寿和合》以及打牌、造风筝等），大都带有祝福祈年或祝愿生活美满富足的意义。也有美人画、年历画、山水花鸟画。风俗年画丰富多彩，其中有不少风俗年画的题词带有民间文学韵味，如《庄稼老做知县，官话不通》、《小儿怒》、《时兴京秧歌》、《马郎当十弃行》、《俏皮话》、《十美图画八仙》、《十二时辰图》、《代唱王国叹十声》、《十二月斗花鼓》、《老鼠自叹》、《十不足》等。据王树村考察分析，“这类年画不光是画面喜庆热闹，点缀年华而已，它还反映了清

---

① 王树村《游苏所见中国民间艺术藏品》，《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1期。

代民间风俗习惯和时事政治”。[①] 属于民间文学题材的还有戏曲年画，主要根据京剧画，也有根据其他地方戏的。如据京剧画的《二进宫》、《三国演义》等。这些以戏曲内容为题材的年画，往往是表彰忠良，暴露邪恶，艺术上则以线条简练、色彩鲜艳为特色，也有以拙朴见称的。不管哪一种，由于民俗和民间文学年画富有民族艺术色彩，外国人非常喜欢收藏，而我国的艺术博物馆过去反而不大注意搜集。这样一来，俄苏所藏这类年画就更显得有重要意义了。

当然，以小说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年画，俄苏收藏者也很注意。目前，所藏年画中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唐》、《说岳全传》、《封神演义》、《二度梅》、《红楼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三侠五义》、《小三侠五义》等。

年画题材范围之广，已经包括反映现代社会生活变化或新事的。如《天主堂外国人做亲》、《洋人打围》、《洋人爱马》、《上海图》、《天津火车站》、《天津马路骑车》。显然，这类年画也具有近代史的史料价值。

四　中国民间年画的宣传者

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门生、现任俄国（苏联）科学院

① 王树村《游苏所见中国民间艺术藏品》，《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1期。

通讯院士的李福清（1932～　）对年画的兴趣是从老师处得到启发的。李福清本来是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曾在俄苏国内各地做过中文古籍藏书的普查，也接触到大量民间图画藏品。1966年应邀与阿氏之女班科夫斯卡娅、汉学家鲁德娃一起编辑出版阿氏遗著论文集《中国民间年画》，并撰写序言与注解，从此，他开始了巨大规模的年画调研工作。他的足迹遍及俄苏境内的主要城市，而且到过德国、奥地利、美国、越南以及东欧一些国家。初步了解到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年画，提供了迄今最为系统的国外收藏中国年画的概貌，同时也弄清了俄苏搜集和收藏年画的历史情况。

李福清不但进行调查，而且亲自搜集俄苏境内的旧年画。1987年以来，已搜购到晚清年画四十幅，其中多数是中国已罕见的青地年画，如《长坂坡》、《罗成与徐丽娘比武》（《说唐》的故事）等。还有一些是杨柳青印制的年画，如表现有关王羲之传说的《写经换鹅》，描绘《红楼梦》、《三国》以及岳飞的故事等。据他了解，比较罕见的年画在格鲁吉亚一位名画家格·坎达列里（其妻是中国人）那里也有收藏，其品种主要是四川、陕西和河南的年画。

李福清的主要贡献在于广泛地宣传介绍年画，使其影响大大地扩展开来。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参加编辑阿氏的年画论著，为之写序和注解共两万多字。之后，又编了很有价值的中国民间年画研究目录，并不断在报刊（包括俄中两国）和电视广播中介绍中国年画。后来，又倡

议与中国学者合作编选出版俄苏收藏的中国年画集，并为之写了长篇序言。这不但在俄苏，而且在中国都很有影响。他还通过讲学在俄苏以外宣传年画，如在德国、香港、台湾甚至中国内地的某些学校里讲学时，都涉及年画。

当然，李福清的介绍工作是以深刻的研究为基础的。其研究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民间版画作全面考察，以此为背景对俄苏的藏品进行分类：苏联收藏的中国年画明显地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纸马”，其二即“年画”，并细述二者的区别：“纸马是各种黑白木刻神像，一般不填色，但有时也在脸上或衣服上加一笔彩色，借以表示图画是上了颜色的。这种神像通常都是用最便宜的黄纸印制，供祭祀各种神灵时焚烧。年画情况不同，它刻工精细，用色鲜艳，有装饰性。年画大多是小幅或大幅的单张版画。”[①] 此外，李福清也注意到俄苏收藏的中国年画里还有其他的类型。

李福清分析的准确性也可从王树村的考察报告中得到印证。王文指出，纸马艺术到了清末已衰落。后来，“纸马已变成国外民俗博物馆的艺术陈列品，在我国则视纸马为神鬼所附之‘神祇’，收藏者不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幸存的纸马和古版尽都毁掉，而在苏联宗教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和列宁格勒市图书馆仍有中国北京、

---

① 此处及本节所引李福清言论均见其为《苏联所藏中国年画珍品集》所作的序。

上海、天津、广东佛山、山东泰安等地的纸马上千幅”。文中收列了俄苏所藏纸马名目一百多种，认为“其可贵在于留下了当时社会尚在流通的纸马之神名”，王并进一步肯定这类纸马藏品的意义：“它不仅对我国版画史和民俗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研究，也具有形象资料价值”，① 可见李福清谈到藏品时也注意到纸马，绝不是偶然的。

（2）对中国年画这种类型尤其细致地作了分析研究，从其样式、作者，包括画工、刻工、印工，产地、题材、绘画技术，包括构图、题词、勾勒脸形及描绘服饰等均一一涉及。他为《珍品集》所写的这篇序言是俄苏迄今最为详尽的中国年画介绍，它为俄文读者提供了完整系统又深刻的中国年画知识，并帮助他们能够鉴赏年画。以他对描绘历史故事和戏曲场面的年画分析为例，也可看出其分析的细致入微：“民间画家描绘这些场面，完全不像当代现实主义画家那样力求通过相应的细节来再现时代。民间年画同民间故事、传说及戏曲一样具有假定性。画家在孔夫子像的后景上画上一座代表中国风景特点的高塔，而完全不考虑中国直到公元初期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才有塔”。同理，“描写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的人物，在年画中穿的都是明、清特点的古式剧装，很多历史人物穿着明朝的官袍，但下摆却绣有‘立水’”。他说戏曲年画《二进宫》最

---

① 王树村《游苏所见中国民间艺术藏品》，《民间文学论坛》1990 年第 1 期。

为明显，它“描绘16世纪，即明朝的故事，但官吏们穿的明朝官袍上却有清朝的‘立水’，而女主人公——皇妃穿的平襟侧折裙则19世纪才有的女服”。自然，这里的例子所显示的，不但是李福清研究工作的深入，而且是他的中国民俗知识的丰富。

（3）把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到中俄两种民间版画的对比上，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达到鲜明准确的概括两种版画各具的特点。如把中国年画描绘的“钱龙”（龙身由中国古钱串成）和俄国民间版画描绘的钱魔（浑身是鳞，有角，有翅，有长尾，与龙略似）作对比：“按照中国年画所反映的民间观念，钱龙的出现预示着发财和富裕，而在俄国民间版画中，钱魔从天上洒钱是引诱人们堕落和作恶。”于是，得出结论：“一个大致相同的题材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得到截然对立的处理。”又如，“在中国画中女子乘风必定是降福的仙女，而在……俄国民间版画上这却是一个明显的嘲讽：妻子乘母鸡，要学乘公鸡疾驰的色迷丈夫。”自然，李福清通过对比也找出许多共同点。如说：“中俄两国都有海报画和年历画。俄国民间年历画描绘黄道十二盒，中国民间年画描绘十二生肖，一样是十二年循环。”

李福清在作了全面的对比之后得出结论：“从中俄民间版画比较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的民间艺术……在类型学上都有不少出自人类生活共同规律的相似之处，尽管在相似题材的处理上会有种种民族差异。”

我国民间盛行在春节贴门神和年画这种风俗，已经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年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已经远播海外，受到国外人士的重视，加以收藏并对之下工夫研究，不同国家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各有其长处，应该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加以吸收，以促进我国的年画乃至民间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五　中国艺术品和中国画论

中国画以及品类众多的中国艺术品传入俄罗斯后，主要的收藏处所是圣彼得堡（列宁格勒）。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曾由有关的收藏馆所编录品目向公众介绍。如卢博—列斯尼琴科编《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收藏的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中国古代的丝织品和丝绣·目录》（列宁格勒，1961，67 页）、阿拉波娃编《14 世纪末至 18 世纪前 30 年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列宁格勒，1977，135 页）、《16 至 19 世纪中国和日本瓷器·附彩色照片》（列宁格勒，1976，16 页）、格鲁哈列娃编《苏联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艺术品》（莫斯科，1959，16 页）等，鲁缅采娃编《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收藏物简介》（莫斯科，1982，232 页）也介绍了其所藏的中国艺术品。

有一批汉学家长期从事中国艺术品的研究，并陆续写出了专著。计有格鲁哈列娃著《中国的造型艺术》（莫斯科，1956）、《徐悲鸿》（莫斯科，1957）和《人民中国的艺

术·绘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莫斯科，1958），别洛泽罗娃著《中国的传统家具》（莫斯科，1956），穆里安著《旧中国木刻画中日常生活体裁的发展途径》（莫斯科，1956）、《现代中国的木刻》（莫斯科，1958）和《中国的民间木刻》（莫斯科，1960），尼古拉耶娃著《齐白石》（莫斯科，1960）和《画家、诗人、哲学家马远及其时代》（莫斯科，1968），切尔沃娃著《现代中国版画（1931～1958）》（莫斯科，1960），维诺格拉多娃著《中国的山水画》（莫斯科，1972），思乔夫著《中国的服装》（莫斯科，1975），波斯特列洛娃著《10至13世纪的中国画院》（莫斯科，1976）等。从这批汉学家的著作看，汉学家们研究的范围广泛涉及中国的绘画、版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甚至家具和服饰，同时兼及画家、画院和艺术家。

此外，还有翻译中国的画论著作，如拉祖莫夫斯译《中国肖像画论》（莫斯科，1971）、萨莫秀克译《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莫斯科，1978）和扎瓦茨卡娅译《石涛著〈苦瓜和尚画语录〉》（莫斯科，1978）等。

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叶甫盖尼娅·弗拉基米诺夫娜·查瓦茨卡娅博士（1930～　），她195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20世纪60年代曾来北京大学进修。她的中国绘画美学造诣很深，已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东方文化在当代西方》、《米芾》、《齐白石》等论著八部，译有《芥子园画谱》等书，其代表作是专著《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莫斯科，1975）。

查瓦茨卡娅的这部专著共分四编。

在第一编中，她首先提出中国古代绘画美学史的分期应划为四个阶段。①远古时期——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3世纪；绘画美学观点尚未成熟，但已形成若干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概念；②4～8世纪：绘画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审美标准的形成；③9～14世纪：古典绘画理论的高度繁荣；④15～19世纪：美学标准规范化。接着分成六章依次阐述中国古代、唐、五代、宋、元、明、清的绘画美学，勾勒出历史的概貌。第二编则详细介绍中国的各种绘画画派和理论，共设有七章。第三编是简短的结论，主要作中国画与欧洲艺术的分类比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中国画的特点。

查瓦茨卡娅非常鲜明地指出东西方鉴赏绘画习惯的巨大差异，她说："那些缺乏鉴赏力的观众按照欧洲的传统来直接欣赏中国绘画，常常把它实际上并不具备的特点当做它的特点。比如，一个最常见的题材：一枝盛开的梅花，欧洲观众往往把它理解成一幅轻松的抒情性画图，觉得它充满印象派的新鲜感与真切感；而在中国的欣赏体系中，这个题材却是一种对于天体演化论与形而上学等复杂问题的象征性和艺术理解，其中极少超功利的快感。"①

她还提到在欣赏中国古典山水画时，也出现同样的情

① 查瓦茨卡娅著、陈训明译《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3页。

况，即“欧洲人当成一种世俗的抒情性艺术来接受；而实际上，直到不久之前，中国的山水画仍旧比欧洲新时期的风景画更接近于宗教画。山水画之所以曾经被当做宗教画，一则因为它反映的是神灵，再则因为它必须履行净化思想和领悟妙谛的职能。”①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作者在第四编中选编了中国哲学家和美术理论家的若干最为重要的文章，其中含有丰富的绘画美学资料，既有古代诸子百家的哲学文章，又有随后各朝代名家的画评和画论，有的是全文照译，有的是摘译片段。这一部分往往很受俄文读者和研究家的注意，它兼有几种作用：既在俄文读者中宣传介绍中国的绘画美学理论，又可帮助他们理解和从新的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角度来接受和欣赏中国绘画，还可以沟通中西不同的绘画美学观念。

查瓦茨卡娅的专著《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确是一部有代表性的力作，往往为苏联国内和国外的学者所征引。

---

① 查瓦茨卡娅著、陈训明译《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3页。

第十章

俄国旧都遍布中国景物

圣彼得堡自1703年彼得大帝开始建城以后，至1917年二百余年间曾设为俄国的首都。十月革命后1918年苏俄政府决定迁都回莫斯科。由此，人们习惯上曾把二者并称为“两个首都”，而彼得堡则为旧都之一。

一　彼得堡游的中国风情线

彼得堡博采欧洲古今的建筑艺术，建筑物样式多样；城市街道、公园、广场，包括栏栅设置、雕塑造像的安排，无不工于心计；横跨市内涅瓦河大河和支流，以及海峡上的桥梁有几百座，有长短、宽窄、弓直之分，造型各异，千姿百态。人们称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人们更常称它是一座博物城。那无数的宫殿、城堡，那艺术的、民俗的、宗教的、历史的，以及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博物馆，还有那富丽堂皇、形态各异的教堂，随处都有。几乎是五步一馆，十步一堂。包括街道上和公园里那么多塑像，使人觉得这一城市本身就是一座雕塑博物馆。

俄国改革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该市推出了“列宁格

勒九日游"[1] 项目，除可饱览市内、近郊的风光，还设计了一道"中国风情"线，让游人见识一下遍布于各处的中国景致与文物。其中重要的有四类：

(一) 市中心街景

彼得大帝的小屋。"中国物质文化的物品有机地织入彼得堡—列宁格勒的整体风格"。例如，在著名的列宁格勒狮子和狮身人面像之间，有两件中国纪念性雕塑。在彼得大帝小屋门口的滨河街上，于1901～1903年之间，按建筑师诺维科夫和工程师兹布罗热克的设计方案，建起一座通向涅瓦河的花岗石下坡台阶。1907年，在台阶的两旁的花岗石台基上树立了两座中国神话动物"狮子"的石雕。至于这对石狮的中国文化内涵，将在下一节细说。

(二) 博物馆系列

(1) 涅瓦大街的喀山大教堂。这里设有宗教和无神论史博物馆。在"东方宗教"部可以看到十分有意思的佛教和道教陈列品。最有趣的要算是罕见的中国民间年画，藏品总共1 000幅，是著名的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于1906～1907年间从中国搜集来的。

(2) 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该馆是以彼得大帝珍品陈列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彼得大帝亲自把"大量

---

① 参阅塔吉亚娜·阿勃久哈诺娃：《列宁格勒九日游》，新闻出版社1990年。

中国珍品”交到这里。据彼得大帝本人的要求，1715年科学家郎格受派前往北京采购日常用品和实用艺术品。1753～1756年，受科学院的委托，另一名科学家叶拉金前往中国，19～20世纪有许多俄国学者：施伦克、韦列夏金、拉德任斯基前往中国研究文化和风俗，都采回许多珍品。

二楼3号厅陈列着“中国各民族”展品。这部分陈列品是从200多年珍藏的中国古代文化产品中编选的。既有劳动工具和草编、芦苇编织品，还有瓷器，著名的江苏省宜兴陶器。再有是青铜器皿，珐琅制品、漆器、木雕和玉雕。服装展览柜中引人注意的是古代官服和绣花女袍。陈列柜里展出的刺绣制品确实有如“神艺”，又如有住房模型和庙堂模型、佛教雕塑、皮影戏、华丽的京剧服装等。

（3）罗西街1号大楼，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旧址。彼得堡的学者们，不仅对中国的物质文明，而且对中国的精神文明，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各条旅游线路都包括建筑家罗西街。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在这条美丽的街道上1号大楼里，从1862年起设有俄国地理学会。许多有名的汉学家都同它有关。

著名的有瓦西里耶夫（1818～1900年），佛学专家，他在北京学习十年汉语、藏语、满语；他所收集的中国手稿为彼得堡大学增色不少。他的论述和研究成果闻名世界。俄国地理学会出版的另一位彼得堡汉学家伊万·米纳耶夫（1840～1890年）的著作《佛学研究与资料》具有重大价

值，已译成了多国欧洲文字。

博物馆系列中的冬宫和缅希科夫宫尤为著名。将在后面另辟专节介绍。

（三）花园洋房系列

（1）冬宫滨河街18号。早在彼得堡奠基时，彼得大帝的战友之一鲍利斯·舍列梅捷夫在这里建起这座花园洋房。从那时起，著名的舍列梅捷夫伯爵家族的喷泉楼，经历了多次改建和装修。这座楼记载着伊丽莎白女皇时代，当时花园直通铸造街，园里池边点缀着一座中国亭子；彼得·舍列梅捷夫常在中国风格的房间内举行“假面舞会”和“招待会”，招待彼得大帝的女儿。至今喷泉楼还保存着十分有趣的中国瓷器藏品。

（2）芳丹卡街21号院里的花园洋房，原属于俄国古老的名门望族舒瓦洛夫家。这里可以看见中国日常文化的因素多么有机地融入彼得堡的日常生活。蓝客厅里，窗台上和桌上，18世纪的中国花瓶五彩缤纷，鲜艳夺目。中国餐具点缀着小餐厅。白客厅里家具蒙着“中国风格”的绒绣和丝绣。木雕描金底盘上有两只椭圆形瓷花瓶争妍斗艳。还有一套精美的各种岩石雕刻：玉石、黄晶、水晶、紫晶。这说明舒瓦洛夫家族对中国实用艺术的浓厚兴趣。圆客厅里放着描金雕椅，上面蒙着中国丝绸，十分显眼。在藏书室里可以看到现代制作的中国家具；书房和卧室点缀着远东实用艺术品。花园洋房最后一位主人叶·舒瓦洛娃伯爵

夫人继承了祖先对中国的兴趣。1905 年日俄战争期间，她在沈阳市开办了一家伤兵医院，在远东购买了许多有趣的中国家具、纺织品、实用艺术品。

若论中国文化的因素牢固地融入彼得堡人的日常生活，那么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 18 世纪时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她对中国的兴趣超过父亲，以至于流行这样的一个术语："伊丽莎白中国趣味"：一辆辆大车装满从中国采购的屏风、漆胎桌子、餐具、大红灯笼，穿过遥远的西伯利亚城市恰克图和库尔库茨克，连绵不断驶向彼得堡。在她当年的财产目录上，就处处记有非常时髦的中国物品："中国描金腿漆器衣橱"、中国丝绸、"各种漆器小盒"、"中国漆器桌子"、瓷器。

另外的例子，如 1735 年，在彼得堡科学院属下开辟了俄国第一座国立植物园。以中国植物为主要种植品。此外又如俄国的工匠也学习"中国手艺"，以制作"中国风格"物品。那些优秀的农奴漆匠和刻工的姓名，有费多奥尔·弗拉索夫、费奥多尔·达尼洛夫、亚吉姆·格拉西莫夫。至今还可以在国立俄罗斯博物馆的展品里看到精美的瓷器群像《中国人》，结构匀称、彩绘精细。均系俄国艺术工匠于 1760 年在俄国第一家彼得堡瓷器厂制作出来的。20 世纪初，彼得堡皇家玻璃厂为外国贵宾和皇族成员制作的礼品。目录上，还常有"中国画小花瓶"。

（四）皇家园林系列

彼得堡市郊的彼得宫和皇村，是两处最大的皇家园林。其中均有不少中国的景物闻名遐迩，将另辟专节介绍。

二　彼得大帝小屋前的中国石狮

在老城区彼得格勒，靠近涅瓦河畔，有一座彼得大帝的小屋，木质构造的平房。是当年彼得大帝为亲自监督建城工作而搭建起来临时居住的。这个地方历来是人们瞻仰的圣地。

在小屋前通向涅瓦河的斜坡上，面对河岸高高地矗立着一对中国石狮。两只狮子相隔约 20 米远。中间有十几级宽阔的石阶，由河岸缓缓下降到河边。如若沿石阶拾级而上，便可到达树荫低下的小屋。这对石狮仿佛是在为彼得大帝的小屋守门。

用花岗岩石造成那座通向涅瓦河的下坡台阶，使得小屋与外界相连，显得通达，表现了彼得大帝的开拓精神。后来增设了这对石狮，使整个景致活了起来。然而为什么要安放石狮呢？这正好吸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皇宫及官宦府邸，或者寝陵的门口设置这种石雕，寓意在护卫和镇守，有保护神之意。

这对中国典型的蹲式大石狮，狮身连台座高度约三米许，一色的火成岩石雕成，略呈铁红色。为安置石狮而用

花岗石建造的大台基，也有约三米高。两者相加相当高大，看起来很雄伟。

石狮原有的台座两侧分成两段刻有如下一行斗大的汉字，连起来是“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穀旦”。台座后侧一面刻了两个大字“吉林”。这表示这对石狮立碑的年代和地点。光绪三十二年为 1907 年。台座下端的花岗石大台基上又用俄文大写字体刻了三行字，译成汉语为“狮子　于 1907 年自满洲的吉林移运至圣彼得堡”。靠下一点另用两行俄文小字刻曰“步兵上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格罗杰科夫之贡品”。1905 年至 1907 年的日俄战争，是沙俄军队在中国东北的领土上同日本兵打仗，这对石狮应是在当年从吉林移来的。

那对中国石狮同涅瓦河另一侧岸上海军部大楼前的一对俄罗斯石狮，以及美术院大楼前面的一对古埃及人面狮身石雕相映成趣。三对石狮来源和国别不同，形态姿势各异。一个是蹲式，另一个为行走式，第三个则呈俯卧式。三者一起展示在街道河畔，说明了俄罗斯人的博物馆意识相当强烈，搜求种类求多而全，同时也反映中国的物质文化产品已与彼得堡的整个文化环境融为一体了。

三　缅希科夫宫里的中国饰品

在彼得堡的瓦西里岛，大学滨河街上，有一座缅希科夫宫。它以精美、贵重、多姿多彩的装饰著称，本身就是

一座博物馆，是故现已改名称为国立冬宫博物馆分馆。

缅希科夫是彼得大帝的重臣和战友。他的家庭有无数的中国饰物和实用艺术品，有的是他专为其妻达丽娅购买的。宫内饰品繁多，举其大者如：

首先，一进入展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丝织壁毯——“刻丝”。壁毯画着象征性图画。上方是赠者的象征和太阳，代表至高无上的神；灵芝表示万寿无疆；一条条的云彩代表龙；两只凤凰是夫妇和美的象征。做着各种家常活动的小男孩们象征早生贵子。这里表明，好像王宫的主人理解“刻丝”壁毯的象征意义：用它来装饰女人的居室不是偶然的。18 世纪初，那“刻丝”是作为中国皇帝回赠的礼品来到俄国的。“刻丝”为非卖品，是中国宫廷用以国事交往中作赠品或赏品，而缅希科夫宫里就藏有几幅这样的壁毯，都是高超的技艺和细心在小型织机上用极细的丝绒织成的。它一年只能织出不到 10 平方公分的“刻丝”。其壁毯价贵比黄金。

其二是中国瓷器，系很有讲究的品种。为“绿色系”和“粉红色系”两种，极为巧妙。

缅希科夫夫人居室的前厅，西墙装饰的中国瓷器属于“绿色系”。当年，以绿色为主的各种色调的制品特别流行，这种风俗是 17 世纪末、18 世纪头 25 年里从欧洲辗转传入俄国的。比如，盘子上画花鸟树木和喜庆象征物。在她前厅的西墙上盘子构图里就可以看见象征富贵的牡丹花；象征长寿的蝴蝶和山崖。各种象征的选配恰当而巧妙。另有一只盘子描绘日常生活场景：乐师、手执羽扇的宫女、皇

帝和两名大臣坐在亭子的露台上。这可能使女主人联想起彼得大帝在宠臣的王宫内举行的各种招待会。盘子上的画面风格潇洒、结构精致，色彩恰到好处。令人感到17世纪末18世纪头25年间中国瓷器大师的彩绘是多么精美动人。

在东墙上，一幅漂亮的铜壁挂，画的树上有一只鸟。这是罕见的中国珐琅画制品，用的就是所谓“粉红色系”，各种柔和色调的粉红色颜料，是金盐与锡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瓷器上以铜为基调的“粉红色系”彩绘，在18世纪20年代出现于中国，18世纪第二个25年彩绘趋向繁荣。于此再一次见到象征富贵的牡丹花和象征长寿的山崖上盛开的桃花。

此外，18世纪俄国开始流行茶叶和咖啡。东墙脚就有一张漆器小桌，桌上一套茶具。近旁放有胡桃木小橱——“玻璃橱”里，也装满了中国瓷器。有资料表明，缅希科夫夫妇是亲自选择这些瓷器的。

其三是中国日常用品。缅希科夫宫的餐具也是够精致的，有一架装满中国瓷器的橱柜。一只大盘，其透明的彩釉闪烁，光彩夺目，另一只彩盘竟画了两名欧洲人。

再看那瓷质鼻烟壶和装鼻烟的小瓶子。俄国贵族流行嗅鼻烟风俗，连年轻的女子也嗅鼻烟。普希金有一首《致嗅鼻烟的美女》的诗。中国瓷质鼻烟壶和鼻烟瓶绘着的彩画，却闻名世界。还有那只抬起脚的绿狮子也是瓷质的，是用来当镇纸的。所有这些日常用品画面尽皆色彩和谐，精美绝伦。

其四为中国贴墙布。

缅希科夫宫一种罕见的艺术品，为中国的贴墙布。据

载，1719 年伊兹梅洛夫船长受派前往中国考察建立贸易关系的可能性，1722 年回国，带来了大量礼物和采购的物品。其中包括漆器木椅、桌子、水烟袋，以及大量各种贵重的中国布匹……还运来了许多瓷餐具，大量中国茶叶和烟叶，尤其是在中国订购了贴墙布。中国皇帝听说是为俄国沙皇订购的，立即下令最优秀的工匠制作，免费赠送。贴墙布先是装饰彼得大帝的夏宫。后来，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又将贴墙布移到叶卡捷琳戈甫宫，最后才辗转流入缅希科夫宫博物馆作为展品。

贴墙布是薄绸彩绘。绘画线条明快，色彩鲜艳，光彩夺目。近三百年的变迁，几经周折，几次蒙在架子上，然后又多次揭下来。存在潮湿的房屋里，或贴到麻袋布上，或者硬纸板上，都会破坏织物。使得丝绸干燥开裂和断裂，彩画也受了损坏。为了修复和保存，冬宫博物馆专门请化学分析师来分析其色彩和胶的成分。发现丝绸系用类似淀粉的物质浸泡过，这种物质将丝纱粘在一起，尔后在滚烫的辊子之间压过。经过这样的加工处理，中国丝绸才具备了这样美妙的柔和的光泽。他们经过研究，决定在修复时只使用中国 17 ~ 18 世纪曾用过的材料。颜料是按中国古方用孔雀石、天蓝石以及其他材料配制的。胶用肥皂黑果实熬制。这样，终于使奇妙的贴墙布复活了。

因为这种贴墙布非常漂亮，五彩缤纷，画面又故事性强，引人入胜。遗憾的是，时间的侵蚀是无情的。因此，缅希科夫宫陈列品中的贴墙布就特别珍贵，属于稀世珍品。

这些贴墙布绘着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的故事情节，即公元前12世纪殷朝与周朝之间的斗争。书中有许多神话人物、佛教与道教神仙，又常出现妖魔鬼怪。小说的主要人物后来都获得神仙封号，进入了中国中世纪晚期的宗教。彩绘以第40回为基线，叙述四大金刚同敌手的斗争：一名武士握剑，第二名倒执一把伞；第三名手执乐器“琵琶”，皆为传统表现的形象，他们手中这些吉祥物都具有战胜敌人的神奇本领。又如一位坐在神话动物“麒麟”上的武士，口中喷出烈火。一只白狮子在武士们头上云中飞翔。

总之，中国贴墙布是按国画的传统方法绘制的。一般在贴墙布上可以看到祈福的象征：有桃花和象征幸福的蝙蝠；还有代表各种美好事物的“八宝”等等。鲜艳明快的绘画光彩夺目。

四 彼得宫内的中国花园和中国室

在彼得堡西面远郊，离城30公里处，有一占地1 000公顷的沙皇离宫，名为彼得宫，建于18世纪初叶。背倚丘陵，面对芬兰湾。华丽的宫殿，幽雅的花园，依山势建成的阶梯喷泉，取材于希腊神话的无数雕像，既壮丽又雅观。

离宫园内有一座“中国花园”，建于1766年。花园大体按园林风格建造，在有限的空间内集中了一切花园景致：假山怪石、曲径通幽、小桥流水、花圃树丛、大理石雕塑

等。但是雕塑已是略为欧洲风格化了的景物：园中有两尊男女塑像；有“贝壳形”和“花瓶形”的两座喷泉；喷泉在小丘上涌出，落下一股股清水，令人感到清幽爽快。

“中国室”设于彼得宫内中心宫殿里，有东西两间“中国室”，均建于1766～1769年。18世纪时，恰好欧洲国家的皇宫流行装饰中国风格的房间。在东室，墙上挂有中国画屏，黑色漆底上有烫金烫银的画幅，山水人物画齐备。室内陈设中国的瓷瓶器具、木雕桌椅以及各式各样的小摆设。地板则是用名贵木料拼花铺成的。在西室，同样是拼花木地板，用的是檀香木、乌木、柠檬树木等名贵木料。天花板上也是彩绘和安装中国吊灯。室内尽是中国式的小摆设。最引人注目的是南墙上一幅大型漆底木雕画《满洲旗人村营》，画有楼宇、旗帜和上操的士兵，还有骑马的军官，栩栩如生。此外，还有一件彩绘瓷砖面的大取暖火炉，很有中国气氛。

五　皇村里的中国亭和中国桥

在市郊，今为彼得堡卫星城的普希金市，是当年的皇村。

皇村始建于18世纪初，是一处巨大的宫殿建筑和公园。原为皇家休闲游猎的场所，18世纪中叶，成为伊丽莎白女皇的行宫。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后，1770年进行改建。

除了拥有一座占地很大东西长度达300米的三层楼宫殿（叶卡捷琳娜宫），还增辟了叶卡捷琳娜公园。同时，女皇还为她的孙子亚历山大另造了一座占地200公顷的公园，毗邻宫殿，后称为亚历山大公园。在这组园林中，有无数处中国景物，主要有三：

一是叶卡捷琳娜宫里的中国蓝色客厅。在蓝色油漆墙面镶上中国画幅、涂金木雕，厅内一应的中国器物摆设。此外，宫中还有一只中国清朝皇帝赠送的红漆花瓶。

二是叶卡捷琳娜公园里的“中国亭”。公园范围无疑是一座森林公园。花圃草地、森林湖泊、屋宇雕像，应有尽有。林中古木参天，浓荫蔽日；湖面清水涟漪，轻舟荡漾；园内则奇花异草，还有茅舍石雕，人工的造设和天然的风景相映成趣。临湖边恰好建了一座很大的“中国亭”。有两层，一层为圆形宫式，两厢各有一侧室，二层为四周有十二根立柱的凉亭，屋顶为凉亭式塔顶，竖着一面黄龙旗。

三是亚历山大公园内的“中国桥”。园内本来还有“中国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仅遗存断垣，但在公园深处，一条连通各湖泊的小河上依然存在着一座石砌拱形桥洞的中国式桥。桥面宽阔，可容几个人并行。这是由名建筑师查理·卡梅通于1785年建造的。

附带一提，奥兰宁包姆有“中国宫”。关于中国的景物，还有彼得堡西北远郊的奥兰宁包姆，今称罗蒙诺索夫城，那里也建有一座“中国宫”，为建筑师利纳尔基设计，于1762～1768年建造。

第十一章

当代中国热

一　埃尔米塔日展出中国艺术品

当代中国热的表现之一，是各地博物馆竞相收藏和展示中国艺术品。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每年要接待 3 500 万观众。这一点在宣传中国文化上的作用也值得重视。

“埃尔米塔日”来源于法语的音译，意为“隐宫”，最早指叶卡捷琳娜二世收藏艺术品供皇家及宫廷成员内部参观的小埃尔米塔日宫。后来，扩展为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包括五个建筑物：冬宫、小埃米塔日、旧埃尔米塔日、埃尔米塔日剧院和新埃尔米塔日，总称为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坐落在圣彼得堡宫殿的广场上，俗称冬宫博物馆。

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冬宫博物馆）是俄罗斯最大的艺术和历代文化的博物馆，无论从建筑风格、室内装饰，还是从艺术藏品的数量上都可以与法国的卢浮宫媲美。博物馆的藏品总数已逾 2 800 万件。它下设六个部：原始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西欧艺术、东方文化艺术、俄罗斯文化艺术和古钱币。其中，收藏中国文化艺术品的主要有两个部——东方文化艺术部和古钱币部。

东方文化艺术部的藏品数量在 16 万件左右，中国藏品占有重要地位。有专为中国藏品设立的中国文化艺术厅，内分 13 个陈列室。中国藏品除有科兹洛夫从黑城挖去的哈拉浩特文物和鄂登堡从中国西北运走的敦煌稀世珍品外，

还有大量中国艺术品：从元代至清末的各种瓷器，从明代至清末、民国初年的各种漆器、珐琅器皿、景泰蓝，20世纪初的彩色泥塑民间玩具、民间剪纸和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搜集的出自杨柳青等地的民间年面，各个年代的石刻、木雕艺术品，18世纪的宫廷用漆雕大幅屏风，红木家具以及各式各样的墨砚等文房四宝。

古钱部109万件以上的藏品中，除了各种奖章、勋章、纪念章、徽章外，古钱占大多数，约90万件以上，中国古钱币约30 000件。这里有春秋战国以来的大量铜钱，约六百枚，元宝（绝大部分是银元宝，金元宝仅两枚），19～20世纪的中国纸币约35 000张，铜制的护身符约2 000件等。中国古钱币在其他部和俄罗斯的其他博物馆中也有收藏。埃尔米塔日馆东方文化艺术品部的哈拉浩特文物中，就有极为珍贵的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元代纸币13张。

二　古钱币的整理与专著《中国纸币的产生》

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钱币虽然不少，却长期没有懂汉语的内行人负责整理。因而，馆长米哈依尔·伊拉里昂诺维奇·阿尔塔莫诺夫教授很注意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中物色管理员。恰好，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女学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伊沃奇金娜（1936～　）被选上。这位来自新西伯利亚市的学生从二年级起开始兼学

汉语，她选择的专业是中国考古，而馆长恰好又兼任她所在系的考古教研室主任。这样一来，尼娜于 1960 年大学毕业后立即转为研究生，同时在博物馆的古钱部开始整理中国古钱币。经过几年的努力，伊沃奇金娜既完成了整理工作，又写出论文《中国纸币的产生·唐宋代》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后来，该文扩充成书于 1990 年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专著《中国纸币的产生》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有四章。第一章，介绍中国古钱的史料来源和古钱史学。第二章，探讨中国唐代怎样为纸币的产生准备前提条件。第三章，详细描述宋代的纸币。第四章，介绍宋代之后女真人金国的纸币。此专著比较完整地阐明了中国纸币发生和初期发展的历史。这是俄国唯一专门论述中国纸币产生问题的著作。

作者掌握了详细的史料，在专著末尾并附有早期各种形式的纸币样例，这更增加了论著的说服力。她指出，在其他国家，纸币只是到了近代才有，先在欧洲、接着在美洲使用起来，普遍实行的时间是 18 世纪。当然，作为纸币的萌芽状态要稍早一些时候，在佛罗伦萨起于 14 世纪，在瑞士和英国起于 17 世纪。然而中国早在 9 世纪初即已试图用纸币代替金属的货币，到了 11 世纪就开始发行纸币了，以至于当 13 世纪意大利著名探险家马可·波罗到达中国时，对于使用纸币的事实极表惊叹，他说："在中国，世上一切宝贵的东西都可以用纸钱来买!"

该专著从政治、经济、技术和心理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四川省（当时北宋时代称为蜀国）出现世界上第一批纸币的情况。她认为，中国的交换手段起于铜币，当时曾经设想用值钱的银币。然而，北宋时期由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要求有大量更为轻便的、利于携带的货币流通。并且，早在5世纪，中国人就相当信任纸制的当票，8世纪又有了“飞钱”（纸制的），这便为纸币的产生和被人们认可准备了条件，而中国早已发达的造纸业和刻印业，也是使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纸币的国家提供了条件。

除了专著，伊沃奇金娜从1970年起，还陆续发表了论述中国古钱的一批文章，其中包括论铜钱、金钱、金元宝、银元宝和各种形式的纸币的文章近50篇，在苏联国内已成为颇有名气的中国古钱专家。

三 武术、气功和道家养生术的传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国各地竞相传授中国的武术。他们认为这种“在中国非常普及的民族体操形式是治病健身的好方法”，而“武术自古以来就分为道家的太极拳和儒家的武术两个分支”，[①] 都值得加以学习和推广。

为此，苏联国家体委下属的“非传统的健身法科研中

---

① 拉左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手册》，莫斯科，1989年，第266页。

心”1989年专门编印了一套“二十四节太极拳操”供中老年人（30~69岁）练习用，并印制成书大量发行。在“前言”里，宣称苏联国家体委已“正式承认”武术是一种体育运动形式，可列入比赛，选拔优秀选手。于是，各大中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武术气功训练中心，延聘中国或俄国教练授课，招收学员，培养骨干，迅速推广此项体育运动。单是莫斯科就有四个这种规模巨大的训练中心。训练中心除了培养骨干，毕业后发给有资格充当武术教练的文凭之外，还广泛发售配有挂图的体操资料，或全套录像，供群众模仿练习。热心于推广的人表示希望造成一种风气，就像在中国一样：“清晨，人行道上、公路两旁、公园里面都变成了特殊的体育健身的场所，人们不分男女老少，都来练气功和武术，而不管过路的行人怎么看他们”。①

此外，目前最流行的书籍还有两种：一是《中国气功疗法》俄译本，勃列申译，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出版，共208页。该书原作系中国的气功师、研究人员和医生集体编写的，系统讲解气功的原理、功能和做法、气功治病的功用以及治愈各种慢性病的案例。内容深入浅出，又有实例，富有说服力，极受欢迎。1991年印行20万册还供不应求。一是卞志忠著《中国道家秘传养生长寿术》俄译本，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共64页，印行9万册。

---

① 勃列申《中国气功疗法·俄文版前言》，莫斯科，1991年，第7页。

出版者特意说明，这是黄山派道教的珍贵遗产，它教人保持青春和长生不老的秘诀，令人感到新奇和神秘。

苏联时代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机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在推动“气功热”中的作用尤其令人注目。它的机关刊物《远东问题》杂志除了经常登载介绍性文章外，从1991年起，按期以增刊的形式发行中国西安气功协会办的《气功与体育》杂志的俄文版。《远东问题》每期发行量都在15 000份左右，而增刊可以加上非订户随时购买，数量就更大。增刊一出，立刻收到大批读者来信，反应强烈，夸赞它是“苏联过去从未有过，却是大家急需”的杂志。由于该所汉学家们的努力，俄文版《气功与体育》的译文准确通畅，成了当今最受欢迎的读物。[①]

四 当代文化交流的热潮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苏（俄）关系的正常化及进一步发展，两国频繁的人员来往，尤其是政府之间贸易和民间贸易的迅速扩大，科技、教育、艺术、体育以及其他各个领域互访合作，很快促进了文化交流的热潮。不但汉学家，而且有各阶层人士对于了解中国当代生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著名俄罗斯汉学家索罗金曾经描述这种新局

① 参阅《读者谈〈气功与体育〉杂志》，《远东问题》1991年，第4期。

面："近年来，关于中国的报导非常之多。专业研究人员、报刊记者、各种访问团的成员——人人都在描写中国，写得非常生动有趣，纯属发自内心的感情，显然都想记下那五光十色、变幻无常、在许多方面是相互矛盾的现实生活画面。岂但如此，大家还是为了弄清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发生并且继续发生巨变的原因。过去到过长城那边的人自然要拿今日同昔日作对比，而其他的人则由于亲眼看到的现实同他们自己听来了关于十年前中国的情况是如此的不同而惊叹不已"，"是的，近十年来这个国家发生了飞跃，它的力量真令人难以置信。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在2000年以前它将在国民生产总值上翻两番的计划，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必定会按期完成的——如果不是超额完成的话。"[①] 应该说，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来过中国的人的看法。

这位汉学家继续描写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巨变："城乡的面貌正在飞速变化，特别是沿海地区。工业正在实行现代化，科学技术产品正在充实着商店的柜橱和无数街头摊点的货架。不久以前，黑白电视机还是稀缺品，而如今彩色电视机已经可以出口，况且不是输往随便的什么地方，而是输入英国！许多家庭的日常生活里已经引入了电脑技术。……文化生活也在急剧起变化，中国人已经了解他们

① 索罗金译《张辛欣、桑晔〈北京人〉俄文本"前言"》，消息报出版社，1989年。

以往还绝少涉足的20世纪世界文学和艺术，反过来说，国外也在欣赏中国戏曲演员的技艺，并且为参加国际大赛的中国演员颁奖。当然，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起变化，社会在其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同时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更为开放了。”[①] 访问者的这类描述往往促使读者以更浓的兴趣来注视中国的变革。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要了解当代中国的现实，对于没能来中国亲身访问的人来说，最快捷的途径莫过于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因此，两国的文学交流便成了当代中国热的先导和突出的事例。正是社会的需要促使苏联文坛再度出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有过的翻译中国文学的热潮。

（1）现代文学翻译的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俄文读者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在1949年后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并追寻变化的社会原因及其对今后的影响，这便促进了当时对现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在短短的十几年间译出了大量作品，除了单行本，重要作家几乎都出版文集。鲁迅作品的翻译最多，译成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等二十多种民族的文字出版，既有单篇作品，也有选集。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四卷本《鲁迅选集》（1954～1956）。其次，为老舍，主要作品都翻译成俄文，已出版《老舍两卷集》（1957）和种类繁多的单

① 索罗金译《张辛欣、桑晔〈北京人〉俄文本“前言”》，消息报出版社，1989年。

行本或选集。其他作家的作品俄译本有：《茅盾文集》（1～3卷，1956）、《郭沫若文集》（1958）、《巴金文集》（两卷本、1959）、《瞿秋白文集》（1959）、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3）、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56）、马锋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1951）、陈登科的《淮河边上的儿女》（1956）、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1956）、杨朔的《三千里江山》（1956）、艾芜《小说选》（1956）、杨沫的《青春之歌》（1959）、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1974），还有《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选》（1968），选入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王鲁彦、王统照、谢冰心、吴祖缃、许地山、老舍等人的小说。此外，还有收入朱自清等人作品的《现代中国散文选》（1969），收入曹禺等人作品的《剧作选》。诗歌方面以《中国之声·中国诗人诗集》（1954）、《1937～1945年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诗歌》（1958）、《红色浪潮·五四时期的诗歌》（1964）、《五更天·30～40年代中国抒情诗》（1975）、《四十位诗人·20～40年代的中国抒情诗》（1978）和《艾青抒情诗选》（1981）等译本最为有名。这些选集包括了中国现代所有重要诗人的名诗选译。

（2）当代文学翻译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与五六十年代近似，翻译作品的数量越来越多。已翻译出版了当代中长篇小说：古华的《芙蓉镇》（1986）、谌容的《人到中年》（1986）、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1986）、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1986）、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

记》（1986）、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1986）、冯骥才的《啊!》，王蒙的《蝴蝶》（1983）、陈淼的《稀有作家庄重别传》（1983），张抗抗的《北极光》（1985），谌容的《太子村的秘密》（1987）、路遥的《人生》（1987），王蒙的《活动变人形》（1988），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9）、张洁的《沉重的翅膀》（1989）、阿城的《树王》（1989）、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1989）、郑万隆的《他和她》（1989），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1990）和谌容的《结婚进行曲》（1990）等。短篇小说译成俄文的数量更多，1982 年以来，先后有王蒙、刘心武、王亚平、韩少功、韶华、刘宾雁、李准、冯骥才、高晓声、蒋子龙、刘绍棠、张弦、秦兆阳、何士光、周克芹、张贤亮、李功达、温小钰、张抗抗、陆文夫等人的短篇小说被多次翻译出版。

长篇纪实文学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选译）也于 1989 年翻译出版。

诗歌已译成俄文的有艾青、公刘、浪波、李发模、骆耕野、刘祖慈、吕剑、寥寥、苏叔阳、吴力军、方冰、方殷、方敬、傅天琳、韩瀚、胡笳、黄永玉、赵恺、朱健等当代诗人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译者大多数是当代著名的汉学家，如谢曼诺夫、索罗金、李福清、热洛霍夫采夫、华克生、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莫尔恰诺娃、阿日马穆多娃、切尔卡斯基等，足见苏联文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视。

回顾20世纪末期的情况，研究俄苏大量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动因，恐怕也同两个国家文学发展的阶段相似有关。当代的中国文学在题材选择、主题开拓、体裁和形式的探索诸方面，都可以在俄苏文学中得到印证。中国当代文学对历史的反思，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对当今社会矛盾的揭示，对丰富多彩、变幻多端的生活之开掘，对“当代英雄”、新人物和普通人命运的描述，几乎都可以在俄苏当代文学作品中发现“对应物”。尤其描写改革过程中的新人新事，更易让俄文读者感到新鲜、引发他们的兴趣。两国的同行似乎不约而同地都在描摹当代社会和人生，而且彼此相呼应。只要看看这十年中国对俄苏文学的翻译情况，两相比较，就更加清楚了。

总之，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和现状，本书介绍的虽然不够深入和具体，但已经可以看出其流传的规模和影响，并且深受俄国人士的重视和欢迎。可以期望，有着辉煌历史和成就的中国文化，不但在俄罗斯，而且将在国际上得到进一步的弘扬。

五　传记文学和《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一）传记文学的勃兴

俄国汉学家为中国文化名人立传的事早已有之，于今

为盛。无论正传、评传，还是略传和传记资料长篇，各种形式俱备。举其大者，如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彼得罗夫著《艾青评传》（1954）、波兹涅耶娃著《鲁迅》（1957）和尼古拉耶娃著《齐白石》（1960），70 年代的克罗尔著《司马迁》（1970）和谢烈布里亚科夫著《陆游评传》（1973），80 年代的马良文著《孔子传》（1985）、别仁著《杜甫传》（1987）和托米海著《庾信》（1988），90 年代以后的列别捷娃著《萧红的生平、创作与命运》（1998）、阿里莫夫著《沈括及其〈梦溪笔谈〉》（2003）和叶尔马科夫翻译的多卷本《高僧传》（1991）。

立传的对象也扩及历史上政治人物，如谢曼诺夫著《慈禧太后生平事略》（1976）和乌索夫著《中国末代皇帝溥仪》（2003），甚至反面历史人物，如乌索著《康生——中国的贝利亚》（2003）。

为革命领导人树碑立传则是近年来的新气象。如上述同一位作者乌索夫的长篇巨著《邓小平和他的时代》（2009 年，843 页），而资深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在早年写过《孙中山——苏联人民的朋友》（1966）之后，近年又写出充满感情的传记历史资料长篇《周恩来与中国的独立和统一》（2000）。

据不完全的资料，中国古今名人在俄罗斯被立传的对象（每人一书）还有郭沫若、老舍、曹禺、茅盾、叶圣陶、秋瑾、黄遵宪、徐悲鸿、曹靖华、张贤亮，古代的李白、高启、蒲松龄、嵇康、阮籍、陶渊明、屈原、米芾等数十人。

（二）季塔连科主编《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俄国从2006年中国举办“俄罗斯年”开始，推出大型图书一套《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按哲学、宗教、文学、史学、科技分编成五卷，每年出版一卷，每卷篇幅近1 000页，印数为2 000册。每卷均撰述自古至今该门学科的历史脉络，介绍名人、名著、门派、同类学人以及专有名称和相关理论，并均附以插图。这是俄国迄今最为全面、系统又精要地阐述中国精神文化的巨型图书，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也是世界汉学界的首创。俄罗斯汉学从它的奠基人比丘林开始，就实行对中国国情，尤其精神文化国情作全面、整体的调研和分析，然后作出综合的评介，形成一种学科的传统。比丘林本人的成果也成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示范，如今的这部“文化大典”恰是这一汉学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季塔连科院士作为主编，邀集的是当代俄国汉学界的主要专家学者来作撰稿人，约200人，包括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波罗的海沿岸、新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等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所，均为当代卓有成就的汉学家。以编委会成员为例，有：科勃泽夫、卢基扬诺夫、阿尼克耶娃、格拉维娃、克拉芙佐娃、佩列洛莫夫、波波娃、李福清、索罗金、托罗普采夫、乌索夫，均系当代名家，在中国也享有盛誉。

凭此，季塔连科本人已成为当代俄罗斯的中国文化研究之推手和领军人物。

附　　录

一　俄苏中国文化论著主要书目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杨兴顺著，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0年出版。

《中国哲学史略》杨兴顺著，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

《中国古代哲学》第一卷，季塔连科等著，科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二卷，杨兴顺著，思想出版社1973年出版。

《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家王船山的世界观》布罗夫著，科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

《中国·社会发展途径探索·20世纪社会政治思想史片断》杰柳辛著，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中国政治史上的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佩列洛莫夫著，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杨兴顺著，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中国的道和道家学说》列·瓦西里耶夫主编，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中国的儒家学说·理论和实践问题》杰柳辛主编，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王阳明学说和中国古典哲学》科布译夫著，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当代中国哲学》季塔连科主编，科学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孔子的箴言》西门诺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佛教、喇嘛教的起源和本质》谢米乔夫、乌兰乌德著，布里亚特图书出版社 1960 年出版。

《中国的迷信·宗教和传统》列·瓦西里耶夫著，科学出版社 1970 年出版。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龙果夫著，苏联科学院 1952 年出版。

《汉语语法》戈列洛夫著，教育出版社 1974 年出版。

《古汉语·原文、语法、注释》刘克甫等著，科学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汉语口语教科书》谭傲霜著，科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汉俄大字典》共四卷，25 000 词条，鄂山荫主编，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田汉》阿日马穆多娃著，莫斯科，1993 年出版。

《〈太极〉——文学与文化中的中国世界模式》戈雷金娜著，莫斯科，1995 年出版。

《孔子的生平、学说、命运》佩列洛莫夫著，莫斯科，1993 年出版。

《中国文化史》克拉夫佐娃著，圣彼得堡，1998 年出版。

《中国艺术史》克拉夫佐娃著，圣彼得堡，2004 年出版。

《旧中国女性秘史（皇宫里的后、妃和嫔）》乌索夫著，圣彼得堡，2004 年出版。

《康生——中国的贝利亚》乌索夫著，莫斯科，2003 年出版。

《邓小平和他的时代》乌索夫著，莫斯科，2009 年出版。

《周敦颐与儒家哲学的复兴》季塔连科、雷沙、科夫等著，莫斯科，2009 年出版。

二　中国文化著作俄译本书目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鲁波—列斯尼琴柯、普济斯基译，科学出版社 1965 年出版。

《山海经》杨希娜译注，科学出版社 1977 年出版。

《诗经》什图金译，科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诗经·选译》什图金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屈原诗集》阿列克谢耶夫、吉托维奇、艾德林等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

《屈原诗集》费德林编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管子》施泰因译，东方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周易》休茨基译，东方文学出版社 1960 年出版。

《孙子兵法》康拉德译，苏联科学院，1950 年出版。

《孙武兵法》康拉德译并注释，莫斯科，1958 年出版。

《中国古代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杨朱、列子、庄子》波兹涅耶娃译、注并序，科学出版社 1967 年出版。

《战国策》瓦西里耶夫译，科学出版社 1968 年出版。

《商君书》佩列洛莫夫译，科学出版社 1968 年出版。

《乐府·中国古代诗歌选》瓦赫金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乐府·中国中世纪抒情诗选》瓦赫金译，科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

司马迁《史记》第 1 卷　维亚特金、塔斯金合译，科学出版社 1972 年出版；第 2 卷，1975 年出版。

《司马迁文选》帕纳秀克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七哀〈曹植诗集〉》切尔卡斯译，科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文艺出版社 1973 年再版。

《陶渊明抒情诗集》艾德林译，文艺出版社 1964 年出版；1972 年再版。

《陶渊明诗歌集》艾德林译，文艺出版社 1972 年出版。

《紫玉》（中国一至六世纪小说集）李福清、李谢维奇等译，文艺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中国古代诗歌与散文》(《世界文学大系》古代东方诗歌与散文分册的一部分)，文艺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中国古典散文》阿列克谢耶夫译，莫斯科，1958 年出版。

《李白抒情诗选》吉托维奇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1957 年再版。

《杜甫诗集》吉托维奇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5 年出版；1962 年再版。

《杜甫抒情诗集》吉托维奇译，文艺出版社 1967 年出版。

《王维诗集》吉托维奇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王维诗集》苏霍鲁科夫译，文艺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诗歌三百首）》东方文献出版社 1960 年出版。

《白居易绝句集》艾德林译，1946 年出版。

《白居易绝句集》艾德林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49 年出版；1951 年补充再版。

《白居易诗集》艾德林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文艺出版社 1978 年再版。

《白居易抒情诗集》艾德林译，文艺出版社 1965 年出版。

《维摩诘经变文·十吉祥变文》（敦煌写本）孟列夫译注，东方文献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双恩记变文》（敦煌写本）孟列夫译注，科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

《妙法莲华经变文》孟列夫译注，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影印敦煌赞文附宣讲》孟列夫整理、作序，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出版。

《普明宝卷》（两卷本）司徒洛娃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百喻经》吉列维奇译，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韩愈柳宗元文选》索科洛娃译，文艺出版社1975年出版。

《古镜》（先唐传奇集）吉什科夫、帕纳秀克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

《白猿》（唐代传奇集）吉什科夫译，赤塔出版社1955年出版。

《异怪故事》（先唐传奇集）吉什科夫译，科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

《唐代传奇集》费什曼译，科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

《唐代传奇集》费什曼、吉什科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

《浪子与术士》（又名《枕中记》）（唐代传奇）索科洛娃、费什曼译，文艺出版社1970年出版。

《苏东坡诗词集》戈鲁别夫译，文艺出版社1960年出版。

李清照《漱玉词》巴斯马洛夫译，文艺出版社1970年出版；1974年再版。

《辛弃疾诗词集》巴斯马诺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1961年再版。

《中国七至九世纪抒情诗歌集》休茨基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23年出版；1927年再版。

《中国诗歌集》（四卷本）郭沫若、费德林主编，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1958年出版。

《中国古典诗歌集》（唐代）费德林主编，亚历山德罗夫等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唐诗集》艾德林编并序，国家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宋代诗歌》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中国古典作家抒情诗集》吉托维奇译，列宁格勒出版社1962年出版。

《中国古典诗歌集》艾德林译，文艺出版社1975年出版。

《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巴斯马诺夫译，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

《中国八至十四世纪抒情诗歌集》（王维、苏轼、关汉卿、高启）斯米尔若夫编，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中国三至十四世纪写景诗歌集》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歌》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中国古典诗歌》（世界文学大系第十六分册的一部分）文艺出版社 1977 年出版。

《杂纂》（九至十九世纪中国作家语录）齐别罗维奇译，科学出版社 1969 年出版；1975 年再版。

陆游《入蜀记》谢列布里亚科夫译，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 1968 年出版。

《碾玉观音》（宋代传奇与话本集）罗加乔夫译，文艺出版社 1972 年出版。

《十五贯》（中国中世纪短篇小说集）左格拉夫译，东方文献出版社 1962 年出版。

《死去两次的女子》（中国古代话本集）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文艺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神祇的揭露》（又名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国中世纪话本集）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译，科学出版社 1977 年出版。

《卖油郎与花魁》（话本集）吉什科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

《懒龙的把戏》（中国十七世纪话本十六篇）沃斯克列辛斯基译注，文艺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归还的财宝》（中国十七世纪话本集）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注，科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道士的咒语》（又名牧童儿夜夜尊荣）（中国十七世纪话本集）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科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今古奇观》选译　齐别罗维奇译，科学院出版社 1954 年出版。

《今古奇观》（两卷本）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译，东方文献出版社 1962 年出版。

《今古奇观》齐别罗维奇编选、注解并序，文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新编五代史平话》巴甫洛夫斯卡娅译，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王实甫《西厢记》孟列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60 年出版。

《元曲》(《墙头马上》、《梧桐雨》、《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李逵负荆》、《汉宫秋》、《张生煮海》、《秋胡戏妻》、《合汗衫》、《倩女离魂》等）彼得罗夫编辑、缅希科夫校注，艺术出版社 1966 年出版。

《东方古典戏剧：印度、中国、日本》（世界文学大系）分册，中国部分包括《窦娥冤》、《忍学记》、《杀狗劝夫》、《长生殿》（片断）、《桃花扇》（片断）、《牡丹亭》（片断），文艺出版社 1976 年出版。

《十五贯》吉什科夫译，艺术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梁山伯与祝英台》（十三场戏曲剧本）艺术出版社 1958 年出版。

《空城记》瓦西里耶夫译，载于《东方戏剧集》，列宁格勒 1929 年出版。

关汉卿《窦娥冤》（节译）索罗金译，载于《外国文

学》杂志1958年第二期。

关汉卿《救风尘》谢曼洛夫、亚罗斯拉夫采夫译，载于《东方文集》1958年第二集。

罗贯中《三国演义》（缩写本）帕纳秀克译，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

罗贯中、冯梦龙《平妖传》帕纳秀克译，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

《金瓶梅》（两卷本）马努辛译，文艺出版社1977年出版。

施耐庵《水浒传》（两卷本）罗加乔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1959年再版。

《水浒传》（为儿童读者缩改本）李西查、谢列布里亚科夫译，列宁格勒儿童文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

吴承恩《西游记》（四卷本）罗加乔夫、科洛科洛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猴王孙悟空》（《西游记》节略本）罗加乔夫译，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节略。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

李汝珍《镜花缘》费什曼、蒙译列尔、齐别罗维奇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吴敬梓《儒林外史》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注，国家文学出版社1927年出版。

李渔《十二楼》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注，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

李渔《肉蒲团》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译，1989

年出版。

《狐媚》（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彼得格勒国家出版社 1922 年出版。

《狐媚》（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5 年出版。

《狐媚》（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文艺出版社 1970 年出版。

《僧术》（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莫斯科—彼得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 1923 年出版。

《僧术》（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异怪故事》（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科学出版社 1937 年出版。

《异人故事》（蒲松龄《聊斋志异》选译）阿列克谢耶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

蒲松龄《聊斋志异》阿列克谢耶夫译，文艺出版社 1973 年出版。

《蒲松龄小说集》乌斯金、范加尔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61 年出版。

袁枚《新齐谐（子不语)》费什曼译，科学出版社 1977 年出版。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费什曼译，科学出版社 1974 年出版。

曹雪芹《红楼梦》（两卷本）帕纳秀克译，国家文学出

版社 1958 年出版。

钱彩《说岳全传》（两卷本）帕纳秀克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63 年出版。

石玉昆《三侠五义》帕纳秀克译，文艺出版社 1974 年出版。

沈复《浮生六记》戈雷金娜译，科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刘鹗《老残游记》谢曼诺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

曾朴《孽海花》谢曼诺夫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60 年出版；1990 年再版。

借阳堂主人《二度梅》泽德巴姆转译自德文，莫斯科，联邦出版社 1929 年出版。

《中国民间故事》儿童出版社 1952 年出版。

《中国民间故事》李福清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1959 年再版。

《中国民间故事》李福清译，文艺出版社 1972 年出版。

《老荀故事集》李福清辑，吉特尔逊等译，儿童文学出版社 1957 年出版。

《龙眼》（中国各族民间传说与故事）林林、马斯金译，1959 年出版。

《中国南方各族史诗传说集》科洛科洛夫辑选。科学出版社 1955 年出版。

《东干族民间故事与传说》李福清、哈桑诺夫、尤素波

夫译，科学出版社 1977 年出版。

《中国民间戏剧》盖达译，1959 年出版。

王实甫《西厢记》孟列夫等译，1960 年出版。

《元杂剧》彼得罗夫等译，1966 年出版。

《中国之声·中国诗人诗集》切尔卡斯基译，1954 年出版。

《中国诗歌选》1957 年出版。

《1937～1945 年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诗歌》马尔科娃译，1958 年出版；1961 年再版。

《红色浪潮·"五四"时期的诗歌》切尔卡斯基译，科学出版社 1964 年出版。

《五更天·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抒情诗》切尔卡斯基译，科学出版社 1975 年出版；1979 年再版。

《亚非国家抒情诗》库尔干采娃编，科学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四十位诗人·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抒情诗》切尔卡斯基译，科学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王明诗选》（1919～1974）索罗金编，苏尔科夫译，进步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艾青抒情诗选》索罗金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中国诗歌》切尔切斯基译，科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马烽和西戎著《吕梁英雄传》罗加乔夫译，1951 年出版。

《鲁迅文集》费德林译，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

《鲁迅四卷集》波兹涅耶娃等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4～1956 年出版。

鲁迅《故乡》阿赫拉罗夫译，塔什干 1956 年出版。

《鲁迅短篇小说集》米尔基希耶夫译，巴库 1956 年出版。

《鲁迅选集》艾德林作序，文学出版社 1981 年出版；1989 年再版。

《郭沫若文集》费德林序，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5 年出版。

朱宝华著《阿宝的新衣》阿克萨诺娃译，儿童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华山《鸡毛信》阿拉克恰译，克兹尔 1956 年出版。

高玉宝《我要读书》加托娃译，儿童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秦兆阳《小燕子万里飞行记》加托娃译，赤塔图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米哈依洛娃译，伊热夫斯克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陈登科《淮河边上的儿女》戈洛夫涅夫等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中国的秘密·儿童故事中的瓷器史》丹科译，基辅，青年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钟》（中国神话）杜达罗夫译，阿什哈巴德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中国中短篇小说》伊万科译，国家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茅盾《子夜》米什尔译，基辅，1956 年出版。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帕列伊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巴金《家》彼得罗夫译，1956 年出版。

老舍《骆驼祥子》彼得罗夫译，1956 年出版。

周立波《暴风骤雨》鲁德曼译，1956 年出版。

黄艾《沸腾的十年》鲁德曼译，阿拉木图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艾芜小说选》谢曼诺夫译，1956 年出版。

杨朔《三千里江山》斯拉布诺夫等译，1956 年出版。

《老舍短篇小说、剧本、散文》费德林编，1966 年出版。

《茅盾文集》（第 1～3 卷）费德林编，1956 年出版。

《伟大人民的儿子，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选》艾德林编，儿童文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中国民间神话》李福清编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第一版；1959 年第二版。

《老舍两卷集》莫斯科，1957 年出版。

《郭沫若文选》第一卷　费德林译，1958 年出版。

《向未来跃进，人民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故事》米海耶夫译，1959 年出版。

《中国短篇小说集》尼科里斯卡娅译，东方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杨沫《青春之歌》费奥克蒂斯托夫译，1959年出版。

《瞿秋白文集》施奈德等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

老舍《全家福》尼科里斯卡娅译，艺术出版社1961年出版。

老舍《离婚》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译，1967年出版。

《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选》莫斯科，1968年出版。

《现代中国散文选》安季波夫斯基译，1969年出版。

《雨中的林阴道（二十到三十年代中国的抒情诗）》切尔卡斯基译，1969年出版。

苏曼殊《断鸿零雁记》谢曼诺夫译，1971年出版。

茅盾《幻灭》伊万科译，1972年出版。

张天翼《鬼士日记》切尔卡斯基译，1972年出版。

邓拓《燕山夜话》热洛霍夫采夫译，1974年出版。

《雨》（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帕纳秀克等译，1974年出版。

赵树理《李有才板话》施奈德译，1974年出版。

《瞿秋白选集》施奈德译，文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

老舍《猫城记》谢曼诺夫译，1977年第二版。

老舍《赵子曰》（东方文集第七册）谢曼诺夫译，1979年出版。

老舍《正红旗下》华克生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中国文学作品选》阿列克谢耶夫译，1978 年出版。

钱钟书《围城》索罗金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老舍选集》进步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人妖之间》（中国作家小说选）热洛霍夫采夫、索罗金译，进步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中篇小说集）热洛霍夫采夫等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当代中国小说：王蒙、谌容、冯骥才》索罗金等译，消息报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人到中年》（中短篇小说集）李福清等译，虹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李福清等译，虹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古华《芙蓉镇》谢曼诺夫译，虹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路遥《人生》谢曼诺夫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相会在兰州》（短篇小说集）热洛霍夫采夫等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蜀道难》（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诗选）切尔卡斯基译，虹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王蒙《活动变人形》华克生译，虹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张洁《沉重的翅膀》谢曼诺夫译，虹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树王》（中国当代中篇小说集，包括谌容、王安忆、李存葆、蒋子龙、阿城、郑万隆各一篇）热洛霍夫采夫编选，虹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老舍《小波的生日、天才的故事》谢曼诺夫编并序，儿童文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张辛欣、桑晔《北京人》索罗金选译，消息报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卞志忠《中国道家秘传养生长寿术》李路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中国气功疗法》勃列申译，原子能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王积业、朱元珍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阿基莫夫等译，经济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慧皎《高僧传》三卷集　叶尔马科夫译，科学出版社第一卷 1991 年出版。

《白莲教教义——1796～1804 年中国人民起义的思想体系》波尔什涅娃著，科学出版社 1972 年出版。

《晚期道教论自然、社会和艺术》波梅兰采娃著，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中国历史和现时代》齐赫文著，科学出版社 1976 年出版。

《中国·传统与现时代》杰柳辛著，科学出版社 1976 年出版。

《中国·历史、文化和历史学》蒙库耶夫主编，科学出

版社1977年出版。

《中国历史问题》拉宾娜编，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中国史纲》西蒙诺夫斯卡娅等著，师范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

《从古到今的中国史》尤里耶夫著，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季塔连科主编，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历史学家司马迁》克罗尔著，莫斯科，1970年出版。

《中国人的氏族制·进化和规律》刘克甫著，科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

《班固——中国古代历史学家》西尼岑等著，科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

《女真人和金国》沃罗比约夫著，莫斯科，1975年出版。

《中国火炮前史》什科利亚尔著，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杰柳辛等著，1950年出版。

《中国现代史纲》维诺格拉多夫等著，东方文献出版社1959年出版。

《中国现代史》斯拉德科夫斯著，科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

《中国近代史》齐赫文主编，科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

《慈禧太后生平事略（1835～1908）》谢曼诺夫著，科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

《李大钊》克立夫佐夫著，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孙中山》叶尔马肖夫著，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64年出版。

《国父孙中山的故事》马特维耶娃著，1975年出版。

《中国钱币》贝科夫著，苏联艺术家出版社1969年出版。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列·瓦西里耶夫著，科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

《古代中国人的族源学问题》刘克甫等著，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西夏国史纲》克恰诺夫著，科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

《殷代铭文》刘克甫著，科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

《仰韶文化的陶器》卡申娜著，新西伯利亚科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

《当代中国文学概观》费德林著，国家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

《论今日中国文学》艾德林著，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

《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纲要》费德林著，莫斯科，1956年出版。

《现代中国文学概况》费德林著，莫斯科，1958年出版。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集》李谢维奇等著，科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

《“文化革命”和中国文学的命运》纳杰耶夫著，科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

《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史片断》（《文学遗产》第81卷）施奈德等著，莫斯科1969年出版。

《中国和朝鲜的文学体裁和风格》波梅兰采娃等著，莫斯科1969年出版。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美文学理论》戈雷金娜著，科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

《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费德林著，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

《马雅可夫斯基作品在中国》切尔卡斯基著，科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

《俄国古典作品在中国》施奈德著，科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艺理论和政治斗争》热洛霍夫采夫著，莫斯科1979年出版。

《东西方中世纪文学的类型和相互关系》莫斯科1979年出版。

《古代和中世纪交替时期中国的文学思想》李谢维奇著，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中国文学遗产和现时代》费德林著，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现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古典遗产》热洛霍夫采夫著，莫斯科，1981年出版。

《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李福清著，1979年出版。

《现代中国戏剧》吉什科夫著，科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

《世界各国神话》第一卷，中国神话部分，李福清著，莫斯科1980年出版。

《中国传统戏曲》盖达著，科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

《万里长城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李福清著，1961年出版。

《〈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费德林著，莫斯科，1958年出版。

《中国的古代诗歌与民歌·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乐府》李谢维奇著，科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

《陶渊明及其诗》艾德林著，科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

《陶渊明诗歌创作中的传统和革新问题》艾德林著，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

《四至五世纪的中国诗人谢灵运及其时代》巴德尔金著，莫斯科，1975年出版。

《大乘佛教对唐代诗人创作的影响·以王维、白居易为例》达格达诺夫著，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

《李白的生平和创作》菲什曼著，莫斯科，1958年出版。

《杜甫评传》谢列布里亚可夫著，莫斯科，1958 年出版。

《陆游的生平与创作》谢列布里亚科夫著，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 1973 年出版。

《十至十一世纪中国的诗歌：诗和词》谢列布里亚科夫著，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中国中世纪城市小说——话本的起源和体裁等若干问题》热洛霍夫采夫著，科学出版社 1969 年出版。

《中国中世纪的短篇小说·体裁的起源及其演变（八至十四世纪）》戈雷金娜著，莫斯科，1980 年出版。

《中国讲史演义和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李福清著，科学出版社 1970 年出版。

《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古典戏剧，起源、结构、形象、题材》索罗金著，莫斯科，1979 年出版。

《中国的伟大剧作家关汉卿》费德林著，知识出版社出版。

《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三位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费什曼著，莫斯科，1980 年出版。

《启蒙时期的中国讽刺章回小说》费什曼著，科学出版社 1966 年出版。

《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谢曼诺夫著，科学出版社 1970 年出版。

《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费德林著，知识出版社 1953 年出版。

《鲁迅》波兹涅耶娃著，莫斯科，1957 年出版。

《鲁迅的生平与创作（1881～1936）》波兹涅耶娃著，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鲁迅世纪观的形成，早期的政论作品和〈呐喊〉》索罗金著，莫斯科 1958 年出版。

《鲁迅和他的前驱》谢曼诺夫著，科学出版社 1967 年出版。

《瞿秋白——革命家、作家和战士》施奈德著，知识出版社 1960 年出版。

《殷夫——中国革命的歌手》马特科夫著，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

《瞿秋白的创作道路（1899～1935）》施奈德著，科学出版社 1964 年出版。

《郭沫若的新诗创作》马尔科娃著，东方文学出版社 1961 年出版。

《中国新诗（二十至三十年代）》切尔卡斯基著，科学出版社 1972 年出版。

《朱自清——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舒利加著，莫斯科 1979 年出版。

《闻一多的生平和创作》苏霍鲁科夫著，科学出版社 1968 年出版。

《艾青评传》彼得罗夫著，莫斯科 1954 年出版。

《战争年代（1937～1946）的中国诗歌》切尔卡斯基著，莫斯科 1980 年出版。

《茅盾》费德林著，知识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茅盾的创作道路》索罗金著，东方文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

《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安季波夫斯基著，科学出版社 1967 年出版。

《巴金创作概论》尼科里斯卡娅著，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76 年出版。

《郁达夫和“创造社”》阿德日马穆多娃著，科学出版社 1971 年出版。

《中国电影简史（1896～1966）》托罗普采夫著，科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1937～1945 年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剧作》齐宾娜著，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61 年出版。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京剧》谢罗娃著，科学出版社 1970 年出版。

《中国古典戏剧的改革》孟列夫著，东方文学出版社 1959 年出版。

《关于海瑞的争论和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命运（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戈德娜著，莫斯科，1979 年出版。

《老舍战争年代的创作（1937～1949）》博洛京娜著，科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曹禺创作概论》尼科里斯卡娅著，莫斯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田汉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戏剧》尼科里斯卡娅著，莫斯

科大学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中国的传统家具》别洛译洛娃著，科学出版社 1956 年出版。

《中国的造型艺术》格卢哈列娃著，莫斯科，1956 年出版。

《人民中国的艺术：绘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格卢哈列娃著，艺术出版社 1958 年出版。

《现代中国的木刻》穆里安著，莫斯科，1958 年出版。

《齐白石》尼古拉耶娃著，艺术出版社 1960 年出版。

《现代中国版画（1931～1958）》切尔诺娃著，莫斯科，1960 年出版。

《中国的山水画》维诺格拉多娃著，艺术出版社 1972 年出版。

《中国民间年画·民间绘画所表现的旧中国的精神生活》阿列克谢耶夫著，1966 年出版。

《旧中国绘画中的美学问题》扎瓦茨卡娅著，艺术出版社 1975 年出版。

《中国服装·象征意义和历史·在文学和艺术中的解释》思乔夫著，科学出版社 1975 年出版。

《中国纸币的产生》伊沃奇金娜著，科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汉语研究》索思采夫等著，科学出版社 1973 年出版。

《古汉语》雅洪托夫著，科学出版社 1965 年出版。

《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索夫罗诺夫著，科学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蒙韃备录》科学出版社 1975 年出版。

《契丹国志》塔斯金译，科学出版社 1976 年出版。

吴晗《朱元璋传》蒙库耶夫译，进步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中国肖像画论》拉祖莫夫斯基译，阿芙乐尔出版社 1971 年出版。

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扎瓦茨卡娅译，科学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萨莫休克译，科学出版社 1978 年出版。

王了一《汉语语法纲要》龙果夫译，莫斯科，1954 年出版。

吕叔湘《汉语语法概论》鄂山荫译，科学出版社 1965 年出版。

《大唐三奘取经诗话》巴甫洛夫斯卡娅译，莫斯科，1989 年出版。

袁枚《新齐谐》费什曼译，圣彼得堡，2003 年出版。

《中国艳情小说》瓦斯克列辛斯基译，圣彼得堡，2004 年出版。

《京本通俗小说》佐格拉芙译，圣彼得堡，1995 年出版。

孔子《论语》佩列洛莫夫译，莫斯科，1998 年出版。

老子《道德经》卢基扬诺夫译，莫斯科，2009 年出版。

《易经》卢基扬诺夫译，莫斯科，1994 年出版。

三　汉学家译名对照表

Ли Минбин: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России

（限本书提到者：以姓氏的汉语拼音为序）

阿列克谢耶夫	В. М. Алсксесв
阿里莫夫	И. А. Алимов
阿日马穆多娃	В. С. Аджимаму дова
阿拉波娃	Т. В. Аранова
阿赫玛托娃	А. А. Ахматова
艾德林	Л. З. Зйдлин
巴甫洛夫斯卡娅	Л. К. Павловекая
巴斯曼诺夫	М. И. Басманов
别仁	Л. Е. Бежин
别洛泽洛娃	В. Т. Белозерова
阿·彼得罗夫	А. А. Нетров
彼得罗夫	В. В. Нетров
比丘林	Н. Я. Бичурин
鲍列夫斯卡娅	Н. Е. Боревская
波波夫	П. С. Попов
波波娃	И. Ф. Попова
波兹涅耶娃	Л. Д. Позднеева

波尔什涅娃	Е. Б. Порщнева
波梅兰采娃	Л. Е. Померанцева
布纳科夫	Ю. В. Бунаков
布罗茨基	Р. М. Бродкий
贝科夫	А. А. Быков
达格丹诺夫	Г. В. Дагданов
杜曼	Д. Н. Думан
鄂登堡	С. Ф. Одъденбург
鄂山荫	И. М. Ошанин
费德林	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费什曼	О. Л. Фишман
费奥克蒂斯托夫	В. Ф. Феоктистов
弗卢格	К. К. Флуг
戈雷金娜	К. И. Голыгина
戈鲁别夫	И. С. Голубев
戈列洛夫	В. И. Горелов
格鲁哈列娃	О. Н. Глухарева
盖达	И. В. Гайда
古列维奇	И. С. Гуревич
华克生	Д. 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哈恩斯基	К. А. Харнский
吉托维奇	А. И. Гитович
季塔连科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杰柳辛	Л. П. Делюсин

杰米多娃	Н. Ф. Демидова
佳普希娜	Н. И. Тяпкина
卡尔波夫	М. В. Карпов
卡申娜	Т. И. Кашина
卡晋	В. Н. Казин
康拉德	Н. И. Конрад
科罗文娜	С. Г. Коровина
科马罗夫	В. Л. Комаров
科兹洛夫	П. К. Козлов
科洛科洛夫	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柯托娃	А. Ф. Котова
克拉芙佐娃	М. Е. Кравцова
克留科夫	М. В. Крюков
克罗尔	Ю. Л. Кроль
克平	К. Б. Кепинг
克恰诺夫	Е. И. Кычанов
克里夫佐夫	В. А. Кривцов
库切拉	С – Р. Кучера
拉赫满宁	О. Б. Рахманин
拉祖莫夫斯基	К. И. Разумовский
列昂季耶夫	А. Л. Леонтьев
李福清	Б. Л. Рифтин
李谢维奇	И. С. Лисевич
林林	О. М. Лин-Лин

列别捷娃	Н. А. Лебедева
刘华夏	В. М. Крюков
龙果夫	А. А. Драгунов
鲁缅采夫	М. К. Румянцев
鲁缅采娃	О. В. Румянцева
鲁波—列斯尼琴柯	Е. И. Лубо-Лесниченко
卢多夫	Л. Н. Рудов
卢基扬诺夫	А. Е. Лукьянов
罗季昂诺夫	А. А. Родионов
罗季昂诺娃	О. П. Родионова
罗索欣	И. К. Россохин
罗加乔夫	А. П. Рочачёв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Ю. В.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罗日杰斯特文斯卡娅—莫尔恰诺娃	Е. И.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ая-Молчанова
洛曼诺夫	А. В. Ломанов
马努辛	В. С. Манухин
马里诺夫斯卡娅	Т. А. Малиновская
马利亚温	В. В. Малявин
马尔科夫	В. Марков
马尔科娃	С. Д. Маркова
孟列夫	Л. Н. Менъшиков
蒙泽勒	Г. О. Монзелер
蒙库耶夫	Н. Ц. Мункуев

梅列克谢托夫	А. В. Меликсетов
穆里安	И. Ф. Муриан
尼科里斯卡娅	Л. А. Никольская
尼古拉耶娃	Н. С. Николаева
尼基福罗夫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涅夫斯基	Н. А. Невский
诺夫戈罗茨基	Ю. В. Новгородкий
潘克拉托夫	Б. И. Панкратов
庞英	Пан Ин
帕纳秀克	В. А. Панасюк
佩列洛莫夫	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切尔卡斯基	Л. Е. Черкасский
切尔沃娃	Н. А. Червова
齐赫文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齐别罗维奇	И. З. Циперович
丘古耶夫斯基	Л. И. Чугуевский
屈纳	Н. В. Кюнер
屈沙强	Л. С. Кюзаджян
热洛霍夫采夫	А. Н. Желоховцев
斯科罗包加托娃	Л. С. Скоробогатова
斯卡奇科夫	П. Е. Скачков
斯米尔诺夫	И. С. Смирнов
斯节普金娜	Т. В. Степкина
斯图任娜	З. П. Стужина

施普林钦	А. Т. Шпринцин
施泰因	В. М. Штейн
什图金	А. А. Штукин
司格林	Н. А. Спешнев
司徒洛娃	З. С. Стулова
思乔夫	Л. П. Сычёв
苏霍鲁科夫	В. Т. Сухоруков
舒托娃	Б. И. Шутова
索罗金	В. Ф. Сорокин
索恩采夫	В. М. Солнцев
索恩采娃	Н. В. Солнцева
索福隆诺夫	М. В. Софронов
萨莫休克	К. Ю. Самосюк
特卡琴科	Г. А. Ткаченко
托尔琴诺夫	Е. А. Торчинов
塔斯金	В. С. Таскин
托罗普采夫	С. А. Торопцев
瓦西里耶夫	В. П. Васильев
金・瓦西里耶夫	К. В. Васильев
列・瓦西里耶夫	Л. С. Васильев
王希礼	Б. А. Васильев
瓦赫京	Б. В. Вахтин
维诺格拉多娃	Н. А. Виноградова
维亚特金	Р. В. Вяткин

韦利古斯	В. А. Вельгус
沃里比约夫	М. В. Воробьёв
乌斯京	П. М. Устин
乌索夫	С. Н. Усов
西维洛夫	Д. П. Сивиллов
西蒙诺夫斯卡娅	Л. В. Симоновская
西门诺科	И. И. Семененко
休茨基	Ю. К. Шуцкий
谢列布里亚科夫	Е. А. Серебряков
谢曼诺夫	В. И. Семанов
谢米乔夫	Б. В. Семичёв
谢罗娃	С. А. Серова
伊茨	Р. Ф. Итс
伊沃奇金娜	Н. В. Ивочкина
伊萨延科	Б. С. Исаенко
伊帕托娃	А. С. Ипатова
伊拉里昂诺娃	Т. И. Илларионова
叶尔马科夫	М. Е. Ермаков
叶菲莫夫	Г. В. Ефимов
叶戈里耶夫	В. Егорьев
雅里斯拉夫采夫	Г. Б. Ярославцев
雅洪托夫	С. Е. Яхонтов
杨兴顺	Ян Хин-шун
杨希娜	З. М. Яншина

扎瓦茨卡娅	Е. В. Завацкая
扎娅茨	Т. С. Заяц
扎多延科	Т. П. Задоенко
左格拉芙	И. Т. Зограф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文化在俄罗斯
作者＝李明滨著
页数＝248
SS号＝13117178
出版日期＝2012.10